中印边界秘史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

〔印〕卡·古普塔 著

王宏纬 王至亭 译

中印边界秘史

〔印度〕卡·古普塔著
王宏纬　王至亭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北京

中印边界秘史

[印度] 卡·古普塔 著

王宏纬　王至亭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　字数：140千

印数：3000　1990年12月第1版首次印刷

ISBN：7-80057-038-X/Z.22　定价：4.50元

译者前言

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来，中外学者十分关注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虽有一些带有偏见，但也不乏资料翔实和观点比较客观的作品，如阿拉斯太尔·兰姆的《中印边界问题》、多萝西·伍德曼的《喜马拉雅山边界》和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等等。由印度人写作和出版的有关中印边界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而且由于受到少数政界和学术界不负责任的人士故意歪曲历史的影响，它们大多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充满偏见，因而较少具有学术价值。但是印度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她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过许多正直和杰出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为社会发展和中印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难道能够设想，在当今世界上，象印度这样一个伟大民族，会长期受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士的蒙蔽和影响，误友为敌，而没有人站出来用事实说明真相，为两

国妥善解决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创造条件，同时也是在新形势下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贡献？事实恰恰说明，印度有这样的学者。本书作者卡鲁纳加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便是其中之一。

卡·古普塔1916年3月30日生于达卡，1941年获加尔各答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曾一度在伦敦罗亚尔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印度国际事务委员会研究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

在1947年独立以前，印度的"边境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大权都掌握在少数英籍官员之手，能够过问这方面机密的印籍官员，如果有，亦屈指可数。负责锡金、不丹、阿萨姆北境以及我国西藏地方一线的人事情况，亦不例外。这些训练有素；熟谙边情的专业人材，人数不多，但他们往往能起到远远超过他们本职或地位所能起到的作用。他们有一个传统理论，那就是：为了确保印度北部的安全，喜马拉雅山是不够的，还必需拿我们的西藏地方去做他们的缓冲区；再加上一个软弱无能、听人摆布的腐败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做他们的邻邦，否则，就会构成对印度的一种威胁"。[1] 在印度独立后，这种传统理论实际上仍然支配着印度政界和外交界的一些重要人士，甚至在学术界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① 引自柳陞祺《读〈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即〈中印边界秘史〉)书后》，载1982年第一期《西藏研究》。

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在这些人士的影响下，印度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华浪潮，使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卡·古普塔十分重视中印友好事业，在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他认为边界问题成了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障碍，而印度人民对它的真相并不了解，所以更加专心致志地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他"力排众议，尊重史实，勇于探索"，[①] 多次到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查阅档案和资料，写出了一系列很有份量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在帮助印度公众了解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卡·古普塔治学态度严谨，学风正派，尊重史实，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同，他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发表后，便遭到很大的责难和非议，他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学术地位，经济待遇也受到影响，1981 年 3 月在没有养老金的情况下退休。卡·古普塔的个人经历和遭遇是坎坷的，但他的著作和文章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闪耀着光芒。

卡·古普塔的著作计有《印度外交政策》(1956 年)、《世界政治中的印度》(1969 年)、《中印边界秘史》(1974 年) 和《中印关系 1948—52：K·M·潘尼迦的作用》(1985 年) 等。他还发表了《麦克马洪线 1914—45：英国的遗产》(1971 年)、《英国给予自由

① 引文出处同上。

印度的遗产》(1978年)、《边界争端中一则神话》(1978年)、《可疑的文件》(1986年)和《印度与东亚的安全问题》(1987年)等论文。我们之所以翻译和向读者推荐与介绍《中印边界秘史》这本书，是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充实，论证比较有力。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英印政府档案，对中印边界的历史作了有根有据的阐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此书出版至今虽已有15个年头，但对了解和研究中印边界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印边界秘史》对中印边界东段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统治时代印度东北边境变化多端的历史表明，独立的印度在1947年继承了一项难办的遗产，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在国际法上缺乏牢靠的根据"。[①] 作者在作出这一结论时是经历了一个艰苦、认真和深入的研究过程的。他曾特地自费到伦敦查阅历史档案，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发现了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原版，并将它与1938年出版但却印作1929年的伪造版本进行对照，比较差异，详加评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奥拉夫·卡罗的"不道德"行为和犯有"伪造罪"的面目，从而使公众对中印边界东段的历史真相，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原来于1929年由英属印度官方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对1914年的中英藏西姆拉会议只有一段极为简

① 见本书130页。

单的叙述，说明会议"试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但是，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而西姆拉条约本文和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之间的秘密换文及英藏通商章程均未收入。后来曾任英国统治期间印度外交秘书的奥拉夫·卡罗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经印度事务部同意，偷偷摸摸地下令将《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的1929年版本收回销毁，并于1938年发行了伪版本，但出版年份却注明为1929年。伪版本将上列三项文件的正文全部收入，并对解说词作了篡改，企图以此作为英方自1929年即将上列文件公开发表的证据，为日后边界交涉留下伏笔。1960年中印双方官员会晤时，印方正好利用这一伪造版本，说什么上列文件在1914年以后的第一版（即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中即予公布等等。印方的这种错误论点在后来不攻自破，是与古普塔在研究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

《中印边界秘史》在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研究方面也有进展。作者认为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并没有条约、传统习惯方面的依据，即使根据印度所一贯主张的分水岭原则来划分边界，情况也对印度不利。尼赫鲁对西段的边界争端本来想采取妥协的办法，并于1959年9月13日发出指示，禁止巡逻队在拉达克向前移动。但是内政部和情报局于10月21日擅自派出了巡逻队，引起了空喀山口冲突。对这次冲突的性质和起因，印度政府一直未向印度公众公布。在1959年10月23日尼赫鲁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情报局成为陆军和外交部的共同攻击目标，被指责进行扩张和制造边界挑衅。……”但在公开场合，印度政府却“谴责中国在空喀山口进行‘无端侵略’。”[1]这使印度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顶点。从1959年11月起，尼赫鲁在对西段的边界要求上，采取了僵硬的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受了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S·戈帕尔博士的影响和蒙蔽。戈帕尔曾被派往伦敦查阅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档案中有关印度边界的历史资料，并对历史证据作出客观评价。但戈帕尔1959年11月向尼赫鲁报告说："印度在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卡·古普塔经过调查，认为在伦敦并没有任何可以支持戈帕尔论点的证据。他还指出，"中印僵局在印度政府作出认真努力，就中印争端的根源对公众进行再教育前，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这话很有见地。

当然，由于民族的历史的局限性，在《中印边界秘史》中也有一些欠妥之处，如书中一再提到我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原先的做法很不相同，对印度在麦克马洪线南侧地区的扩张活动不加抗议，采取默认的态度。这种看法和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1951年2月初，印度强占达旺时，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当局曾向印度在西藏的官员表示抗议，要求印度政府将到达达旺的官兵立即撤走，在1960年中印两国官员会晤时中国政府作过充分说明，后来在边界

① 见本书43页。

战争发生的前后，中国政府又多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这种情况，成书于 1974 年的《中印边界秘史》，怎能说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默认”呢？又如书中多次使用“西藏的自主权”和“缓冲国”等词语。说明作者在语汇和概念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昌都的解放被称为“失陷”。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缺点，我们还是认为《中印边界秘史》是一本好书，其作者卡·古普塔不失为是印度的一位正直和杰出的学者。过去，印度公众对中印边界的历史不甚了解，在边界争端表面化，特别是边界战争发生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物和不够严肃的学术界人士掩盖历史真相，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起了非常有害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卡·古普塔抱着探求真理的目的，勇敢地站出来，逆风而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研究，用史实向印度公众说明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卡·古普塔是一位印度学者，他的著作对印度公众特别具有说服力。

还应当指出的是，卡·古普塔在《中印边界秘史》的第二部分中，也表现出他所具有的深刻、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他分析了西方各国通讯社在有关朝鲜战争报道中的差异和矛盾，对比了麦克阿瑟的公开声明和在国会中作证时的证词的不同，指出联合国观察员向安理会递交报告的时间不合常理，向读者揭示了有关当局企图掩盖李承晚军队首先向北朝鲜的海州发

动突然袭击，而挑起了朝鲜战争的史实真相，尽管他认为这个问题仍需彻底研究。

卡·古普塔勇于追求真理、治学态度严谨、尊重史实的精神和他正直的道德风范深深赢得中国人民的尊敬，1980年他应邀访问了中国，从此与中国同行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1987年8月27日，卡·古普塔在一封信中指出："S·戈帕尔博士以他不久前出版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卷三的附录，在对印度人民进行新的洗脑"，因为该附录声称，"整个阿克赛钦高原和林津塘平原曾为拉达克和克什米尔政府所管辖（该书第303页）。但据1914年西姆拉会议地图，林津塘是包括在西藏版图内的；在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的三卷本《横贯喜马拉雅山》一书中有一幅赫丁博士在西藏旅行的彩色路线图，从该图中，人们可以看出克什米尔、林津塘和阿克赛钦的相对地理位置。……显然，戈帕尔博士在这方面是向我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过去35年来，戈帕尔博士象印度史的学阀一样支配着史学界。但是我希望时代将发生变化。"①

1987年9月27日，卡·古普塔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的那些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在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印友好事业的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山水相连的亚

① 引自卡·古普塔1987年8月27日给王槐挺的信。我对王槐挺同志提供的这一信息和有关资料深表感谢。

洲大国，数千年来一直友好相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在近代又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凌辱，目前两国又都面临着建设和发展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都十分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对中印两国来说，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分歧之点。何况边界问题本是英帝国主义者留下来的遗产，尽管十分复杂，只要中印双方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谅互让，是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的。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印两国关系逐渐有所改善，两国政府都表示愿意解决边界问题，双方的政府官员也多次就边界问题进行过接触。不久前，拉·甘地总理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1954年尼赫鲁访华后三十四年来印度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访华，自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相信，随着中印两国各方面的联系和友好关系的加强，困扰着两国政府和人民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的边界问题，必会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得到妥善的解决，卡·古普塔所十分珍视的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是，尽管《中印边界秘史》一书早就应当介绍给有关研究部门和广大读者，但是由于出版困难，它一直被束之高阁。只是在陈家琏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才欣然动笔，于半年内完成了译稿。译稿完成后，郭一凡、吴伟同志不辞辛劳，认真进行了通读和推敲，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使译文的准确性

和全书的质量大有提高。对他们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我们深表感谢。

王宏纬

1989年9月30日

目　录

导　　言

（一）

中印友好是尼赫鲁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早在侨提利耶时代就流行着“强大的邻国乃是潜在的敌人”的谚语。但是印度和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尽管意识形态不同，却由于遭受一个多世纪白人殖民主义苦难的共同经历，相互间产生了同情。即使在共产党中国于1950年秋决定对西藏建立自己的领导权的情况下——虽然西藏在过去40年里曾享有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地位——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与打着联合国旗帜的美国军队的对抗中证明了她的威力，亚洲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尼赫鲁也大方地接受了这一变化。1951年1月尼赫鲁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时说道：“中国依恃她新近获得的力量，有时以令我深感遗憾的方式行动处事。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国象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所具有的经历：长期的斗争和挫折，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凌辱，列强拒绝平等地对待他们。忽视几亿人民的感情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实际的。如此处事，再也不会平安无事了。”美国拒绝承认

共产党中国。美国对北朝鲜和福摩萨的干涉和威胁并要对越南进行核打击，还有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增加了在亚洲发生一场新战争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尼赫鲁希望通过中印合作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在1954年4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度爽快地放弃了英国统治者根据其合法性值得怀疑的1914年7月秘密英藏贸易协定而在西藏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签订1954年4月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的谈判向尼赫鲁提供了充分的征兆：共产党中国可能准备默认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印度还破天荒第一次取得在拉萨建立一个常设总领事馆的权利，这就向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监听站，可以搜集喜马拉雅山以北广阔高原事变发展的情报。中国对印度于1951年2月接管达旺的默认和她未曾在北京谈判桌上就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活动提出问题，使得尼赫鲁相信，共产党中国对印度企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山脊，即麦克马洪线，并将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的愿望会采取调和态度。这与国民党中国的态度大不相同，后者曾对1914年7月西姆拉条约的合法性正式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印度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就各种国际问题给予中国的外交支持，在五十年代初期也加强了印中友谊的基础。

（二）

本书的主题是陈述复苏的亚洲主义感情——这种感情曾在五

十年代使印中两国生气勃勃并使她们在面对迅速建设国家的巨大任务中更加接近——如何由于某些复杂因素所起的作用和恰好同时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受到破坏。早在1950年至1951年，尼赫鲁就给在朝鲜战争期间担任我国驻联合国使节的B·N·劳爵士写信说："我以为无论是美国和英国一方，还是苏联一方，都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不想看到印度和中国彼此友好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件应予铭记不忘的有意义的事实。"（《在朝鲜危机期间的尼赫鲁与联合国》，1965年12月7日《政治家报》。）

除了大国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外部势力，利用印度本身作为他们反华活动的基地，在致力于破坏中印团结。有一个强有力的院外援台集团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活动；他们与一些心怀不满的西藏贵族紧密合作，这些贵族的大多数是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建立后到噶伦堡去避难的。也许既代表院外援台集团又代表以印度为基地的院外援藏集团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他曾在黄浦军校受过教育，并和一位与蒋介石将军有关的显宦豪门之女结婚。据A·R·菲尔德教授说，国民党中国在西藏的情报网，是嘉乐顿珠奠定的基础。在中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后，嘉乐顿珠便将他建立的机构从西藏转移到印度。嘉乐顿珠作为西藏独立的提倡者，在客居印度的西藏流亡者当中一直非常活跃。他的活动引起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他的忿怒，以致他们在1958年7月的一份官方照会中要求印度政府使他离开印度。一直

作为西藏独立事业的公开拥护者的乔治·帕特森在他的《暴乱中的西藏》(英文版第152至153页)一书中透露：嘉乐顿珠1958年8月4日在噶伦堡召开的一次西藏叛乱者（包括达赖喇嘛的内阁阁员和来自与西藏接壤的康巴人地区的游击队领导人）会议上在起草西藏独立宣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嘉乐顿珠的名字一再出现在西藏自由战士为争取世界公众支持的努力的新闻报道中。他的生活方式，以及自从他于1950年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以后前往台湾、美国和欧洲的几次旅行，表明嘉乐顿珠已卷入了相当高层的折磨中国的游戏。他在五十年代与印度政府某些身居要职的官员——诸如驻锡金的政治官员阿帕·潘特和情报局局长B·N·穆立克——密切的个人交往，可以部分地说明在所有这些年月里，为什么印度政府没有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停发他的印度居留证的要求。不丹政府最近披露了某些事实，它们清楚地说明一些西藏流亡者在嘉乐顿珠的鼓励下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的另一边所进行的反华活动的可憎性质。许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深受他的兄长嘉乐顿珠的影响。自从印度于1959年4月给予他政治避难权以来的所有这些年月里，他一直受到鼓励去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言论，向美国、英国和西方世界乞求援助以恢复西藏的自由——这样就违犯了“政治避难”的根本条件。(自1959年以来，这一直是中印误解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1960年4月25日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阐明了这一点。)最近达赖喇嘛

赞赏苏联共产主义成就的言论表明，流亡的西藏领导人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利用了中美僵局并从整个西方世界获得支持后，现在又企图在中苏僵局的混水中摸鱼。

我的论点之一是，西藏领导人自五十年代以来在损害中印关系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是在他们从西方的各种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之下进行的。有关这点，我们可以恰当地引用K·齐利亚克斯的评论："这是强权政治的报应：事情常以大国驱使小国作为马前卒开始，而以小国利用大国间的敌对达到自己的目的告终。"西藏领导人象《天方夜谭》里航海家辛伯达故事中的老人那样，稳稳骑在印度政府的脖子上利用中印僵局的时间太久了，这已造成双方承受巨额军费负担的后果，并且危害第三世界团结一致抵抗富有世界压力的事业。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不丹和锡金等国的一些领导人在使中印僵局永久化方面也有某种既得利益的考虑，因为她们从中得到了重大好处。

还有必要在此提及一些英国官员在英国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他们在美国的杜勒斯宣布"让亚洲人打亚洲人"以前很久，便一直奉行着这一格言。对奥拉夫·卡罗爵士的经历作一番研究便可证明，这位在英国统治期间于1939年至1945年担任过印度外交秘书的令人生畏的学者，是尼赫鲁的具有反殖民主义色彩的不结盟政策的激烈批评者，曾于1951年向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情，主张给巴基斯坦军事援助，力图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在

新德里任职期间，他于1938年安排出版了有关西藏的《艾奇逊条约集》的赝本，禁止发行原来的版本。他的目的是歪曲真相，硬说1913年至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三方会议取得了部分成功，通过一项英藏双边声明，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脊线——即麦克马洪线——确定了印度的东北边界，而中藏边界线则由于中国人的不妥协态度未能得到解决。1945年，在卡罗的指导下，休·理查逊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西藏概要》的官方手册，其中再次重复了关于西姆拉会议认可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脊线的印藏边界的谎言。虽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事被遗忘了一些年代，但在三十年代后期，有人重新发现了它，并努力要使这一边界变为现实。这两个官方文件在1959年4月西藏暴动和达赖逃往印度后被证明是造成中印关系大破裂的两个货真价实的定时炸弹。当印中边界争端自1959年9月公开化以后，印度政府竟求助于奥拉夫·卡罗爵士来为麦克马洪线事件辩护。这是对历史的嘲弄。在1960年2月13日《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此事的文章中，卡罗重复了由他出版的有关西藏的《艾奇逊条约集》伪造版中收入的论点，并且强调麦克马洪线与确定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的杜兰德线一样，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1963年秋天，奥拉夫·卡罗爵士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印度，表面的理由是就定居在印度的西藏难民问题向他们提供咨询。据报道，正是由于他的劝告，印度政府才吸收了一大批西藏流亡者，在给予他们必要的军事训练

后，将他们派往整个喜马拉雅山边境沿线的边境哨所。这是印度方面在外交上的严重失误行为，它招致了中国对克什米尔、那加兰德、米佐拉姆等地少数民族领土收复主义领导人的支持，可能证明是中印和解的绊脚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告诉我们，“B·J·帕特奈克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印度对华战争》，英文版第440页)。乔治·帕特逊也谈到大量招募西藏人在将来任何对华战争中让他们和印度军队一起作战。(《北京对德里》，英文版第166页)。

现在，我们谈谈苏联在中印关系的持续僵持中所起的作用。据莫亨·拉姆的意见，中印争端不过是更加复杂的中苏争端所起的一个作用，在中苏关系得到缓和以前，想使印中关系正常化是徒劳无益的。阿拉斯太尔·兰姆教授将中国与其两个大邻国边界争执的性质作了比较后写道，“在中苏边界问题上，很可能是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了边界问题，而不是相反；但有充分的根据相信，在中印边界上，是由于未能解决边界问题引起了国际关系的危机。”(《中印和中苏边界》，载于J·陈和塔林所编《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研究》一书，1970年。)自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公报以后，苏联领导人不时就持续不断的中印边界争端发表公开声明。苏联原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双方的边界要求选择了一种善意的中立态度。然而，尼赫鲁和克里希纳·梅农力图利用苏联的这种中立，他们指出这是苏联自1917年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共产党国家

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争端中采取中立立场。中国方面有关中苏争端起源的文件也尖刻地提到1959年9月的塔斯社公报首先将世界共产主义内部的裂隙公开出来。

从另一方面说，苏联地图关于中印边界一向的划法大体上都符合中国的要求，为此新德里不时感到深深的懊恼。正如一位驻莫斯科记者在1974年6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上所写的："在1962年中印战争10年之后，尽管苏联对中国的印度政策的批评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和频繁，但是莫斯科对边界要求的是非曲直拒绝表明自己的立场。"甚至1971年8月3日印苏条约的签订也未立即改变苏联对中印边界要求的看法。但是在1972年12月，新创办的俄国《远东事务》季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印度次大陆政策的历史的长文，该文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以印度为中心的观点出人意料。在苏联院士们的这一刊物的1974年3月号上，编辑们决意发表一篇严厉批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出版了四年的《印度对华战争》(1970年)的文章。苏联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此文，其意义看来并不亚于文章的内容。它是正当印度受到大国间抗衡和关注的逆流的强烈冲击时问世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苏联一直明显地对北京和新德里可能以不利于她在南亚的大国利益和中苏冷战现状的条件达成和解感到严重关切。可以预料，苏联外交将积极阻挠中印缓和进程。这也许是人们能对来自苏联世界的好几位高官显贵在他们最近访问印度期间就有关

中印边界争端发表反华声明作出的唯一解释。

无论世界各国对中印和解可能会采取什么态度，中印两国解决她们15年之久的争端是符合双方切身利益的。这一争端不象中苏争端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尼赫鲁、克里希纳·梅农和K·P·S·梅农等我国早期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都同意，我国与中国沿着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漫长共同边界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他们十分懂得寇松勋爵的名言："边界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国家的战和与存亡等现代问题都危险地取决于它"。他们所指望的解决办法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创造一条象加拿大和美国边界那样的和平和友谊的边界。他们也懂得这个解决办法只有在西藏自治和中国主权这两个概念之间取得折中才能达到。在这里提一下下列情况是恰当的。在中国方面也至少有一位杰出的学者认真地考虑了中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无论世界局势会如何发展……中印之间达成诸如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那种谅解，并签订一项协议，使在印中两国地理上都具有控制因素的喜马拉雅山非军事化，那就不仅会成为西藏自治地位的保证，而且也将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李铁铮：《西藏今昔》，1960年英文版第217页。）

（三）

1950年至1953年期间，朝鲜变成了战场，交战的一方是打着

联合国旗帜的西方集团的军队（由美国领导），另一方是以北朝鲜人和中国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军队，而苏联则成了他们的军火库。朝鲜战争虽被西方看作是“有限的战争”，但却被尼赫鲁看作是有史以来第三次最大的战争。美国伤亡了142,000人，英联邦军队损失7,000人，土耳其3,000人。这些数字与中国人和朝鲜人遭受的巨大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J·F·杜勒斯说，仅在北朝鲜，就有1,000万人被杀。对一个认真研究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说，仔细研究朝鲜危机是非常必要的。正如K·P·S·梅农所写的那样，“是朝鲜使印度第一次深深感到了冷战的严酷现实。印度独立才四个月，便被任命为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并被选为主席。而也正是在与朝鲜有关的活动中，印度反过来使世界对不结盟政策的现实得到深刻印象。”

研究朝鲜战争起源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学者所具的重要性，可以从埃德加·斯诺在1963年所作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看出：“北京政府至今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也似乎相信——南朝鲜在美国唆使下首先发动了进攻。我没有看到有关这点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不相信这点，大半个世界也不相信这点。(如果这能得到证明，十多年的世界历史将必须完全重写。)”(《大河彼岸》，英文版第714页。)

《朝鲜战争的起源和印度的立场》一文发表于1956年6月号《加尔各答评论》。我在该文中呼吁成立一个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在

一位印度主席的主持下调查朝鲜战争的起源。自 1958 年 7 月以来，主要是由于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进行的敌对活动，使印度作为调解人的角色在中国人眼里变得可疑起来，因而这个意见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第　一　部　分



一、中印边界秘史

（1947年—1959年）

"在国际政治中，说的是一套而想的是另一套，本是古已有之的习惯。"
（伯德伍德勋爵：《一个大陆的决定》）

1947年至1954年

印度各阶层的广大公众对英国遗留下来的北部边界真相一直毫无所知。自由印度1947年至1952年期间出版的印度测绘局地图，将不丹以东的印度东北部沿着喜马拉雅山高处山脊线的边界画成"未标定界"，而将从克什米尔西北端起到尼泊尔、西藏和印度三方接合点为止的北方边境的西段和中段则用一抹淡彩表示，并在沿线三处标明"边界未经规定"字样。英属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的权威出版物，即通常所说的《艾奇逊条约集》，在与克什米尔相关的部分明确写着"克什米尔邦的北部边界和东部一样仍未经规定。"（第12卷第一部分，英文版第5页，1931年。）

印度公众从未为克什米尔一段的“未定界”伤过脑筋，因为印度政府自1947年10月以来不时声明克什米尔的未来将在来自巴基斯坦领土的入侵者撤离后通过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最后决定。在1954年2月巴美军事援助协定签订后，印度对克什米尔未来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但即使在那时，我们发现直到1957年12月2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还注意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均“承认并接受其1948年1月17日和1948年8月13日决议的规定以及联合国印巴委员会1949年1月5日的决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按照它们的条款——预计克什米尔邦的未来地位将通过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方法，根据民众的意志来确定。”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无论是尼赫鲁在1954年10月访问北京还是周恩来在后来于1956—1957年的冬季访问印度时都没有特别提出任何有关克什米尔边界的争论。仔细审视一下中国地图[①]即可看出，自三十年代（甚至更早），它们便将喀喇昆仑山脉作为克什米尔北部的边界，而且直到1958年印度政府以激烈的方式作出反应前从未认真地对此提出过异议。

在1946年至1949年，即以蒋介石将军为领袖的中华民国时期，任何一方都没有公开提出过北部边界问题。但是1947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上，中国代表就悬挂一幅将西藏划

---

① 例如中国外交部所编《中国手册》（1937年至1943年）一书的附图（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原注。

在中国版图之外的亚洲地图一事强烈抗议，结果是这幅地图被撤掉了。不过，在这个时期，还是就有关边界问题交换了几次官方照会。1947 年 10 月 16 日，西藏政府致电印度政府，要求归还阿萨姆至拉达克——包括诸如锡金、大吉岭和不丹等地——据称属于西藏的领土。中华民国曾就英国逐步蚕食“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声称属于她的领土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递交过四次抗议照会（1946 年 7 月，9 月和 11 月以及 1947 年 1 月）。1947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发出照会就同一问题向印度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1949 年 11 月 18 日，国民党政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向印度外交部递交照会，拒绝印度政府认为是有效的西姆拉协定。由于这些照会都是密件，印度公众不知道在东北边境他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一个令人烦恼的边界问题。

在1949年12月30日承认中国人民政府后不久，印度政府认为有必要向公众表明他们认为麦克马洪线是在法律上有效的边界线。尼赫鲁1950年2月8日在议会就西藏的国际地位回答 H•V•卡马特的质询时说：“本世纪初，当时的印度政府、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这个会议上作出了某些决定。粗略地说，这些决定谈的是关于称作麦克马洪线的西藏和印度间的边界问题，决定谈到西藏应被当作一个自治国家对待，只要中国同意这一点，中国的某种主权便应得到承认。他们同意了这点。但是后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一协议，因而未予签署。事实

上，虽然印度和西藏一向履行该项协议，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正式签署它。事情就停留在这么个阶段。西藏被当作一个自治国对待，而它与中国的确切关系没有被中国接受。”

戴布坎塔·巴鲁阿赫于1950年3月17日在议会透露的事实表明，西藏官员仍在东北边境特区山地部落中强行征收钱财，他还透露阿萨姆政府每年仍向在西北边境特区内西藏管辖的达旺寺支付5,000卢比，而这些钱的大部分均被送往拉萨的哲蚌寺。这样，人们知道了西藏人并没有遵守1914年的西姆拉协议，而且仍然继续占领着不丹以东的达旺地区。

随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远东突然出现了一种危险局势。开始，印度认为北朝鲜对于南朝鲜发动侵略负有责任，因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支持了一项由美国提出的对苏联的卫星国北朝鲜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两个大国，即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由于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占有她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而台湾政府却被允许代表中国。苏联在1950年1月13日至7月31日期间为此表示抗议，抵制了安理会的活动)。中国和苏联对印度在一个冷战问题上与西方站在一边感到忿恨。当时印度驻华大使萨达尔·K·M·潘尼迦成功地对有关朝鲜冲突的事实提出了一个胜人一筹的估价，使尼赫鲁确信不使朝鲜的两个近邻——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安理会中，就不可能解决朝鲜冲突。1950

年7月13日尼赫鲁亲自致电斯大林和艾奇逊，请求早日进行斡旋，以结束朝鲜的流血冲突，并在电文中强调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安理会的必要性。这一和平努力尽管由于美国的不妥协态度而归于失败，但在印度开始与中国对话以解决诸如西藏等双边问题上却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气氛。

1950年8月，在印度大使萨达尔·K·M·潘尼迦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中国外交部官员之间有多次信件往来。当时的中国报刊和广播经常提到必须立即"解放"台湾和西藏。印度在1950年8月12日的照会中声明："印度政府对西藏过去从未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在这份照会中，印度政府还向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对边界那边可能发生动乱的状况感到关切，并强烈主张中藏关系应当通过和平协商使之稳定。中国在1950年8月21日答复说，中国政府"高兴地得知印度政府要稳定中印边界的愿望"。它还表示，他们愿意用和平和友好的办法解决西藏问题。8月22日周恩来召见萨达尔·潘尼迦举行一般性讨论。在交谈中，潘尼迦借机极力强调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克制与温和的态度是可取的，并提出了西藏问题。潘尼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西藏，我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有点捉摸不透。我表示希望他们对西藏采取和平政策。周恩来回答说，解放西藏是'神圣的职责'，但他的政府热切希望通过谈判而不是军事行动达到他们的目的……。"（《在两个中国》，英文版第105页。）8月26日，K·M

·潘尼迦在一项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承认给予西藏的区域自治是"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自治"，并说"印藏之间得到承认的边界应当继续不受侵犯"。1950年8月31日，中国外交部通过潘尼迦大使通知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照既定计划不久将在西康西部采取行动，表示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使它能在9月中旬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

1950年10月7日，当在美国统率下的联合国军队决定跨越三八线侵入北朝鲜时，尼赫鲁强烈反对这一行动。除了道义上的原因外，尼赫鲁相信，入侵北朝鲜必将导致中国的干涉，而这可能引起远东冲突的扩大。此时，中国军队袭击了安康西部有争议地区的边界城市昌都。10月19日昌都失陷（按：即昌都的解放），中国人作好了要入侵西藏的准备。应召前往北京为求得政治解决而进行谈判的西藏代表以貌似有理的借口，在印度若无其事地耽搁了六个多月。显然，他们得到了印度外交部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1950年10月25日，北京电台广播说解放西藏的进程开始了。10月26日，印度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抗议在西藏使用武力。10月30日西藏政府请求新德里在它与中国的争端中给予外交支持。在1950年10月31日的第二次照会中，印度再次就向西藏派遣军队的问题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并借机提醒中国，印度政府从英国统治者手中继承了一些在西藏的特权。（这些特权指的是在拉萨派驻一名印度代理人，在江孜和亚东设置商务机构，在到江孜的商

路沿线保持邮政和电讯机关和在江孜驻扎一小队卫兵。)印度的照会没有提及这些特权主要产生于 1914 年 7 月 3 日制定的秘密的英藏贸易章程，而这个章程却是于同天制定的被中华民国宣布为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的副产品。尽管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在西藏事务上进行这种外交干涉感到不满，中国军队没有从昌都继续向西推进。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也没有象他们在 1950 年 10 月 26 日致中国的照会中所含蓄地警告过的那样，企图旷日持久地劝阻在此以前一直留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

但是在 1950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印度政府内部对究竟应当给予西藏政府多大支持，使其保持自 1912 年以来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一事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副总理萨达尔·巴拉瓦巴依·帕特尔赞成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他得到一些内阁成员和外交部的支持。但是陆军总参谋长恰里阿帕将军对为使西藏不致落入中国之手而采取军事干涉的计划泼了冷水。(B·N·穆立克:《中国的背叛》，英文版第 80 至 81 页。)在印度的一些官方集团的鼓励下，西藏政府于 1950 年 11 月 7 日向联合国提出共产党中国的入侵和侵略的控告。当此事于 1950 年 11 月 15 日提交总务委员会时，委员会决定不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该委员会的印度代表说，他确信可以取得和平解决，西藏的自治能够得到维护，并且认为，确保这点的最好办法是放弃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在得不到各大国的任何种类的军事或外交支持的情况下，达赖喇嘛为躲避中国

的进攻而于1950年12月21日离开拉萨，到靠近印度边界的亚东定居。达赖喇嘛还写信给印度政府，寻求政治避难，但是这个要求在K·M·潘尼迦的建议下被拒绝了。

1950年11月7日，主张对西藏采取干涉政策的萨达尔·帕特尔在一封给尼赫鲁的密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感情。萨达尔·帕特尔在信中断言，"……边界线的未确定状况和在我们一侧存在着与一个西藏人或中国人有着姻亲关系的居民，成了中国与我们自己之间的一切潜在麻烦的因素……共产主义并非抵制帝国主义的盾牌，而……共产党人象任何其他人一样是些好的或坏的帝国主义者。中国在这方面的野心不仅针对着我们这一侧的喜马拉雅山山坡，而且还针对着阿萨姆的重要部分。"（见库尔迪普·纳亚尔《两线之间》一书中的引文，英文版第218页。）1950年11月9日，萨达尔·帕特尔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失口说出在西藏问题上原本会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话。在内阁内部存在着尖锐分歧的情况下，尼赫鲁认为有必要向印度议会的议员们保证，"有地图也好，没有地图也好，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任何人都不许跨越这条边界"。尼赫鲁在同一次讲话中还向议员们保证："从拉达克至尼泊尔的边界主要是根据长久以来的习惯所划定。"（1950年11月20日。）在回答一位议员关于这个边界是否得到现存西藏政府确认的质询时，尼赫鲁承认印藏边界的有些部分没有得到确认。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边界的哪些部分未为西藏政府所接受。1950年12

月 6 日，尼赫鲁在议会重复了 1950 年 3 月 17 日发表过的一项声明，即喜马拉雅山脉构成了印度北部的传统边界，既然尼泊尔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侧，对尼泊尔安全的任何威胁都将被看作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

1950 年 11 月，印度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由国防部副部长希马特·辛格吉少将为主席，有国防、交通、内政和外交部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研究中国入侵西藏所产生的问题。1951 年 2 月建立了北部和东北部边界防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于 1953 年初递交给国防部。委员会的主要建议是“重组和扩充阿萨姆步枪部队，扩大东北边境特区的行政机构，发展边界沿线的情报网，发展民事武装警察，发展通讯和检查哨所。”（总理《论中印关系》第 1 卷：《在议会的讲话》，英文版第 251 页。）边界防务委员会必定也提出它所建议要防卫的北部和东北部边界的确切界限。

可是，由于朝鲜战争在 1950 年 11 月有扩大的危险，印藏边界问题在一段时间内降到了不很突出的地位。中国军队在西藏东部边境的昌都陷落后没有再向前挺进。尼赫鲁对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军于 1950 年 10 月跨过三八线侵入北朝鲜的决定一向非常不满。1950 年 11 月下旬麦克阿瑟将军发动的攻势在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反攻之下归于失败，以及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关于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谈话，增加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这还在全亚洲激起了反对西方的情绪。此时，尼赫鲁开始意识到，由于中

国这个有能力对付美国在亚洲的挑战的难以对付的大陆强国的出现，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意识到印度在新的力量对比中因采取中间立场而取得了有利地位。正如V·L·潘迪特夫人所说的，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在亚洲，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比共产主义更大的威胁。"（《纽约时报》，1951年1月1日。）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就必须避免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争吵，以便她能在交战双方之间扮演一个诚实的和平掮客的角色。1951年1月13日，尼赫鲁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中说："中国依恃她新近获得的力量，有时以令我深感遗憾的方式行动处事。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国具有象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的经历：长期的斗争和挫折，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凌辱，列强拒绝平等地对待他们。忽视几亿人民的感情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实际的。如此行事，再也不会平安无事了。"

1951年1月，在中国发起反攻之后，中国人与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展开激烈战斗，打得难解难分，而印度则忙于领导联合国中的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在联合国寻求一种基于战前状况的和平解决办法。2月2日，印度政府决意接管虽然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但仍是西藏政府的一个重要中心的达旺。中国没有就印度占领达旺一事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但是当消息传到拉萨时，西藏人在印度驻拉萨使团前举行了游行示威。共产党中国对达旺问题不动声色的默认，使印度政府相信有可能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建

立印度的控制而不致遭到北京的任何反对。这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大不相同，后者在印度侵入东北边境特区的问题上曾多次提出抗议照会。东北边境是中国能向印度发动进攻的唯一脆弱地区——至少自1910年(当时赵尔丰将军的军队在开赴拉萨时曾在东北边境特区到处活动)以来，印度陆军总部一直是这样看的。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印度政府的外交和政治部一直想把东北边界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推移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脊。但是由于西藏政府的强烈反对，强大的英国统治者未能将麦克马洪线变成印度的东北部边界。因为英国政府要与西藏保持最良好的关系，以便利用它作为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鉴于1951年2月的第一周对达旺的接管没有遇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反对，印度政府正确地认为，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心理上已作好了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事实上的边界线的准备。1951年2月1日，印度和缅甸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美国提出的宣布中国在朝鲜犯了侵略罪行的决议的仅有的两个非共产党国家。这导致了这个时期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改善。1951年2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里说："议会会记得，我们曾为西藏的某些事态的某种变化感到悲伤，但是我们没有让它影响我们的政策或同中国人民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我要高兴地说，我们与新中国的关系现在是友好的。"

1951年3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B·V·凯斯卡尔在印度议会阐明印度关于印藏边界的政策时说："政府并不是对保卫我们与

西藏接壤的边界漫不经心。我可以进一步说，政府认为保卫这段边界的最好办法是有一个友好的西藏和一个友好的中国。显然，如果我们的邻国对我们抱敌对态度，如此错综复杂和漫长的边界是不可能得到很好保卫的。因此，我们觉得在处理西藏和中国问题时，我们应时刻记住一个友好的中国和一个友好的西藏是我国国防的最好保证。”（《议会辩论》，第 9 卷，1951 年第三次会议，第二部分，第 5320 栏。）

到 1950 年底，西藏政府认识到无论是印度或其他大国都不会在外交上或军事上支持他们实现独立的要求。1951 年 4 月，中国代表团与西藏代表团在北京开始谈判，结果产生了 1951 年 5 月 23 日的 14 条协议。[①] 这个协议保证给予地方自治，但是规定西藏军队必须逐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独自处理对外事务。

从尼赫鲁 1959 年 11 月 25 日在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我们得到了中印两国在 1951 年至 1952 年期间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谈的年表。“……在 1951 年 9 月 27 日与印度大使进行的一次非正式交谈中，周恩来总理表示了在‘印中之间没有领土争端或争论’的西藏问题上尽一切可能保护印度在西藏的利益的愿望。”他还说：“稳定西藏边界的问题是印度、尼泊尔和中国共同关心的事情，可

---

① 原文如此。应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内容有 17 条。——译注。

由三国通过讨论取得最好的解决。既然中国军队在执行 1951 年中藏协议中开进了拉萨，着手处理边界哨所问题，就有必要尽早解决这个问题。”……1951 年 10 月 4 日，印度驻北京大使……通知中国总理，印度政府欢迎就周恩来总理所提的各项问题举行会谈。

1951 年 10 月，萨达尔·潘尼迦回到印度，在外交部就对西藏问题应取的态度进行磋商。潘尼迦希望中国人不要把大量军队调进西藏……他进一步说，在现时代的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中是不容有治外法权存在的。如果印度坚持继续享有英国人过去在西藏强行取得的权利，她将把自己完全置于理亏的地位。无论如何中国不会同意继续给予这些权利。印度则除了使用武力以外，别无它法实施这些权利，而在武力方面印度又无能为力。所以，上策是大方地放弃所有无法得到的东西，而坚持更带根本性且不必一定有条约作依据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印度政府完全同意潘尼迦的看法。”（B·N·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 147 页。）

1952 年 2 月，印度大使在会见中国总理时说明了印度在西藏的现有权利，并且重申印度愿意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周恩来总理回答说：“在维护印度在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方面不存在困难。”他在回答时没有涉及边界问题，印度大使当时也没有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尼赫鲁 1959 年 11 月 25 日在议会的讲话。）

1952 年 5 月，在离开中国前，潘尼迦与周恩来又进一步就有

关西藏问题谈了几次话。他在接受我们在该地区的贸易和文化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建议将合法性有问题的驻拉萨政治代理处改为印度驻拉萨领事馆，使之合法化，作为交换，中国在孟买设立一个相应的机构。至于我国的邮政等其他方面的机构，其中一些如电报线路，在亚东的武装卫队，到时可以不事声张地予以取消，而商务代理和其他附属机构则可纳入正常领事关系的范围。这些问题可在条件成熟时着手处理。（《在两个中国》，英文版第175页）。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边界问题。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公布了一个事实：于1952年5月间退休并被任命为孟买省省长的外交部第一任秘书长G·S·巴杰帕伊爵士，曾于当年给他的老部门外交部写信，敦促印度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他警告说，对中国来说麦克马洪线可能是“英国在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留下来的创伤之一，中国可能设法在调整边界的基础上医治或消除这个创伤，这种调整可能既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尼赫鲁与当时为进行磋商而回到新德里的驻中国大使K·M·潘尼迦讨论了这个建议，并由后者回复了巴杰帕伊。他告诉巴杰帕伊，总理已经作出决断，认为提出麦克马洪线的问题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他解释说，尼赫鲁的看法是，既然印度已经公开地和毫不含糊地声明她将麦克马洪线看作边界，那么下面就该由中国提出问题了。如果印度那样做，“我们就会强迫中国在下述两种态

度中作出选择：要么接受我们与西藏签订的条约，要么拒绝它，同时提议进行谈判。第一种态度很难设想，考虑到以前每届中国政府都拒绝在谈判中承认印藏条约对他们有约束力。第二种态度则对我们不利"。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提出这个问题'，潘尼迦继续说道，'我们可以明白地拒绝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采取总理在公开声明中所持的立场，即麦克马洪线这边的领土属于我们，关于它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在萨达尔·潘尼迦离开北京后，1952 年 7 月至 8 月中印两国政府就印度派遣新的部队替换江孜和亚东的卫队、封存噶大克印度商务代理的无线电信机和拒绝应允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在没有中方正式签证的情况下访问拉萨等问题发生了争吵。(B·V·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 149 页至 150 页)。但是任何一方还是没有提出印藏边界问题。1952 年 9 月 15 日新德里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印度驻拉萨使团从此改称为总领事馆，江孜、噶大克和亚东的三个商务代理处将置于拉萨领事馆的总监督之下。新闻公报还宣布，上述地位变化是因为西藏的对外关系当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而引起的。

自 1952 年 10 月起，印度的外交活动便集中在如何通过就恼人的遣返战俘问题制定一个妥协方案，使朝鲜战争得以结束。战俘问题使停火谈判拖延了大约两年之久。美国共和党上台，意味

着发誓要“击退亚洲共产主义的滚滚浊流的进攻”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响在美国政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印度方案为基础的朝鲜停战协定是 1953 年 7 月签订的，但是，由于美国对印度中立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时，印度却被排除在拟议中的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参加国之外。印度还获悉，早在 1952 年 9 月，美国和巴基斯坦便进行着旨在使巴基斯坦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谈判。印度支那冲突在 1953 年的加剧也是亚洲将发生广泛冲突的新的不祥之兆。美国扩张主义的威胁在亚洲造成的战争危险，促使印度政府调整其对华关系。1953 年 9 月，印度政府与中国人民政府接触，提议就有关西藏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会谈。

1953 年 11 月，新德里外交部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再次决定在即将与中国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不提出印藏边界问题。据 B・N・穆立克说，“……在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汇报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印度的北部边界问题也应在谈判中解决。但是普遍的看法是我们不应让中国利用这个机会翻整个问题的旧帐。中国无论如何不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我们以为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北部边界。因此，不能就此举行任何谈判。”（《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 155 页至 156 页。）

会议于 1953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会议上说，中印关系正日益密切，双方可以解决那些业已成熟到可以解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大使接着指出在中印之间只有

一些小的问题悬而未决，但他希望看到两国之间不再留下或大或小的未决问题。周恩来总理回答说，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有着漫长共同边界的大国必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顺利解决。（见《1960 年 2 月 12 日印度政府致中国政府的照会》，载于《白皮书》第三卷，英文版第 91 页。）据 B·N·穆立克说，"……会议一开始双方便各唱各的调，印度人坚持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予以讨论和解决，而中国人的观点是只处理'那些条件业已成熟到可以进行讨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印度认为不存在边界问题，而中国人则对这个问题不作解决，待适当时机到来时再加以处理。"（《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 151 页）。

1954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放弃了英属印度政府根据 1914 年 7 月秘密的英藏贸易章程所行使的一切治外法权。协定的中心条款是关于贸易市场、商人和香客的来往路线和手续的规定。还有一份关于撤退印度卫队和向中国人移交印度邮政电讯设施及印度驿站的照会，作为协定条款的补充。协定最重要的内容包含在协定名称本身之中，这个名称把西藏为称作"中国西藏地区"。这是对中国明确保证印度从此永远放弃英国支持西藏为缓冲国的政策。协定的序言包含了五项原则：（1）互相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

处。其中（1）和（4）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2）和（3）提供了可以说是中国对印度所抱和平意图的保证。和平共处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边界问题只是在讨论第（4）条时间接提及。中国方面提出一个声明，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若干山口"的草案。印度方面表示反对，理由是这是对实际上是边界山口的地方提出所有权要求的一种方式。于是，那些中国人撤回了他们的草案，并把这说成是作出了一个让步。最后规定了商人和香客可以经由下列山口和路线来往：（1）什普奇山口，（2）马纳山口，（3）尼提山口，（4）昆里宾里山口，（5）达玛山口，（6）里普列克山口。

令人奇怪的是，1954年协定提到的几个控制着穿越喜马拉雅山经商和进香往来的边界山口仅只是属于边界的中段。没有提到在东段或西段的边界山口，而东段存在着印度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潜在争执，西段就是克什米尔邦的边界。印度政府必定是故意避免提出边界东段的山口问题，而中国人也对此保持沉默，表示着对麦克马洪线的默认。但是现在从印度情报局首脑的权威消息来源中可以知道，印度方面曾想在西藏西部为拉达克商人确定几个边界市场，但是"……中国代表不愿讨论西藏西部的贸易市场问题，理由是这与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有关"。（《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153页。）B·N·穆立克也谈到

"中国没有陈述任何特别理由便拒绝承认在日土（西藏西部）的传统贸易市场"，并说"这无疑是因为中国人正在建设从日土经阿克赛钦到新疆的公路"。（同上，英文版第153页。）

尽管印度和中国都急于在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国务卿宣布的"战争边缘政策"而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当中国代表坚持要在具有"战略地位"的西姆拉建立一个商务机构时，出现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由于这个建议，协议被拖延了六个星期。作为替代，尼赫鲁给予在德里建立商务机构的权利。他成功了。"最后北京同意了德里，因为它想把达成协议一事在日内瓦会议开幕前公之于众。"（INSAF，《印度斯坦时报》，1954年5月7日。）

印度报界对中印协议毁誉不一。人们希望，作为对交出在西藏享有的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特权的回报，印度也许会被允许重新在喀什（新疆）开设领事馆。但是喀什领事馆一事未能列入议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过新疆是个"封闭区"。人们承认印度能在拉萨建立领事馆——一个针对中亚地区的理想的正式监听站——是个巨大的收获。英国三十年代在拉萨建立的印度使团是个在合法性上有疑问的机构。

据印度政府前内阁秘书和首席国防秘书S·S·凯拉说，"尼赫鲁从他的历史观和认为两个伟大而古老的大国之间需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观点出发，最初曾经希望签订一个为期25年的协议。但是印度的谈判者只得到一个为期8年的较短的协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失望。而且当时他已为时过晚地对中国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顽强地为1954年协议辩护，但同时也指示建立边界哨所以保卫国家的北部边界。”（《印度的防务问题》，英文版第155页。）

据D·R·曼凯卡尔说，尼赫鲁于1954年7月就中印边界问题向外交部、国防部和内政部发了一个秘密通报。

“在这个通报中，尼赫鲁将这项协议称作是我们同中国和西藏关系中的新起点，并且明确地说，根据我们的政策以及作为与中国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北部边界应被看作是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不容与任何人进行讨论。总理指示，应当在整个这段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一个哨所网。”（《1962年的罪人》，英文版第138页。）在发布通报的同时，出版了显示整个北部边界已经明确地确定的印度测绘局的新版本地图，以取代标明从克什米尔西北端至尼泊尔的北部边界为“未划定界”和麦克马洪线为“未标定界”的那些旧官方地图（例如《1950年印度政治地图》，比例是1吋＝70哩）。

1954年至1959年

1954年7月以前，在印度的北部边界上只有少数几个麻烦地点。我们已经提到从1944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与

印度政府交换了几次照会。这些照会是由于印度政府企图把他们在东北边界地区的哨所从阿萨姆的丘陵地带推到麦克马洪线附近而引起的。但是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没有就印度政府为把各部族人民置于根据印度共和国宪法于 1950 年成立的东北边境特区的控制之下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提出过异议。在中段，靠近古姆古姆纳拉（Gum-gum Nallah）的特里加瓦尔地区的老争执又于 1951 年和 1953 年发生了。1926 年由西藏，特里加瓦尔和印度政府代表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在尼兰（Nilang）举行过会议，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协议。克什米尔段没有争执，尽管有一支于 1950 年秋天开进西藏的中国军队通过了从新疆到西藏的阿克赛钦路线。这在休·理查逊的《西藏及其历史》一书英文版第 229 页中得到证实。"在印度驻噶大克代理人加彭·马尔兰帕先生的一份官方急报中包含着中国军队在西藏西部出现以及他们从新疆进军的报告。"（《政治家报》，1950 年 11 月 15 日。）据 S·S·凯拉说，"大约在 1952 年甚至更早，便陆续传来有关中国人在印藏边界，特别是在阿克赛钦地区活动的情报。此后的事件表明，这些活动大多与开辟穿过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地区、沿着南藏边界通向西藏中部和拉萨的道路有关。……然而对于中国进入西藏西部的活动的这些最早的报告似乎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但是，到 1952 年，无论怎么说在 1954 年协定签订以前很久，情况发展变得十分明显而不容忽视了。"（《印度的防务问题》，英文版

第157页。）在1954年6月以前，通用的印度测绘局地图都标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未定。还有，克什米尔的前途仍然未定，因为印度作过保证，要遵守在巴基斯坦武装人员从其领土撤出后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公民投票作出的裁决。这似乎是印度政府为什么在若干年保持着沉默的真正理由，即使他们知道了中国人在阿克赛钦地区的存在。他们也知道，拉达克的喇嘛首领库舒克巴科拉曾在1952年6月提出过警告："在我们别无出路时"拉达克可寻求在政治上与西藏联合。（参见约瑟夫·科比尔的《克什米尔的威胁》一书，修订本，英文版第230、231和233页。）

我们从研究印度政府出版的白皮书中得知，自1954年7月至1958年7月中国和印度政府的抗议照会都是关于一些小地区的争端，诸如巴拉霍蒂、当泽（两地均在尼提山口以南）、特里加瓦尔的尼兰地区和中段的什普奇山口。由于各种原因，在刚刚就西藏问题签订了五项原则协议之后这些争端便发生了。在中段，内政部领导的印藏边防部队遵照尼赫鲁1954年7月签发的秘密通报，在过去有争议的地区建立了新哨所。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则首次对这一段边界地区进行测量。他们作为西藏的新主宰，倾向于支持西藏领土收复主义者的边界要求。但是这些争端在中国总理于1956—1957年冬天访问印度时没有成为尼赫鲁和周恩来会谈的内容。他们只谈论到印度边界的东北段。尼赫鲁曾在1956年致周恩来的最近一封信中讨论过缅甸边界，大概是因为他认为缅

甸北部边界在麦克马洪线的基础上作出满意的解决会加强印度关于该线其余段落的立场。尼赫鲁得到的印象是，周恩来虽然不同意把这一边界称为麦克马洪线，但他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为与缅甸的边界。无论很久以前发生了什么，“考虑到印中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也打算在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适当的磋商后，接受与印度的这条边界。尼赫鲁没有提克什米尔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2月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克什米尔问题说成是“印巴之间的未决问题”。）

1958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人民画报》（1958年7月号）刊登的一幅中国地图向中国驻印度参赞递交了一个抗议照会，理由是该图对中印边界的划法不准确。在这个照会中，印度政府第一次就将拉达克——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的东部领土——的大片地区划为中国领土提出反对。在此以前，曾出现过关于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的另一次小争端。1958年7月2日，外交部就中国军队占领拉达克东部的库尔纳克堡一事向中国驻印参赞递交了一份普通照会。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外交秘书向中国大使递交了一份非正式照会，抗议中国人“没有事先获得印度政府允许而且甚至不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议的印度领土”修筑了叶城至噶大克公路的一部分。这封信还对一支由15人和34匹矮马组成的陆军巡逻队的下落提出询问，他们外出到这个地区“正常巡逻”，但是没有回来。外交秘书把这些事件称为“小边

界争端”。1958年11月8日，印度大使在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照会中特别说："现在已经清楚，中国人也声称这个地区是他们的领土。某个特定地区是印度抑或中国领土的问题是一个有待分别处理的有争议的事项。”但是尼赫鲁总理在1958年12月14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主要是谈印中边界问题的信中却只字未提拉达克，即克什米尔段的边界。这似乎表明，1958年10月18日外交秘书的信件，主要是为了获得那些被派去探测新藏公路的确切位置，而于1958年夏在哈吉栏干被中国人逮捕的陆军人员的消息和促成他们的释放而发出的。

据情报局局长B·N·穆立克说："……早从1951年至正式宣布公路通车的1957年，便已拥有建筑该公路的足够情报。……在所有这些年月，无论是陆军总部或外交部都没有提出过这条公路的问题。只是在公路建成和频繁的交通往来开始后，它才引起了某种注意，即使在那时……也不过认为它是件讨厌的事情，并不影响我们的安全。”(《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199页。)

外交部历史司的第一任司长K·扎查里亚教授曾通知北部和东北部边界委员会（1951年至1953年），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政府的地图只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角——即紧挨着位于通称瓦罕走廊的那片狭长的阿富汗领土的边上、面对沙俄帝国边界的吉尔吉特地区——才一贯显示出明确的界线。关于克什米尔的北部和东北部边界，英国官员、绘图员和探险家们在不同时期大体上提

出过三个不同的想法：

1. 约翰·阿尔达线：以昆仑山脉的山脊为边界线，将叶尔羌河上游及其支流和喀拉喀什河以及整个阿克赛钦高原划入英国领土。（这是对 1865 年约翰逊边界线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修改。）

2. 马继业-窦纳乐线（1899 年）：对喀喇昆仑山脉以北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野心稍小。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它将整个喀拉喀什河谷和几乎是阿克赛钦腹地全部留给中国。它顺着拉宗山脉走，将林济塘盐渍平原和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的奇普恰普河均划入印度一边。

3. 喀喇昆仑线：以分水岭原则为基础划分，（1930 年出版的《印度法规委员会报告》第 1 卷中所附的印度地图标出了画成克什米尔北部和东北部边界的喀喇昆仑线。）

我们在审视独立前十年中出版的印度测绘局地图时可以发现，1938 年出版的印度地图（表明省、邦和县的地图，比例尺是 1 吋＝70 哩）没有在沿克什米尔与新疆及西藏之间的广大地区画出任何边界线或色彩区别。然而从 1945 年起，尽管标明了克什米尔的北部和东部边界是"未定界"，但却借助涂上一抹淡彩的办法企图含糊地表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地区这些边界与阿尔达线大致相符。（这一改变显然是在当时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奥拉夫·卡罗爵士的倡议下作出的。这种在地图上表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的作法，在 1954 年 6 月以前，

一直为自由印度的政府所沿用。）

在 1954 年 7 月发行的印度新地图中，“边界未定”的字样被抹掉了；通过这一简单步骤，印度测绘局地图便自称划定了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近似约翰·阿尔达线的克什米尔的边界线，包括整个阿克赛钦，直至东北部的昆仑山。尽管尼赫鲁在 1954 年 7 月给外交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的通报中宣布了“北部边界应当被看作是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不容与任何人进行讨论”，但在克什米尔段没有采取象在北部边界的中段和东段那样的行动，将哨所推移到前沿地区。关于在阿克赛钦地区建立哨所一事，“陆军的态度是他们可在必要时派出巡逻队，但他们无法在该地区建立和保持任何哨所……很难将中国人从这个地区赶走。总而言之，陆军无法进行那种努力，因为列城的资源有限，而且从列城到这些地区也没有任何公路交通。”（B·N·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 201 页。）

看来，印度政府在 7 月间单方决定发行使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克什米尔段约翰·阿尔达线具体化的、有着明确划定的北部边界的新印度地图，主要是想为将来某个时候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进行的边界谈判提供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意义深长的是，即使在 1959 年 8 月至 9 月间，尼赫鲁在朗久发生边界冲突和中国人建筑通过阿克赛钦公路的消息同时泄露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愤怒的议会时，在始终坚持对麦克马洪线的坚定要求的同时也对拉达克

地区的边界的确切位置保持着圆通的态度。尼赫鲁在1959年8月28日说，“这是旧克什米尔邦与西藏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边界。没有人划定过这条边界，……但在进行过某种粗略的勘测后，当时的政府确定了我们现在接受的边界……阿克赛钦地区是这样一个地方，关于它的某些部分……方位不十分清楚。”1959年8月31日，尼赫鲁说：“拉达克的地位与东北边境特区的地位不同，……拉达克边界在那些漫长的年代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管辖，没有人确切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尽管某些英国官员在一百年前到过那里并且划过一条线，但是中国人不接受那条线。显然，这是需要考虑和讨论的事。……”9月10日和12日，尼赫鲁在议会讲到拉达克边界时用的也是同样的口气。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引用了尼赫鲁1959年9月13日发布的正式指示，该指示也透露了他想采取妥协办法解决拉达克段边界的愿望：“……在阿克赛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实际上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地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解决整个边境的更大问题时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且容忍中国对拉达克东北地区的占领和他们修筑的通过这个地区的公路。……”（《印度对华战争》，第138至139页。）

1959年9月25日，为9月25日至28日在昌迪加尔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起草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原来的决议中，只

提到“印度东北边境最近的形势发展”，而没有具体提到拉达克地区。这一提法遭到国大党全国委员会许多成员的反对，于是将决议作了适当修改。从发表在1959年9月28日《印度教徒报》上的这一报告，我们可以推测，国大党的最高当局对于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也没有把握。

尽管尼赫鲁9月13日的指示禁止在拉达克地区进一步活动，由内政部管辖的印藏边界部队还是于1959年10月21日起在空喀山口附近卷入了与中国边防部队的一场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九名印度警察丧失了生命。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印边界争端达到了危险状态，它把公众的愤怒激到了沸点，从而降低了印度外交的活动能力。1959年10月23日，外交部向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发出一份照会，抗议“中国军队在空喀山口地区发动突然的进攻性射击”和“中国军队侵入属于印度领土一部分的某个地区”。这一照会声称，这个地区在印度官方地图所标明的中印传统边界以西大约40至50英里。然而，从在空喀山口附近与中国巡逻队发生冲突的印藏边境部队指挥官卡拉姆·辛格的证词看，好象是一个名叫夏尔马的内政部副司长于1959年9月22日指示他在拉达克的前沿地区建立新的哨所。（参见《白皮书第3卷》，英文版第14页。）这说明，内政部的某些官员及其下属，诸如印藏边界部队和情报局，漫不经心地置尼赫鲁1959年9月13日禁止巡逻队在拉达克段向前移动的指示于不顾，因而导致了1959年10月21日空喀山

口的严重事件。B·N·穆立克写道："10 月 23 日，当这次暴行的事实开始为人们所得知时，总理召开了一次有国防部长，陆军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的官员参加的会议。……情报局成为陆军总部和外交部的共同攻击目标，被指责进行扩张和制造边界挑衅。……陆军方面要求，没有他们的许可，武装警察不得在边界向前推进……总理只好同意陆军的要求。结果是保卫边界的任务从此移交给了陆军，武警的一切军事行动要事先取得陆军司令部的批准。……"（《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 234 页至 244 页）。这样，我们有 B·N·穆立克本人的证词可以表明，在印度政府公开谴责中国在空喀山口进行"无端侵略"的同时，在政府内部的秘密会议上，挑衅和"侵略"的责难完全落到了情报局头上。

正是从 1959 年 11 月起，尼赫鲁在印度对克什米尔段的边界要求上采取了僵硬的态度。外交部 1959 年 11 月 4 日致中国大使馆的照会破天荒第一次对政府所要求的边界，特别是对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那一段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条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北走，经过卡拉塔克山口，然后沿着昆仑山脉从哈吉栏干以北 15 英里处走到位于东经 80 度以东的 21250 高峰（印度测绘局地图）。"这份照会还奇怪地断言，"这条线构成了印度的印度河水系与中国的和田河水系的分水岭"，面根据权威性的意见，是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延伸的喀喇昆仑山脉形成了印度河水系与和田水

系的分水岭。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博士、欧文·拉铁摩尔教授、《帝国地名录》第15卷(1908年)、《钱伯斯地名词典》(1962年)和《哥伦比亚百科全书》(1963年)全都认为喀喇昆仑山脉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分水岭。1959年11月初，外交部历史司提出一份名为《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照会中断言，"印度北部边界位于它现在所在的地方将近三千年了。从极北部的昆仑山脉到东边与缅甸交界处的这一近2,500英里长的边境地区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照会还在维护北部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时说道，"印度北部边界有很长一部分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喜马拉雅山一直在印度的生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就象它在印度的地形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样。"印度著名专栏作家"瓦克尼斯"正确地斥责了这个文件"事实陈述失实，引证不合逻辑"，并说"……我真希望这篇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声明的拐杖支撑起来的历史研究文章没有问世。"(《政治家报》，1959年11月23日。)可是，这个文件对于在空喀山口事件后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因为对这次冲突的真正性质和起因一直未向印度公众公布。1959年11月初，尼赫鲁在向一些重要的驻外大使发出的一项秘密通报中特别说到："他现在相信，在目前的争端中，中国只是想要从印度获得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因此，他看不到有多大通过谈判合情合理地解决争端的机会。"(《印度教徒报》，1959年11月13日。)内

维尔·马克斯韦尔认为，尼赫鲁在思想上对印度边界的传统要求的这一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外交部历史司司长S·戈帕尔博士的影响，此人曾被派往伦敦查阅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的档案中有关印度边界的资料，并对历史证据作出客观的评价。"1959年11月，戈帕尔向尼赫鲁报告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印度对华战争》，第126页。）戈帕尔博士究竟在伦敦挖掘出了什么样的可以支持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要求的历史证据，至今仍然是谜。在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的档案中并没有这样的文件。

外交部历史司还应对尼赫鲁错误地引用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向总理衙门（中国外交部）提出的1899年边界建议负责。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尼赫鲁特别讲到，"英国政府的建议所涉及的不是与西藏接壤的拉达克东部边界，而是与新疆接壤的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界。在那种背景下才有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行至东经八十度处、在那里与拉达克东部边界会合这样的陈述。" 1899年的真实文件的有关部分则是说，建议中的边界是"沿着拉宗山脉（Lak Tsung Range）直到与从昆仑山脉南来的支脉相遇；至今我们的地图都把昆仑山脉标志为拉达克的东部边界。这是在东经八十度稍稍偏东的地方。"（见阿拉斯太尔·兰姆：《中印边界问题》，英文版第182页上的引文。）这是尼赫鲁在合理的基础上处理中印边界争端中如何受外交部历史司蒙蔽的另一个例

子。(通过对原文的改变，马继业-窦纳乐线被曲解为将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包括在印度边界之内)。

结　论

从尼赫鲁 1958 年至 1959 年在议会的讲话以及他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件看，他对麦克马洪线的主张依据的似乎完全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官方出版物——即由外交和政治部授权出版的《契约、条约和证书集》，此书第 14 卷以其第一任编者名字被更广泛地称作与西藏有关的《艾奇逊条约集》——所提供的情报材料。这卷标明为 1929 年出版的文件集理应提供英国、中国和西藏在 1913 年至 1914 年举行的西姆拉三方会议的决议的官方版本。该出版物使尼赫鲁、克里希纳·梅农、G·S·巴杰帕伊爵士、1954 年至 1961 年期间任外交秘书的 S·杜德和外交部的其他大部分重要官员相信，1914 年 7 月的西姆拉条约既与确定中藏边界有关也与确定印藏边界有关。中国代表在草签条约后没有正式签字，在就中藏边界提出抗议后便为了表示异议而退出了会议。既然中国人没有对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中心线确定印藏边界提出问题，而印度和西藏又通过发表声明接受其条款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而批准了西姆拉条约，那么从 1914 年 7 月起，印藏边界（后来被称为麦克马洪线）就应当被看作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最近对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记录所作的研究表明，西姆拉会议（1913 年至 1914 年）所要确定的仅只是中藏边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有关印度东北边界的备忘录上并没有当时印度政府的签注。印度政府认为西姆拉条约因为中国人拒绝批准而夭折了。由于英俄条约（1907 年）中的禁止性条款，印度政府在法律上无权与中国拥有宗主权[①] 的西藏签订双边条约。最近对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记录所作的研究还表明，印度政府赖以了解有关西姆拉条约真实情况的那卷与西藏有关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是在 1938 年出版但却印着 1929 年字样的伪造文件，而原来的版本被收回停止发行了。1938 年发行的这个有关西藏的《艾奇逊条约集》的赝本，硬将麦克马洪线说成是在法律上有效的边界，恰在此时，印度测绘局也第一次发行了表明东北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心线的新地图，取消了表明阿萨姆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丘地的旧地图。这些诡计主要是在当时的副秘书奥拉夫·卡罗爵士的倡议下由外交部采取的。其主要目的是重新向西藏政府提出东北边界问题，因为它在所有这些年月中对与英国的秘密边界条约泰然不顾，显示出它在实现西藏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

① 1904 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后，首次提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妄图使西藏脱离中国，将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尽管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拒绝，但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散布和传播这一观点，对有些国家的政府和许多印度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作者也未完全摆脱这种影响。——译注。

中不愿无代价地接受此条约的有效性。但是奥拉夫·卡罗爵士促使西藏政府同意麦克马洪线的持续努力证明是无济于事的，这在印度事务部档案中保存的英国驻拉萨使节(巴西尔·古尔德爵士、拉依·巴哈杜尔·诺尔布和 A·J·霍普金森）的报告中有所透露。因此在东北边界问题上给自由印度留下的是一笔难办的遗产。1943 年，印度政府作出间接努力，想通过使美国承认西藏具有在"中国拥有形式上的宗主权"下的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的办法，赋予西姆拉条约以有追溯效力的合法性。他们特别敦促美国承认西藏拥有"与其他国家交换外交代表"的权利。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他们认为西藏是构成中华民国的地区之一。(参见本书作者《麦克马洪线（1914—1915 年)》一文，载于《中国季刊》，1971 年 7—9 月号。)

然而，从地理角度看，麦克马洪线可被看作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线，因为它大体上代表着喜马拉雅山的山脊线。所以外交部在其第一任外交秘书 K·P·S·梅农的干练的领导下作出了积极努力，将印度的行政管理推进到东北边境特区。尽管中国地图表明这个地区的边界是沿着阿萨姆的山麓丘地走的，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任何一部分提出直接要求。此外，他们凭仗他们对西藏的宗主权，只能对这个地区的瓦弄和达旺提出要求。据阿拉斯太尔·兰姆博士的看法，除了把达旺和瓦弄包括在印度境内之外，麦克马洪线同西藏人对他们势力范围的概念相

冲突之处少得令人吃惊。”（《中印边界问题》，第143页。）达旺是西藏错那县的一部分，它那巨大寺院里的数百名和尚与拉萨的哲蚌寺——西藏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达旺地区位于不丹东部边界沿线，在战略上对印度有着特殊重要性。还有，从西藏高原一直延伸到乌达尔吉里正北面阿萨姆平原的这个达旺地带，有一条印藏之间的重要通商路线。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于1943年占领了瓦弄，并力图将行政管辖范围逐步推进到山麓小丘以北的部落民族地区。但是他们多少有些放弃在达旺地带将行政管辖推进到麦克马洪线的计划，因为这与他们将西藏拉进英国势力范围并支持西藏成为反对中国的友好“缓冲国”的总目标相抵触。然而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外交顾问们——诸如印度第一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萨达尔·K·M·潘尼迦——得出的结论是：“将西藏看作我们在其中有着特殊政治利益的地区的（我们理应继承的）这种英国政策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K·M·潘尼迦：《在两个中国》，英文版第102页。）所以，自由印度与英国不同，它在用武力从西藏政府手中接管达旺地带方面处于较好的地位，只要这一行动不至于导致中国政府对此事进行干涉。1951年1月至2月，正当中国在朝鲜与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军队打得难分难解、中藏关系完全陷于僵局的时候，印度作好了接管达旺的部署。这要归功于由K·P·S·梅农担任秘书职务时期的外交部。印度在共产党中国要求，由它而不应由台

湾政府占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席位一事上所采取的友好态度，还有印度承认中国在北朝鲜安全上的重大利益，以及印度不承认在西藏享有政治利益——凡此种种，在那个阶段创造了一种印中亲密谅解的气氛。因而，自由印度能够在中国政府不置一词的情况下，完成对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达旺地带的兼并。当然，在1959年前，甚至更晚的时候，东北边境特区仍有许多地方未被占领，也没有行使管辖，因为这个地区难以进入，还有一些未开化的部落不好对付，这些部落生活在无可奈何的原始状态下，不为任何政治当局效忠。在苏班西里地区情况更是如此。1953年10月，那里的塔京部落成员杀害了73名阿萨姆步枪部队人员。不管怎样，从1950年起直到1959年3月西藏暴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就印度将行政管辖延伸到阿萨姆山麓小丘以上提出抗议，这与1946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大不相同。

只是在西藏暴动之后，印度与中国之间才为控制沿着麦克马洪线的某些边缘地区发生了冲突。1959年12月15日，尼赫鲁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对老资格的美国记者A·T·斯蒂尔坦率地解释了最近几个月北部边界沿线发生突然危机的原因。他说："……西藏发生了暴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我们边界上事变发展的速度，因为西藏暴动正遭到中国军队的镇压，他们自然来到在另一边进行着战斗的我们的边界地区。西藏难民蜂拥而来。他们（指中国军队——编者注）要制止他们，于是他们来到我们的边界，因

而对我们来说，近几个月出现了某种新的局势。……更精确地说，是连续发生许多事件造成了这一冲突。”A·S·惠廷博士在1963年写道：“假若西藏不发生暴乱，那么在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就可能不会发生射击的事，北京很可能会继续平静地坚持它对边界的解释。”（A·S·惠廷：《共产党中国》，载于詹姆斯·罗斯福所编《自由论文集》，英文版第298页。）阿拉斯太尔·兰姆也在1959年3月暴发的西藏叛乱中发现了中印边界争端的线索，“如果没有西藏叛乱的戏剧性情况，（印中之间的）意见冲突很可能只会引起继续交换几个照会”。（《印藏边界》，载于《澳大利亚政治和历史杂志》，1960年5月号。）

无论如何，要是印度的边界要求只是局限于使中国人承认麦克马洪线，那就不至于造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导致过去14年从拉达克到东北边境特区广阔边界上的代价昂贵的对抗。现在从K·P·S·梅农的证词中可以明确地知道，周恩来1960年4月访问印度时，提出过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中国政府将一劳永逸地承认麦克马洪线，以报答我们方面对中国人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的某种承认。”（《中国的黎明》，英文版第260页。）周恩来1960年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明确表明中段边界争端对他无关紧要，暗示他准备接受印度在这一地段的要求，作为包括印度承认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从而确保新疆西藏公路安全在内的全面解决

边界问题的一部分。

K·P·S·梅农是英国统治时代以来印度外交家中最有见识的人士，1969年12月13日他在新德里印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谈了周恩来表示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以换取印度对中国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的承认这一番话。他说这些话，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性：“我有意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双方所依据的地图、条约、协定和其它文件，都不能说把边界确定到象任何一方所设想的那样无可怀疑或无需谈判的程度。我们在边界其它地段极其依赖的分水岭原则，运用在阿克赛钦地区时对我们不利。况且，不能忘记的是，阿克赛钦对印度无足轻重，而它对中国却极端重要，因为它联系着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历史上的多事地区。”（《六十年代回顾》，英文版第12页。）对阿克赛钦地区的有争议性，我们知道尼赫鲁本人于1959年8月和9月在议会发表的几次讲话中是承认的。在印度大使G·帕尔塔萨拉蒂致北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正式照会中，包含着下述有关阿克赛钦地区的内容：“现在已经清楚，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个地区是他们的领土。某一特定地区究竟是属于印度的抑或中国的领土的问题，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白皮书（1954年—1959年）》，英文版第29页。）这也是承认阿克赛钦地区存在着争议。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在与我们西段边界要求有关的英国统治时期的真正遗产方面，向我们的政府提

供了错误的材料。就东段来说，他们也没有做准备工作，因而没有发现与西藏有关的 1929 年《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 的欺骗性，而此书是奥拉夫·卡罗(爵士)为了谎称西姆拉条约既对中藏边界有效也对中印边界有效，并为进一步证实麦克马洪线是合法边界而于 1938 年伪造的。(哪怕他们只是费心粗略地读一读与阿萨姆有关的 1931 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2 卷英文版第 100 页，他们也会看到达旺地带——至少是它的北部地区——在英国统治时代处于西藏的行政管辖之下)。至于西段，他们全然忽略了与克什米尔有关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2 卷，第一部分，英文版第 5 页，1931 年出版。) 条约集说："克什米尔邦的北部及东部边界仍未划定。" 外交部历史司歪曲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 1899 年 3 月 14 日写给总理衙门(中国外交部)大臣们的信件——该信提出了后来被称作马继业-窦纳乐线的克什米尔边界建议的内容。这种做法很不诚实。这一有关印度克什米尔段边界要求的重要文件，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在下述重要官方通讯中被印度政府错误地引用过：(1)尼赫鲁 1959 年 9 月 26 日致周恩来的信；(2)1959 年 11 月 27 日发表的代理驻印度高级专员 M·A·胡萨因写给《泰晤士报》(伦敦) 编者的题为《中印边界争端》的信；(3)《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印度政府外交部，1961 年 2 月) 英文版第 55 页上的印度官员的报告。

外交部历史司看来还要对把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改了样的约翰·阿尔达线——如1954年7月以来印度测量局地图所画的那样——错误地解释为印度的印度河水系与中国的和田河水系之间的分水岭一事负责。如果有关官员事先做了准备工作，他就会注意到在《印度帝国地名录》1908年第15卷英文版第84页上有关于该地区分水岭的下述语句："喀喇昆仑山脉的性质要复杂得多。从广义上说，它是兴都库什山脉的延伸，是中亚水系和泄入印度洋诸河流之间的分水岭"。

外交部历史司在有关边界遗产真相方面向印度政府和公众提供完全错误的情报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陷于僵局的一个重大原因。拉姆齐·米尔教授关于"官僚主义犹如烈火，作为仆役极其宝贵，成了主人将是灾难"的名言，对我们的外交部历史司是适用的，因为他们破坏了尼赫鲁很有见地的外交政策——致力于达成一项与中国的暂时解决办法，在妥协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一项不准独立自主的学者接触1914年以来外交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档案记录的官方决定，使得外交部直至今天还在英国统治者的边界遗产真相方面保持着一重无知的帷幕，而中印边界的历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依旧是个秘密。

二、中印关系回顾

（1947 年—1959 年）

1959 年 3 月的西藏暴乱导致了达赖喇嘛的逃亡印度。同年 8 月和 10 月，又分别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朗久和拉达克的空喀山口发生了边界事件。从此，曾经被双方长期喧染为建立在潘查希拉基础上的中印关系，不断恶化，进入一个激烈冷战的时期。接着于 1962 年 10 月发生了中国对印度边界的真正军事入侵。作为这些事件的后果，出现了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对印度政府交好中国并承认其对西藏享有主权的政策的谴责。公众还对在 1959 年 8 月前将中国渗入边界地区的事实向议会和人民保密的政策表示不满和愤怒。在此，我们将力图说明我们从 1947 年至 1959 年间对华政策的背景。

看来印度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的考虑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人口众多、领土辽阔和资源丰富的不发达国家，都需要一长段和平时期迅速而不间断地发展经济，以取得不折不扣的世界强国地位。进行军事冒险无论对印度或中国来说都极端愚蠢，它将严重影响两国的民族利益。因此，在有着大约 2，000 英

里漫长共同边界的印度和中国之间保持友好，是印度也是中国外交政策所绝对必需的要求，特别是在这两个伟大的亚洲共和国处于发育期的时候。

警　告

在另一方面，印度古代治国学大师侨提利耶曾教导我们说，强大的邻国具有潜在的敌意。萨达尔·K·M·潘尼迦1943年在他的《东南亚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印度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没有前途，因为其腹地会受到苏联和复兴了的中国的控制。潘尼迦警告我们："中国成长为军事强国及其经济和军事组织基地最近向东南方的转移给印度造成了同样困难的问题"。为弥补英国建立的大陆防御体系造成的不利形势，他呼吁与英国合作，由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建立共同防御区。不幸的是，由于巴基斯坦对印度固有的敌视，这样的共同防御区在独立后未能建成。潘尼迦还告诫他的同胞们说，由于空中力量的增长，喜马拉雅山已不能成为防范北方潜在敌人的有效屏障，除非有可能将西藏高原包括在内。（《喜马拉雅山与印度防御》，载于《印度季刊》1947年第2和第3期。）

蒋介石的中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所以对印度的安全并不构成很大问题。然而，我们发现，在1946年9月至1949年12

月印度成立过渡政府的短暂期间，印度和国民党中国之间便出现了几个摩擦点。在1947年3月至4月于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上，中国（国民党）代表们强烈反对陈列一幅将西藏清楚地画为中国以外的一块领土的亚洲地图，使该地图被取了出去。中国驻印度大使向印度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反对他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的原英属印度驻拉萨政治代表(一个合法性有问题的官职)休·理査森继续在西藏供职。然而印度政府在1949年8月以前继续让这个有争议的英国公民在印度外交界任职。理査森是西藏独立的拥护者，直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前夕一直将他留在西藏任职，可以被认为是意义深长的事情。中国大使（国民党）就一部克什米尔记录影片中出现的将克什米尔的近邻西藏画在中国边界线之外的克什米尔地图提出了抗议。1949年11月18日，中国大使（国民党）递交一份照会，声明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在安理会上，中国代表（国民党）对印度关于巴基斯坦与部族串通一起入侵克什米尔的控诉采取冷淡态度。在荷兰侵略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上，印度力图动员亚洲舆论加以反对并改变安理会的态度，但是国民党中国没有作出有利的反应，估计是为了照顾印尼华侨商人的狭隘私利。国民党中国的盛行的贪污以及独裁和苛政，简直是尽人皆知。在联合国及其他地方的某些国民党中国的外交官对印度代表所表现的老大哥态度也很令人不快。

早期的恐惧

1949年4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通向中国南方的大门向红军打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可以说是决定了。在1949年4月27日于伦敦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尼赫鲁宣布了他的在一项妥协方案的基础上留在英联邦内的决定。考虑到印度普遍存在的反英联邦情绪——尼赫鲁本人不久前还强烈地对此表示赞同（参看《印度的发现》，1945年）——的力量，印度政府作出通过英联邦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决定，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红星在中国升起的前景的影响。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为了印度的安全在中国边缘地区采取了某些外交措施。1949年6月6日，在锡金大君和由锡金大会党领导的过渡政府之间出现了一段紧张时期之后，印度政治官员H·达亚尔在大君的请求下接管了锡金的行政管理。不久，一位印度行政官员负起了行政管理的责任。（1950年12月5日签订了一项确定锡金保护国地位的新条约。）1949年8月8日，印度与不丹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根据该条约不丹同意在对外事务方面受印度指导。1949年7月，（国民党）中国驻拉萨代表团在西藏政府表面看来似乎有理的请求下，被迫经印度离开西藏。中国国民党政府怀疑印度驻拉萨使团首脑休·理查森与此事有关。（李铁

铮：《西藏今昔》，英文版第199页。）H·达亚尔在后来某个时候访问了拉萨。印度同意向西藏政府提供军火。然而西藏政府没有对由印度军官进行彻底训练的方案作出承诺。（休·理查森：《西藏及其历史》，英文版第178页。）自1943年起，英属印度政府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扩大行政管理中心，这一政策为尼赫鲁政府所认真奉行。在1949年缅甸政府面临一次共产主义叛乱时，印度政府也向它提供了小型武器。此时，印度还安排了一笔提供给缅甸的英联邦贷款。尼赫鲁在支持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同时，谴责1950年6月马来亚华人领导的反英运动为十足的恐怖行为，并且允许廓尔喀部队从尼泊尔经印度开赴马来亚。看来尼赫鲁充分意识到印度洋门口存在共产党华人基地的危险性。

另外，印度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个月内，于1949年12月30日承认了它。尼赫鲁在1949年10月访问英国和美国期间曾向两国政府说情，希望早日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因为他认为它是中国一大批人民所归顺的稳定的政权。自1950年7月起，印度政府在联合国始终如一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国民党代表占有中国所应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进行辩护。

朝鲜插曲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印度是安理会不承担义

务的国家中唯一和西方国家一起将此作为共产党北朝鲜的侵略，而予以谴责的国家（南斯拉夫和埃及弃权）。印度还支持杜鲁门总统发起的以联合国名义反对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印度又表示没有能力向朝鲜的联合国军提供任何军队。不但如此，1950年7月13日，尼赫鲁向斯大林和艾奇逊（美国国务卿）发出私人电报，主张及早调停以结束朝鲜流血，他在电报中强调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与朝鲜接壤的大国出席安理会的必要性。（苏联自1950年1月13日起一直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抵制安理会会议，这使西方国家得以绕过否决权，在联合国旗帜下对北朝鲜发起军事行动。）在此以前，尼赫鲁便有意不与杜鲁门总统的关于福摩萨的所谓“中立化”和用武器支援法国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领导的越盟部队作战的声明发生关系。这一声明是杜鲁门为支持大韩民国而于1950年6月27日下令部署美军的同时发表的。

1950年10月，当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决定跨过三八线侵入北朝鲜时，尼赫鲁坚决反对这个行动。除道义上的原因外，尼赫鲁相信入侵北朝鲜必将引起中国干预，而这可能会导致远东冲突的扩大。正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中国政府由于西藏代表在前往北京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的途中在印度境内已耽搁了六个多月，因而命令军队开进西藏。印度就向西藏派遣军队问题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并借机提醒中国，印度政府在西藏享有从英国时代继承下来的某些特权。尽管共产党中国对印度在西藏问题上进行这种

外交干涉非常反感，在西藏东部边界的昌都陷落后，中国军队还是停止了前进。印度政府也没有象他们在1950年10月31日致中国的信件中所明白警告的那样，设法规劝西藏人不要前往北京。除了这段西藏插曲外，直到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时，印度和中国之间几乎没有再出现什么严重的争端。

新的力量均势

另一方面，1950年11月麦克阿瑟将军的攻势在装备很差的中国步兵的大规模打击下遭到彻底的失败，以及杜鲁门总统关于可能向朝鲜投掷原子弹的谈话，在整个亚洲激起了反对西方的情绪。1950年12月6日和7日尼赫鲁在议会发言时谴责了朝鲜战争双方，认为他们都应为在朝鲜的自由和统一的名义下对一个亚洲小国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负责。尼赫鲁在那时已意识到，由于中国这个能在亚洲面对美国挑战的难以对付的大国的崛起，世界力量均势已经改变，他也意识到印度在这种新的力量均势中持中间立场所能取得的有利地位。

确定的边界

同时，尼赫鲁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让中国明确知道印度

所认为的自己的合法边界和势力范围以及她准备用一切办法捍卫它。早在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就拿定了主意，重申“不管有地图或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12月6日，尼赫鲁重复了一项早期声明：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的北部传统边界，既然尼泊尔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任何对尼泊尔安全的威胁都会被看作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早在1950年7月3日，印度尼泊尔之间就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1950年12月，印度政府采取具体步骤将民主改革引入尼泊尔，因为贪污腐化而又没有效率的拉纳寡头统治的继续存在，对尼泊尔的稳定和印度的安全都是威胁。对西藏在1950年11月13日发出的请联合国给予援助以反对中国“侵略”的呼吁，印度政府没有支持，因为他们已得到共产党中国作出的要和平解决西藏自治问题的保证。[①] 1951年2月成立了以希马特·辛格吉将军为主席的北部和东北部边界委员会来考虑我们边界地区的安全问题。

1951年2月1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坚决反对美国提出的把中国称作侵略者的决议。1951年5月23日中藏协定在北京签字。自1951年起，印中之间开始了友好和文化使团的相互访问，这种访问促进了相互了解。中国显然对印度在此时已经陷入流血僵局的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调解人角色非常欣赏。对于美国提出的

---

① 印度政府对西藏指控中国进行侵略的看法，无疑受到她对海得拉巴于1948年7月向安理会指控她自己进行侵略所持态度的影响。——原注。

在1951年9月签订的日本条约，尼赫鲁以该条约没有将福摩萨归还中国，以及在日本继续保留着美国基地等等为由，提出了批评，中国对他的批评是赞同的。印度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方案原本是得到中国人的默许的，1952年10月此方案在联合国大会流传时招致了美国的尖锐批评。在安东尼·艾登（英国外交大臣）的劝诱下，克里希纳·梅农为了满足美国的观点而接受了某些修正。这反过来使印度的方案受到苏联和中国的怀疑，所以他们在联合国激烈反对印度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决议。但是这一误会没有持续多久。1953年7月赤色中国接受把印度原来的方案作为朝鲜停战的基础，加上美国用印度不是交战国这个好象有理的借口，坚持将印度排除在拟议中的远东和解政治会议之外，使印度和中国彼此更接近了。

西　　藏

中印关系的下一个阶段是印度采取主动，通过放弃那很少几项她从英国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治外法权，使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合法化，因为这些权利本身对印度没有多大价值（见休·理查森所作《西藏简史》英文版第198页），而且在变化了的权力关系中也无法保留。1954年4月29日，中印协定签订了。协定的中心条款是关于贸易市场的数量、地点和管理，以及贸易和进香的路线

和手续。还有一项照会，作为条约规定的补充，其内容是撤退印度武装卫队，将印度在西藏的邮政、电报和印度驿站移交给中国人。但是，协定的最重要之点是序言中对西藏的提法："中国的西藏地区"。这是对中国的一项明确保证，即印度一劳永逸地抛弃了[①]英国过去的西藏政策。另一方面，将共处五项原则写进1954年协定的序言，可以说是再次就共产党中国对印度的和平意图提供一种保证。议员（联邦院）H·昆兹鲁博士等印度批评者在1959年8月和10月边界冲突发生后曾提出质问："印中两国在这个协定中提出五项原则协议时，我们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难道我们不能乘机至少对于中国政府说一声'如果你们要我们同意这些词句，你们至少也该承认麦克马洪线嘛'？"尼赫鲁1959年12月9日在联邦院的讲话透露：当时印度不过是接受中国占领西藏的现实——对此她无力改变——，在谈判桌上提出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必然会导致共产党中国（在国民党中国迟于1948年11月18日发出的拒绝麦克马洪线的照会的基础上）提出补偿的要求。

印度的困境

印度政府感到最好还是把我们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主张清楚地

① 原文是declared，似系discarded之误。——译注。

在地图上标明，在议会里宣布，并牢牢坚持我们的立场，让“流逝的时光和事态发展”（尼赫鲁 1959 年 12 月 9 日在联邦院的讲话，见总理论《中外关系》第 1 卷英文版第 250 页）证明我们对沿着喜马拉雅山高山脊——印度的天然地理边界——走的这段边界的要求是正确的。无论怎么说，任何愿意研究 1953 年 12 月——当时谈判已经开始——通过的印度官方地图的人都会明白，在 1953 年 11 月《巴美武器援助条约》开始谈判的背景下，印度急须与赤色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此时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捅开马蜂窝的后果。事实上，美国共和党在 1953 年上台意味着发誓要通过武装干涉击退亚洲“滚滚而来的污泥浊水”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在美国政治中上升了。

亚洲和平

据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 1954 年 1 月发表了一项没有印度人能够赞赏的美国意欲控制远东的声明。1954 年 2 月 24 日，签订了巴美军事条约。紧接着又出现了杜勒斯主义——如果在无论何地发生了共产党的任何蚕食进攻，美国便要在自己选定的任何地方进行“大规模原子报复”——和 1954 年 4 月 日内瓦会议前夕美国迫切要求西方对印度支那进行大规模干预的鲁莽尝试（这可能会在远东开辟一条动乱的新路）。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印

度政府力图在中印谅解的基础上建造起亚洲和平壁垒。

只有明白这种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尼赫鲁于1954年6月邀请周恩来、签署一项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所遵循的和平共处原则的联合声明的急切心情。尼赫鲁是用签署这样一个联合声明的办法坚持扩大没有冷战的“和平区域”的政策，以反对美国那导致继续不断地加强巴基斯坦军事力量的订约癖。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的态度十分和解，给亚非各国政府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和巴格达条约（1955年）失去了亚洲支持的真正基础。印度于1955年至1958年期间在缩小共产党中国与美国的冲突点方面所作的真诚努力（如美国释放中国公民，中国释放因进行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美国飞行员，以及1955年和1958年8月的近海岛屿危机），还有她经常为赤色中国进入联合国进行辩护，均受到中国领导人的赞赏。在1956——1957年的冬天访问印度期间，周恩来赞扬了印度领导人在各种问题上给予的外交支持，并且公开承认中国在组织科学和工业方面有许多地方要向印度学习。

中国地图从蒋介石时代起就把我们辽阔边界地区的某些部分划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这对印度政府来说，自1947年政权移交之日开始便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在1949年年底以前是个弱国，印度政府象它前面的英国政府一样，对中国地图

中提出的苛刻要求很少操心。直到1950年2月8日，尼赫鲁才第一次在议会里讲到麦克马洪线是印度北部的边界。在同一年里，他也好几次重复讲到喜马拉雅山是印度的天然边界，因此，尼泊尔也处于印度的环形防御线之内。

有关地图的争论

尼赫鲁在1954年10月第一次向周恩来提出中国地图的问题。他得到的回答是，赤色中国的新地图沿袭了国民党的旧地图，并不表示确切的边界线。在1956—1957年冬天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尼赫鲁和周结合解决缅甸边界问题再次讨论了麦克马洪线问题。尼赫鲁曾在1956年致周恩来的信中讨论过缅甸边界，推测起来，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在麦克马洪线的基础上满意地解决缅甸边界问题会加强印度在该线其余段落上的立场。总之，根据尼赫鲁的证词，周恩来与他的会谈，“考虑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暗含着对麦克马洪线的默认。尼赫鲁感到满意，没有再提出北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的其他领土争端。也许是由于在1954年7月前发行的印度测量局地图在这些段落的边界上缺乏应有的明确界线，尼赫鲁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未必得策。（还有，印度政府由于它在联合国承担的义务，使克什米尔邦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未决状态，因而削弱了它在克什米尔边界上的立场。）

康巴人插曲

自1955年年底以来，一个性格好斗、说藏语、居住在西藏边界以外的四川省的康巴部族起来暴动，反对共产党的统治。由于康巴人在精神上归顺达赖喇嘛，中国人便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控制暴动。在1956—1957年的冬天，达赖喇嘛正在印度访问，由于受到两面夹攻，他决定留下来不走，直到他也能获得他的前任——第13世达赖喇嘛享有的自治。尼赫鲁极力想使周恩来和达赖喇嘛言归于好，因为他一向知道这是使印度不规则的北部边界保持安全和平静的唯一保证。由于赤色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面对着强有力的美国基地，她的南部和西南部边界的中立化对她的利害至关重要。周恩来表现出和解的态度，作出安排撤销在西藏本土进行的共产主义改革，撤走了大批政治干部，并且关闭了在西藏建立的汉语学校。在1957年，中国人在沿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进行边界探察。然而在1957年9月，印度政府从中国政府的公告中获悉修建了一条从叶城穿过阿克赛钦地区到达噶大克的公路。但是印度十政府直到1958年10月18日才就此问题提出一个非正式抗议照会。写这个照会的目的在于使估计在中国人拘留之中的一支陆军巡逻队（1958年夏季为査明新疆西藏公路线而派出）获释。这项照会也特别说到，“印度政府切望解决这些细小的

边界争端，使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受损害”。中国政府于10月22日在喀喇昆仑山口释放并驱逐了印度巡逻队，但是他们对印度人员在中国领土上进行非法勘查提出抗议。印度大使1958年11月8日递交的照会默认了这个地区存在着领土争端。早在1958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写过一个照会，对1958年7月号《人民画报》刊登的地图中所画的中国和印度的边界表示抗议。在这个照会中，第一次就拉达克东部大片地区被画成中国领土提出反对意见。[①]（在此以前，印度政府仅仅对麦克马洪线边界表示关切。）中国1958年11月3日的照会将《人民画报》上的地图说成是以解放前的地图为基础画成的“粗略的示意图”，但是说只有在与邻国进行磋商并对边界地区进行勘测后才会改画边界。

日益增长的关切

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刚从不丹归来）亲自就“不正确的中国地图”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特别对把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段）的一大部分画成中国的一部表示反对。他谈到两国之间可能由此发生严重的误解。他还表示无法理解“什么样的勘测能够影响这些众所周知的确定了的边界”。1959年1

① 7月2日曾对中国部队前往拉达克东部的库尔纳克哨所提出过抗议。——原注。

月23日周恩来在回复尼赫鲁时强调“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他特别反对印度地图对西段中印边界的画法。然而，关于麦克马洪线，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但他重申有必要进行适当的磋商和勘测，并指出立即改变可能会给中国政府在政治上造成困难，因而建议采取一项临时性措施维持现状。

越来越恶化的关系

这种处于初期状态的边界争端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外交部官员以及印度和中国总理也一直在私下进行着谈判。但是没有哪一方对另一方怀有任何根本的敌意。中印边界与印巴边界的情况不同，在印巴边界上，大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面对面地对峙着，边界沿线交火是经常出现的现象，而在长达1，500余英里的中印边界线上（不算尼泊尔边界），除少数战略地点外，哪一方都没有武装力量设防。纵然有些很小的争端——有的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例如巴拉霍蒂），另外的则是由于在此以前没有查勘过的地区展开勘测活动而引起的——成为1954年7月以来官方照会讨论的题目，边界沿线可几乎处于绝对平静状态。但是1958年夏季以来西藏政治情况的发展引起了中印关系的迅速恶化，使得解决边界争端从政治上说对两国政府都变得困难起来，对印度政府更是如此，因为舆论的表达在印度要比在中国

自由得多。迟至1959年10月21日，尼赫鲁在加尔各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认为在中国最近入侵印度领土的背后有任何"重大企图"。他又说："我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与西藏有关。西藏叛乱前，边界另一边并没有中国军队。但是在叛乱后，中国军队开来了，一则是为了粉碎叛乱，一则是为了阻止西藏人到印度来或同中国认为与西藏叛乱有关的人进行接触"。1959年12月尼赫鲁在单独会见老资格的美国记者A·T·斯蒂尔时又一次说到："这（西藏暴乱）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我们边界上事变的发展速度，因为西藏暴动正遭到中国军队的镇压，他们自然来到在另一边进行着战斗的我们的边界地区"。在回答"什么是驱使中国向印度施加压力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时，尼赫鲁说："我自己也不能肯定他们是蓄意这样干的。更确切地说，是接连发生的许多事件造成了这一冲突。"①

尼赫鲁促使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实现和解的努力显然是成功的，1957年达赖喇嘛不顾他几个哥哥的劝阻回到了拉萨，而毛泽东则在1957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宣布西藏尚未作好改革的准备，

① （1）盖伊·温特在1959年6月号《圆桌》上发表的题为《西藏的挑战》的文章中清楚地预见到英国人留下的难办的边界遗产造成的中印冲突正在来临。(2)"如果没有西藏暴动的戏剧性情况，(中印之间的)意见冲突或许只是引起稍多一点的持续不断的照会交换。"——参看阿拉斯太尔·兰姆《印藏边界》一文，载于《澳大利亚政治和历史杂志》1963年5月号。(3)"如果西藏不发生暴动，在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便不会发生交火。北京很可能会继续平静地坚持它对边界的解释。"——A·S·惠廷：《共产党中国》，载于詹姆斯·罗斯福所编的《自由论文集》(1963年)。——原注。

改革应推迟6年。但是，在撤销西藏地区的改革的同时，却在西藏的边沿地区——也就是大部分康巴部族人作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强行推进改革。结果，康巴人于1958年春再次走上叛乱的道路。

中国人的计划

中国人要求达赖喇嘛的政府派兵平定叛乱，但是达赖喇嘛没有合作。达赖喇嘛向康巴地区派去一些使者，企图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的使者决定与康巴人联合起来。他们于1958年7月号召成立一个包括西藏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国地区在内的大西藏独立国。在这项要求西藏独立的联合声明上签字的还有被中国当局在1953年撤职的西藏前司错鲁康娃和其他流亡在印度边界城镇噶伦堡的西藏贵族。通过他们，这个声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中国政府因此而丢了脸。从此，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在制止居住在噶伦堡的西藏贵族、国民党特务和西方人的反华活动方面究竟有多大诚意存起了难以消除的疑虑。(显然，周恩来在1956年11月访印期间曾要求让希腊的彼得王子离开噶伦堡。彼得王子得到通知，要他在1957年初离开印度，但他却以妻子有病为由设法将自己在噶伦堡的停留时间延长到1959年初。)

西藏叛乱分子的主要策略是将达赖喇嘛诱拐到中国人的力量

够不到的地方，将他作为民族起义的象征，然后寻求外国干预。而作为一种可采用的方法，中国当局则计划把达赖喇嘛迁到西藏叛乱分子的力量所及不到的地方。最后，西藏叛乱分子赢得了这场斗智，设法使达赖喇嘛相信是到了与中国人分手和逃往印度的时候了。达赖喇嘛戏剧性地逃往印度，他和他的支持者随后在印度采取的行动，以及与此同时在中国开始的连锁反应——这一系列事件突然将所有的丑事公布到光天化日之下。而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样一直不让公众知道这些事情，目的是在他们肩负着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且又各自面对着来自（以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巴基斯坦及美国的敌对活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把他们的关系稳定在友好的基础之上。

三、中印争端

不久以前，为探索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和途径，北京和新德里的官方代表在某个阿拉伯国家举行了一次会议。据印度一家主要日报当时驻贝鲁特的记者报道，中国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以下各点：

（1）中国人坚持的第一个条件是，印度必须承认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第二个条件是两国应就一项新的边界划法达成协议，以代替麦克马洪线。（3）另一项中国要求是印度撤销对西藏移民的支持。这意味着将达赖喇嘛和西藏民族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逐出印度领土。（4）中国还要求印度停止对孟加拉国的一切军事干涉并从该国撤军。（5）中国的最后一个条件是印度应当正式和公开地声明她与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不包含任何秘密条款。（《政治家报》，1973 年 2 月 9 日。）

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中国据报道就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条件中没有很多新的内容。新的条件是第四和第五点，这是由于发生了一些事件而引起的，如 1971 年 8 月 9 日签订了印苏条约，

1971 年 12 月爆发了导致巴基斯坦的肢解和孟加拉成为主权国家的印巴战争。我想将我的评论限制在中印争端的一些老问题上。

多亏库尔迪普·纳亚尔，我们才有了周恩来于 1960 年 4 月同已故的 G·B·潘特谈话的目击记，当时中国总理正为解决中印争端而在新德里访问。纳亚尔写道："在此以前，我的印象一直是，争端仅仅与拉达克方面有关，但是周恩来有两三次对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表示怀疑。潘特是以麦克马洪线是既成事实这个假设为出发点的，但是周恩来不接受这一点。他说得十分明确，麦克马洪线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周恩来说明了中国修建的联结新疆和西藏的公路对中国有多么重要。他争辩说，没有那条公路，中国便没有通向新疆的道路。潘特回答说，印度准备保证新疆和西藏之间的安全和自由通行，但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土。周恩来没有作声，但他暗示会引起充满危险的后果。"（《两线之间》，英文版第 137 页。）

纳亚尔也谈到 1962 年 7 月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为解决中印争端而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他说："梅农曾告诉陈毅……印度可以接受中国对它建有联结新疆和西藏的公路的阿克赛钦地区以及作为公路"缓冲区"的 10 英里带状区域的宗主权。作为交换，中国必须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和印度对拉达克其余地区的权利。据报导，中国接受了这个方案，而在去日内瓦之前显然曾与尼赫鲁谈过话的梅农也同意这个方案。但

是据报道，潘特从中阻挠，他通过内阁作出的一项非正式决议使政府撤回了它的提议。”（同上，英文版第 136 页。）

我想说，现在应该是尼赫鲁的女儿——她在对外事务方面比较现实，不爱幻想——领导的印度政府使 1962 年 7 月间中印在日内瓦进行的最后一次双边会谈继续下去的时候了。一些学者，诸如阿拉斯太尔·兰姆、多萝西·伍德曼、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和我本人，最近对中印争端起源的研究表明，原来一直非常强调遵循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中印和睦政策的已故总理尼赫鲁，自 1959 年 11 月起在北部边界问题上被迫采取一种从历史事实看是没有道理的僵硬态度。遗憾的是，当时已是七旬老人的尼赫鲁为一些在业务才干和诚实方面不那么符合要求的外交官所包围，不久他又为同一类型的军官所迷惑，而这些人怂恿他走上了完全无视战略现实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道路。现在印度政府应当明白，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无论在条约、习惯或地理上——如分水岭原则——都是没有根据的。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虽在地理和习惯上有着牢靠的根据，但它没有有效的国际条约为依据。

在对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出版的各种各样地图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以后，训练有素的地理学家多萝西·伍德曼小姐得出结论说：“……中印边界的什么解决办法都必须是折衷方案。”伍德曼小姐认为双方在这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她说：“……地图上的无数差异可能使最天真的制图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看法：连魔鬼也能靠引用

地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喜马拉雅山边界》，英文版第320页。)她提出了一项有可能在妥协的基础上解决争端的办法：“中国在与缅甸的谈判中接受了1914年西姆拉三方会议地图上的红线，这个事实意味着在与印度谈判中它可以作为出发点。”(同上，英文版第321页。)另一方面，她认为印度应将她在阿克赛钦段的要求局限在当时已为新疆官员接受但尚未得到南京批准的1899年马继业-窦纳乐线。事实上，伍德曼小姐得出的结论是，中印和解的起点将会是那个据信是周恩来在1960年4月向尼赫鲁提出的方案。现在已经退休的印度外交官K·P·S·梅农在他的《飞奔的三驾马车》一书中也赞扬过这一方案。

不过，我想建议，边界问题应该是任何有意义的中印对话中的最后一个议题，因为这问题和威信的考虑掺和在一起，变得十分复杂了。谈判开始时最好提出能达到下述这些有限度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目标的问题：

(1) 就印度和中国完全停止通过报刊和电台进行敌对宣传达成协议。这包括停止刊登一直是两国摩擦的持续根源的官方照会。这一点在近几个月来已多多少少地得到了非正式的实施。

(2) 任命驻北京和新德里的大使。在恢复大使级关系方面，中国可能要求印度首先采取步骤，理由是印度大使是首先被召回的。看来，印度方面在这点上采取任何主动行动现在都将会得到中国方面的报答。

（3）应当完全撤销对诸如西藏人、那加和米佐叛乱分子、“自由克什米尔”拥护者等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民族集团的秘密支持，他们在加深中印冲突的程度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4）在一项新条约的基础上重新开放对双方有利的穿越喜马拉雅山的商业往来，并随着两国间信任的增长，在有争议的边界上逐步缓和关系。

四、中印关系缓和的前景

不久前（1973年夏）印度报刊登载的几则消息，可以说明印度政府一直特别急于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可以举出英迪拉·甘地夫人1973年5月26日在新德里会见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和1973年6月在旅途中接见贝尔格莱德电视台及加拿大电视台记者的例子。同时，我们发现，印中关系正常化进程近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尽管从1969年初起印度总理和外交部长不时重复的一些谈话引起过些许希望的闪现。

印度和中国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但自1962年以来在各自的使馆里仅只保持些基干人员。1954年的通商和香客协定于1962年6月任其失效了，因为印度当时轻蔑地拒绝了中国提出的重新谈判签订一项新条约的要求。这样，印度和中国的领事馆都被关闭，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通商和香客的经常往来——这一向是喜马拉雅山边界地区居民的一项收入来源——便突然中止。印度大使在1961年春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到他在北京的岗位，而中国大使是在1962年撤离印度的。从那时起各自的大使馆便由自己的代办来领

导。

即使在冷战最厉害的年月，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还保留着大使。东德和西德这两个在冷战中激烈竞争的对手，哪怕在彼此不正式承认对方的时候，也允许他们之间有大量的贸易活动。而在1954年公开声称是永久的朋友的印度和中国，在短短的五年期间便成了“永久的敌人”，由于种种事件——如西藏叛乱，边界争端，1962年中国的边界入侵，印度或中国被指责向西藏人、那加人、米佐人和自由克什米尔分子等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民族提供支持，以及每一方通过报刊和电台所进行的心理战——而使关系遭到彻底破坏。1967年，发生了中国青年袭击我们的驻北京大使馆和粗暴地对待印度外交官的事件以及新德里进行报复的行动。1967年9、10月间还在锡金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经历了三年“文化革命”之后，中国从1969年起逐渐恢复了她的外交理智。中苏在乌苏里江发生冲突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使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在1970年北京“五一”招待会上，向印度代办布拉杰什·米斯拉作了个友好姿态。从那时起，中国人参加我们在新德里和其他重要国家的首都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对印度的态度不再那么冷淡，比较符合一般准则了。但也没有出现明确的姿态表明中国急不可持地要在最近的将来调整她与印度的关系。中国不久前最为头痛的事，是中苏争端的加剧。实现中美和解，签订结束越南战争的停战协定，忘却日本在

30年代及以后长期侵略中国大陆造成的苦难而重新建立中日联系，还有她在经历了二十二年的孤立后于1971年10月作为一个公认的大国进入联合国——这些是“文化革命”逐渐停止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成就。中国对在远东和东南亚获得一项解决办法的兴趣自然大大超过在南亚获得一项解决办法，因为后者牵涉到与印度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在1971年12月巴基斯坦解体和孟加拉国出现后，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使我们能够稳定我们这个南亚主要国家的地位，对印度外交来说依旧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事。因此，从合乎逻辑的思考出发，我们发现印度方面应采取主动实现中印关系的缓和。

但是，经历了10年冷战之后，在与中国开展认真对话的道路上存在着某些重大障碍。长期以来，印度公众听到的一直是官方或非官方宣传中所说的中国背叛了印度的真正友谊，在1962年对我国进行了“无端侵略”。印度公众也老听到宣传所灌输的，我们在喜马拉雅山的北部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些内容。结果，公众对于印度和中国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就边界要求作出任何相互调整，现在仍然感到有说不出的厌恶。中印僵局在印度政府作出认真努力，就中印争端——它在1958年至1962年间发展了，从而使合作与和平共处的趋势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逆转——的根源对公众进行再教育前，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此外，1971年8月9日的印苏条约也可能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起抑制

作用的因素。一位印度时事评论员根据他最近所作的研究认为，中印争端不过是更为复杂的中苏争端所起的一个作用，在中苏关系得到缓和前，想使印中关系正常化是徒劳无益的。(莫亨·拉姆：《中印对抗》，1973年。)在印度有一种思想认为印度应当谋求重新将西藏变成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这种思想现在仍很流行。(B·N·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613页。)可是，这会意味着在印度2,000英里长的北部边界沿线保持永久性的军事对抗。另有一些人则仍然坚持认为，印度只有在中国接受1963年科伦坡建议的基础上才与她进行新的对话，此项建议设想在相互同意的情况下由双方在中国军队撤出的“1959年11月7日线”以上的西段地区建立民政哨所。

然而，我们有好几条理由对缓和的前景持乐观态度。60年代初期一直存在的对中国的惧怕心理现在已逐渐消失。我们的军队在两次战争中，一次在1965年，接着在1971年，证明了它的英勇，使巴基斯坦大失面子。中国在巴基斯坦危急的时刻只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因而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愿意永远做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或对喜马拉雅山以南抱有领土企图。还有，以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为开始的中美缓和进程，对在印度活动的强有力的亲美院外集团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们自50年代起即渗进国大党统治集团、官僚机构和报界，直到最近还坚持促使对共产党中国采取好战的不妥协政策。英迪拉·甘地在她

实现中印缓和的努力中，今天甚至可以指望得到曾破坏她父亲对共产党中国的有独到见解的政策的同一群人的鼓励，这个政策本来会承认中国对喀喇昆仑山那边的阿克赛钦公路的要求，以换取中国对东段麦克马洪线的承认。然而院外援藏集团——多年来这个集团在印度也十分活跃，力图在印中之间散布不和的种子，特别自1959年达赖喇嘛带着大批追随者到印度定居以后——却不是这样。有迹象表明，印度政府不会过分照顾持不同政见的少数人而牺牲预期中的与中国的缓和。印度的院外援台集团快要寿终正寝。中印关系的改善今天理应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欢迎，如果它们真的渴望在全世界消除冷战，按比例减轻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1971年的印苏条约不能妨碍中印和解。英迪拉·甘地最近在国外讲话时清楚地说明她反对大国霸权主义。

有一大批人对印度自1962年以来防务预算增长五倍感到担心，因为它成了我国螺旋式通货膨胀的持续原因。这些人将会欢迎我国政府今天为实现中印缓和可能作出的任何认真努力。

使得任何一方都无法作出不事声张的外交表示的另一个因素，是尼赫鲁于1959年9月在愤怒的议会的压力下所作出的公布当时印中官方往来信件的不同寻常的决定。外交手腕只有在朦胧中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甚至“公开外交”的最高鼓吹者伍德曼·威尔逊总统也发现在实践中公开谈判是完全行不通的。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印度和中国心照不宣地同意了停止在白皮书里登载

抗议照会。

有理由相信，印度和中国外交官一直在阿联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首都进行着某种谈判。印度一家很有影响的日报的驻西亚记者在 1973 年 2 月给我们报道了中国提出的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下列条件：(1) 印度必须承认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两国应就一种替代麦克马洪线的新的边界划法达成协议，(3) 印度撤销对西藏移民的支持，这意味着将达赖喇嘛和西藏民族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逐出印度领土，(4) 印度停止对孟加拉国的军事干涉，(5) 印度应当声明她与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不包含任何秘密条款。尽管外交部否认，有理由相信上述各点可能是由中国外交官在与其印度对手谈判中提出的。

我们知道，印度和中国在三种场合进行了双边谈判。1960 年 1 月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时提出了前面的三点。当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R·K·尼赫鲁先生 1961 年 7 月访问北京时，他被告知中国愿意放弃她的较大要求，而承认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以换取印度对她对阿克赛钦的主权的承认。克里希纳·梅农与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于 1962 年 7 月在日内瓦会晤时，又进一步举行了会谈。据库尔迪普·纳亚尔说："梅农曾告诉陈毅……印度可以接受中国对……阿克赛钦地区的宗主权。作为交换，中国必须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和印度对拉达克其余地区的权利。"（《两线之间》，英文版第 136 页。）中国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撤出孟加拉国的新条件今天

在实际上已没有意义。遣返巴基斯坦战俘的拖延主要是由于巴基斯坦不愿在遣返孟加拉平民问题上让步而造成的。中国是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上通过敦促立即遣返巴基斯坦战俘决议的104个联合国成员国之一。中国还拖延了对孟加拉国的承认，并否决了她加入联合国。然而可以指望：巴基斯坦战俘问题会在不久的将来与有关问题一起得到解决，巴基斯坦与中国都将承认孟加拉国。中印之间由于巴基斯坦的分裂和孟加拉国的创立所引起的激怒预期不会持续很久。

对印度来说，向中国保证在印苏条约中没有反对中国的秘密军事条款不会有困难。印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所以，中印缓和的前景将主要取决于印度如何处理争端中原来的三点。K·P·S·梅农是于1952年至1961年期间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上建造起一座印苏关系的大厦的主要负责人。（他还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过诸如外交秘书这样的要职，又是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痛惜地说印度在1960年4月失掉了一个在合理的基础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良机。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国政府将一劳永逸地承认麦克马洪线以换取我们方面对中国对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的某种承认。“尼赫鲁个人似乎有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他在内阁中的一些高级同僚的反对和议会的批评，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摆出了坚定不移的姿态。”（《中国的黎明》，英文版第260页。）应当指

出，K·P·S·梅农是第一个在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和政治部中担任负责职务的印度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了解我们并没有继承到对麦克马洪线的明确而又合法的要求，虽然从地理上看，它应当是一条可以接受的要求线。许多人忘记了在1954年7月以前印度测绘局地图标明阿克赛钦地区的北部边界“尚未划定”。

我们可以引用莎士比亚的一首诗以乐观的调子结束这篇研究文章：

“世界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

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国事的起伏也是波浪式的，而当前的潮流有利于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伟大民族之间实现和解，就如它也有利于大国之间实现缓和一样。在中国，自林彪将军以下的军国主义者都已黯然失色。最敏锐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已经作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出现。在印度，英迪拉·甘地总理仍然在执政党、内阁和议会里占有不容挑战的地位。所以，她比她父亲处于更好的地位，可以采取大胆的主动行动结束对华关系的痛苦和仇恨时代。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将为以第三世界事业的雄辩的鼓吹者身份出现的印度外交开拓新的前景。

五、麦克马洪线：从神话到现实

一

麦克马洪线曾被广泛地认为是描绘印度东北部边境的确定边界。这条线要算作1913年至1914年英国、中国和西藏参加的西姆拉三方会议的产物。但是，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的文件表明，这条线是英国特命全权代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西藏特命全权代表通过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秘密换文，在中国全权代表未曾参加的情况下商定的。英属印度政府主要因为《英俄条约》(1907年) 中的限制性条款[①] 而不认为这条线在法律上有效。印度总督哈定勋爵在1914年7月23日写给印度事务大臣的备忘录中明白地说道：考虑印度东北边境问题不是西姆拉会议职责的一部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就这方面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只能被看作是他个人的，并未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

在得到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的许可而出版的《艾奇逊条约

① 《英俄条约》说："按照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这一公认的原则，英国和俄国保证不与西藏进行谈判，除非通过中间人中国政府。"——原注。

集》第14卷（1929年版）中写道："1913年，西藏、中国和英国的全权代表在印度开会，试图解决中藏边界事宜，并于1914年拟就和草签了一个三方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然而，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奉印度政府之命停止发行，而偷偷地代之以1938年印刷的标明是1929年出版的伪造版本。《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的这个新版本说：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是要就西藏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关于英国、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以及西藏与中国和西藏与印度的边界谈判一项协议。它谈到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协定，但是声称英国和西藏通过发表一项承认条约的条款对他们具有约束力的声明批准了西姆拉条约。

这种偷偷摸摸的对西姆拉条约的说法的篡改，主要是按照奥拉夫·卡罗爵士的建议作出的，而这一直是自由印度对英国统治者在东北边境问题上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混乱不清的根源。

二

可是从地理角度看，麦克马洪线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印中之间的天然边界。因为它大体上代表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线。因此，印度外交部在其第一任外交秘书K·P·S·梅农的能干的领导之下，积极致力于将东北边境特区的行政中心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虽然中国地图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将这个地区的边界标

在阿萨姆沿山丘地带，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未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任何部分提出直接要求。而且，凭着他们对西藏的宗主权，[①]他们也只能对这个地区的瓦弄和达旺地带提出要求。据阿拉斯太尔·兰姆博士说，"除了把达旺和瓦弄包括进印度境内之外，麦克马洪线同西藏人对他们势力范围的概念相冲突之处少得令人吃惊。"（《中印边界问题》，英文版第151页。）达旺是西藏错那县的一部分，它那巨大寺庙里的数百名喇嘛与西藏政治上的一支主要力量，拉萨哲蚌寺，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达旺地区位于不丹东部边界沿线，在战略上对印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英属印度政府于1943年占领了瓦弄。但是面对着西藏的反对，他们放弃了在达旺地带将行政管理推到麦克马洪线的计划，因为这与他们将西藏拉入英国势力范围和支持西藏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友好缓冲国的总目标不一致。但是在独立后，出现了亚洲力量变化的现实，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因而得出结论："将西藏看作我们在其中有着特殊政治利益的地区的（我们理应继承的）这种英国政策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K·M·潘尼迦：《在两个中国》，英文版第102页。）所以，自由印度与英国不同，它在用武力从西藏政府手中接管达旺地带方面处于较好的地位，只要这一行动不至于导致中国对此事进行干涉。1951年1月至2月，正当中国在朝鲜与打着联

① 参见47页注。

合国旗号的美国军队打得难分难解、中藏关系完全陷入僵局之时，印度作好了接管达旺的部署，这要归功于K·P·S·梅农担任秘书职务时期的外交部。印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由它而不应由台湾政府占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席位一事上采取的友好态度，还有印度承认中国在北朝鲜安全上的重大利益，以及印度不承认在西藏享有政治利益——凡此种种，在那个阶段创造了一种印中谅解的气氛。因此，自由印度能够在中国政府不置一词的情况下完成对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达旺地带的兼并。出乎意外的是，从1950年1月直到1959年3月西藏暴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就印度将行政管辖延伸到阿萨姆山麓小丘以上提出抗议，这与1946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大不相同。在1947年10月16日的电报中，西藏政府也向印度政府提出过苛刻的领土要求。

根据尼赫鲁所说的中国总理于1956——1957年冬季访印期间举行的尼赫鲁-周恩来会谈的记录，我们看到周恩来对麦克马洪线有这样的评论："虽然他认为英帝国主义确定的这条线不公平，然而，(1)因为它是既成事实，以及(2)因为中国和有关国家——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应当承认麦克马洪线，(3)可是他们还没有就此与西藏当局磋商。他们打算这样做。"(一号《白皮书》，英文版第50页。)

印度与中国为控制沿麦克马洪线某些边缘地区而产生的冲

突，首先发生在造成印中关系不和的1959年西藏暴乱之后。据印度总测绘师的意见（见1937年3月23日他给外交秘书的秘密备忘录），麦克马洪线原图在塔格拉山脊段和苏班西里地区，对朗久——1959年8月第一次印中冲突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存在着不确切和不明确之处。不管怎样，如果印度的边界要求仅限于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那就不会造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引起最近15年来在从拉达克至东北边境特区整个漫长的北部边界沿线的代价昂贵的对抗。中国在1962年10月的边界入侵[1]后，撤出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而且又默认印度近年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在此地重新建立的行政管辖（即阿鲁纳恰尔邦[2]）。这也表明中国同意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一既成事实（只要她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为印度所接受）。

---

① 指我方的自卫反击。——译注。

②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而且又向北推进，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继续这种侵占行径，至1953年前后将其控制逐渐扩展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54年，印度当局在非法占领的这块中国领土上成立了所谓“东北边境特区”。1972年印度又将该特区改为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

中国从不承认印度在非法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或“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进一步升格为“邦”。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印度的这一做法，又一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印度议会通过的这一法案完全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译注。

六、印度的东北边境：英国遗产

尼赫鲁总理在1959年8月13日说："就我们来说，麦克马洪线从条约上看是确定的边界，从习惯上看是确定的，从地理上看也是确定的。"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于1939年担任阿萨姆代理省督的亨利·特怀南爵士的陈述，他在写给1959年9月2日的《泰晤士报》的信中说："现在不存在谋求把喜马拉雅山的主要山脊作为边界的麦克马洪线，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因此，有关印度东北边界的合法地位的混乱认识仍然存在着。

曾担任过几年英国驻拉萨使团（按：指商务代理处）以及后来的印度驻拉萨使团（按：同前）领导的休·理查逊于1959年6月30日在伦敦东印度协会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西藏最近的事态发展和印度边界面临的危险。对此，奥拉夫·卡罗爵士当年显然就这么强调过。理查逊说："奥拉夫·卡罗爵士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很多。他在1936年发现，印度和西藏边界的确切地位和性质差不多无人知晓。按照1914年达成的名为麦克马洪线的协议，这条边界线大体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的主山脊走的。正是由于奥拉夫·卡罗爵士，这条边界线才得到了新生，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

他所作出的开端被继续了下来。"（《亚洲评论》，1959年10月。）

1959年10月21日轮到奥拉夫·卡罗爵士在东印度协会讲话，他的题目是"印度、西藏、中国三角关系"。他在回答有关印度东北边界的问题时说："麦克马洪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绘制的，然后便被人们忘记了。实际上我知道此事的全部情况，因为在1936年我是外交部的副秘书，而且是我发现了这件被人们遗忘的事。《泰晤士地图集》和所有其他地图集，都把印度的边界划成沿这里（沿山麓小丘）走，而根据条约它是沿上面（沿山脊线）走。所以，我在休假时访问了各有关当局，包括《泰晤士报》，可当时我没有能使他们对此事产生比人们现在能使他们产生的大得多的兴趣。我指出印度的大约400英里领土被画到了西藏，所以也就可能是中国境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这条线才被人们遗忘而束之高阁。"（《亚洲评论》，1960年1月。）

奥拉夫·卡罗爵士事隔20多年才"发现"麦克马洪线的断言为K·P·S·梅农所证实，后者是前者在外交部的老同事，后来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又成了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梅农在他的自传《众多世界》中写道："1913年至1914年，英国、中国和西藏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议，当时确定了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于是著名的麦克马洪线产生了。但是，中国人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印度政府对麦克马洪线完全习以为

常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中国被内战搞得四分五裂，无法坚持自己的权利。而在强有力的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则安然地沉迷在自己的独立里。可是，卡罗有一种预见——从六十年代的事变看，必须说这是个非凡的预见——，认识到东北边界有朝一日会成为象西北边界那样有争议的地区，因而迫切要求把民政、军事和行政管理的基层机构建立到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区。要不是他的这种先见之明，独立的印度便会发现自己在抵抗中国人的前进中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英文版第139页至140页。）

然而仔细阅读一下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的文件，我们便发现在确定麦克马洪线——它是英国与西藏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至25日秘密商定的，后来（于1914年4月27日）作为表明拟议中的中国和西藏间的边界的红线的延长线被画上了西姆拉条约的地图——一事上，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超出了英国政府的指示。1914年7月23日，印度总督哈定勋爵在向伦敦印度事务大臣转呈参加西藏会议的英国特命全权代表亨利爵士的最后备忘录时特别写道：“……我们认为，考虑东北边境的东部或者印中两国的部分边界不是会议职责的一部分……。”（备忘录B206）[印度事务部档案：Pol. 464；Pts 5 & 6；L/P & S/10/344。《政治和秘密备忘录》B 206。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1914年第90号。哈定致同事，1914年7月23日。] 在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对西姆拉条约（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有下面这样的话：“1913

年，西藏、中国和英国的全权代表在印度开会，试图找到有关中藏边境事宜的解决办法，接着起草了一个三方条约并于 1914 年草签。但是中国政府拒绝允许其全权代表进而正式签字”。

从阿萨姆政府与当时的（即 1934 年至 1935 年间）驻锡金政治官员 F. 威廉森关于不丹东部边界方位的通讯来看，对居住在色拉山脉以南三角地带的那些半独立部族，究竟是处在西藏抑或阿萨姆本身的政治影响之下似乎存在着某些混乱。（“居住在色拉山脉北边的门巴人是在西藏的行政管理之下。”《艾奇逊条约集》第 12 卷。）威廉森在他 1935 年 6 月 10 日给甘托克 [I. O. R.：Pol. (External) Dept.：Collection 36/File 23。P. Z. 5803/1936] 阿萨姆首席秘书的信 (No. 6- (3) -P/35) 中承认，在最近的通讯以前，他和他的前任们一直认为东部边界方位要在不丹和西藏之间确定。

1935 年，著名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队长华金栋从阿萨姆一边非法进入西藏，遭到西藏当局的逮捕。西藏政府向当时正在拉萨访问的威廉森提出抗议。结果，以驻锡金政治官员于 1935 年 9 月 28 日发给西姆拉政治部秘书的一封电报 [I. O. R.：Pol. (External) Dept.：Collection 37/2 File 28，P. Z. 7569/1935] 为开端，展开了一场兴趣集中在东北边界的新通讯。经过查问，得知华金栋从达旺宗的一个宗本那里得到过可以进入西藏的口头允许。1935 年 11 月 5 日，外交和政治部给驻锡金政治官员和阿萨姆

政府发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说，印度政府结合着不丹与阿萨姆之间最近发生的边界争端审查了印度和西藏东部和不丹之间的国际边界问题。电报声称，边界“用红线在麦克马洪画的地图上划定，而根据1914年条约的第9条为西藏政府所接受”。由于此线在达旺以北很远的地方，印度政府提出了下面的疑问：“(1) 为什么西藏人在达旺设宗本，由他们掌握批准进人西藏的权力？(2) 你们是否能肯定华金栋真的去过，还是西藏人声称他到过上述红线的西藏一侧？或者，你们是否有什么理由认为1914年达成的这项协议，从那时以来已由于习惯或非习惯方面的原因而作了修改？”电报还声称，“重要的是，你们无论如何不得就1914年达成的国际边界的合法性问题向西藏政府作出任何妥协。”有理由相信，奥拉夫·卡罗爵士是这封电报的撰稿人。在事隔21年之后，卡罗用律师的手段通过向西藏政府提出一个诱导性的问题，把西姆拉条约的红线说成事实上的边界，他这是为重新坚持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准备论据。[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9 Telegram No. 3028]。

对这封电报，暂时接替威廉森的英国商务代表巴蒂上尉从拉萨作了回复。巴蒂上尉1935年11月14日发出的电报说：“西藏政府声称，华金栋远远超越了红线，甚至到了岗巴、波密和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波隅。他们认为红线没有被修改过。他们说华金栋将来申请访问西藏也不会有用，只有西藏政府发的护照才会有效。

华金栋已被遣送回印度，西藏政府乐意认为此事已经了结”。[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9. Telegram R No. 5.]

阿萨姆政府首席秘书于 1935 年 11 月 13 日给印度政府外交秘书写信说："……2. 关于达旺与西藏的关系，总督认为达旺大体上是独立的领土，但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向西藏效忠。这种情况在《艾奇逊条约集》第 12 卷第 11 页上部分地得到了阐述。也许正是由于与西藏的这种间接关系，达旺的宗本们认为他们有权批准华金栋进入西藏。从得到的情报看，西藏政府近年来对他们这一部分边界的态度并无变化。"[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7/File 28 No. P. Z. 9019/1935.]

卡罗在 1935 年 11 月 28 日给驻拉萨的巴蒂上尉写了另一封信，为承认麦克马洪线是明确的边界线的政策辩解。他提到已故的威廉森 1935 年 6 月 10 日的信件，在信中，"他担心西藏要对山麓丘陵地区提出要求……因此他的建议显然带有下述想法的色彩，即最好还是在不太好控制的邻居西藏能够提出有效的要求以前，将这些山麓地区中的一块割让给由我们控制着对外关系的不丹。" 卡罗接着在他这封信的第二段中声称："但是在这个地区的这条国际边界线所处的地位无疑不会容许提出此类要求。根据 1914 年条约的第 9 条，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已清楚地划定，不丹以东整个达旺地区的山麓丘地，包括现在提出要割让给不丹的

狭长地带，已划归印度。事实上，当时达成的协议将印度的边界推进到喜马拉雅山纵深地带，一直达到现今正在讨论的地区以北至少60英里处的一条线上。”卡罗又说：“这段边界看来在条约实际缔结以前便已严密划定。（见亨利·麦克马洪爵士1914年3月28日的备忘录，附有附件和地图。）还应提及亨利·麦克马洪爵士1914年7月8日备忘录的第四部分之四，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位于阿萨姆本土以北的这一地区的整个达旺山丘地带，如在所引的地图中划定的那样，当时被包括在英国领土之内，因此是印度的一部分。实际划定的边界线在这张地图上用红线标明，地图交给了西藏政府，并如上述第一个备忘录中提及的那样，在英国和西藏全权代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换文中为他们所接受。”

根据巴番上尉早先于1935年11月14日电报中所谈的内容，奥拉夫·卡罗在上述信件中说道：“顺便说一下，关于华金栋事件，西藏政府刚刚重新确认这条线，说此线并未修改。因而，看来西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不丹以东山麓丘地的任何地方提出主权要求。因此，当前的问题竟然由于担心西藏会对这一地区提出或接受这样的要求而蒙上了乌云，似乎没有必要。……［I. O. R.; Pol.（External）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 No. P. Z. 2661/1936。］

卡罗给阿萨姆政府的首席秘书寄去了上述信函的抄件，并在1935年11月28日的半正式说明信中写道：“……看来对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于1914年划定并为西藏政府所接受的印藏国际边

界一直存在着很多误解。印度政府乐于知道此信是否正确地阐述了关于阿萨姆部落地区和西藏之间的边界的立场。"

阿萨姆政府的首席秘书在1935年12月7日的复信中说："阿萨姆政府接受你在给巴蒂上尉的半正式密信中所说明的阐述正确的立场……。我们这些年一直将麦克马洪线看作西藏的边界，我们不知道1914年以来曾对该线以南地区提出过任何要求。"[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 阿萨姆秘书处，D. O. No. Pol. 1887/9/85 A.P. 这似乎是第一次将喜马拉雅山山脊线称作麦克马洪线。]这是违反事实的，因为直到1936年，印度测绘局的地图表明边界是沿着阿萨姆的山麓丘地走的。巴蒂上尉1935年12月13日写信给卡罗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就西藏而言，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可顾虑的。……"[I. O. R.; Pol. (External)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 锡金甘托克官邸，D. O. No. 6 (3)-P/35。]这显然是一个下级官员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它是与驻锡金政治官员巴兹尔·古尔德1936年12月12日在拉萨拍发的第XX No. 205号电报相抵触的。

1936年2月6日，卡罗给阿萨姆首席秘书和新任驻锡金政治官员写下了内容相同的信，询问在近二十年中"是否采取过将政治控制扩展到该线的措施，特别是西藏政府是否不再采取行政措施，比如不再在边界的印度一边，尤其是达旺地区收税，以表示尊重这一边界。"在同一封信内，卡罗还着重地说印度测绘局地图

没有正确表明外部边界。[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Confidential F. O. No. F. 493- X /135.]

1936 年 4 月 9 日，卡罗给伦敦印度事务部政治司秘书 J·C·E·沃尔顿写了一封私信，目的是争取印度事务大臣在使麦克马洪线发挥作用方面给予支持。该信这样写道："……从不丹东部边界到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分水岭上的伊苏拉兹山口的印藏边界……在 1914 年条约的第九条中已清楚地划定。……那年决定不公布根据 1914 年条约达成的英藏贸易章程，同样，1914 年条约本身和麦克马洪与西藏政府达成的补充边界协定……也一直没有公布。这些文件一个也没有载入《艾奇逊条约集》第 12 卷和 14 卷中。……这种克制的结果，是在 1935 年提出该地区印度边界的位置问题须加考虑时，发现阿萨姆政府和驻锡金政治官员对边界的位置均一无所知。威廉森自己认为，在阿萨姆段，国际边界是沿着山麓丘地走的，与阿萨姆省所管辖县分的边界相一致。"卡罗接着说道："……我们是在克服了相当大的困难，而且几乎是在碰巧的情况下才发现真相的……我们在华金栋案子的查询中偶然发现……麦克马洪线为西藏政府所熟知，而且至今完全为他们接受。"[①] 他接着争辩说："……这里有着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再不公布我们与西藏的协定，此类重要问题可能要出岔子。……在

① 这充其量也不过是只有部分真实性的欺人之谈，与巴兹尔·古尔德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自拉萨的电报相矛盾。——原注。

《艾奇逊条约集》这样的出版物里没有这些协定，这一情况如为中国政府得知，就很可能被他们用来支持他们那印度和西藏之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的论点。按照新宪法，现在必须确定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因为已提议将这些地区置于阿萨姆省督的政治控制之下。……这就为重新肯定我们与西藏在这一边境的约定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除了强调将1914年英藏条约正文连同关于边界问题的换文和根据此条约制定的贸易章程载进《艾奇逊条约集》的必要性以外，卡罗还敦促“毫不拖延地采取措施将这一边界画到印度测绘局的地图上。”[I. O. R.: Pol.(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 No. P. Z. 2788/1936.]

在7月16日写给卡罗的一封信中[I. O. R.: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No. P. Z. 4911/36。],印度事务部的J·C·沃尔顿通知他,印度事务大臣在下列条件下批准了印度政府的建议:(1)无论印度政府是否打算在最近的将来重新发行《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印度测绘局地图均可标出此条边界;(2)在公布条约时,力求避免不必要的宣扬,不要引起报刊和新闻机构对此出版物的注意;(3)……最好不要发表由英国和西藏全权代表发表的接受西姆拉条约对他们两国政府具有约束力的1914年7月3日声明的原文,而用只在《艾奇逊条约集》中载进一份照会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照会的大意说,虽然西姆拉条约本身在中国全权代表草签后未经中国政府正式签字或批准,但它却被其他两方

接受，认为在他们之间是有约束力的。）

印度政府就这样取得了大臣的同意，然后立即着手出版《艾奇逊条约集》的修改本和印度测绘局地图。印度政府还在 1936 年 8 月 17 日的信中向印度事务部建议：行将访问拉萨的巴兹尔·古尔德（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应当提出西藏在达旺地区的行政管辖和纯粹是为了民政的原因而征收赋税的问题。又建议他从西藏政府那里取得一份再次肯定 1914 年条约的书面材料。此外还建议对在地图上侵占印度东北边境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No. P. Z. 6153/1936。]

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在他们 1936 年 9 月 16 日的电报[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lection 36/File 23, P. Z. 6153/36]中批准了前两项建议。但是就中国地图侵占印度领土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的问题，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均有保留。J·C·沃尔顿于 1936 年 10 月 15 日写给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秘书的信[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P. Z. 6154/36]上说："……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抗议，因为它很可能导致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关 1914 年协议的合法性的令人不快的讨论，还可能导致中国人对阿萨姆北部边界部落地域产生更大的兴趣……他们可能……引证英国地图包括印在《印度事务部书目》现行版中的地图对该段边界的画法。……"

拉 萨 谈 判

巴兹尔·古尔德自1936年9月抵达拉萨后，便一直与噶厦（西藏内阁）进行谈判。由黄慕松将军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在拉萨的存在，引起了各种各样紧迫的政治问题，如班禅喇嘛与噶厦可能和解的问题和向西藏提供军事支持以对付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危险的问题。当古尔德提出达旺和麦克马洪线问题时，噶厦答复说："……（1）达旺一直到1914年无疑属于西藏；（2）他们认为藏印边界的调整是1914年条约所期望的边界总调整和总确定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们在我们（英国）的帮助之下能得到一条明确的中藏边界，他们当然乐于遵守1914年确定的印藏边界；（3）他们一直受到鼓励，认为陛下政府和印度政府赞成对此事持这种态度，因为自从签订1914年条约和发表1914年宣言以来，印度政府从未采取步骤对西藏在达旺地区的权力提出疑问，或者宣称英国在该地区拥有权力。"[I. O. R.：Pol. (External)Dept.：Collection 36/File 29,No. P. Z. 3850/1936.]

∈BFQ∂外交部和政治部于1936年12月8日给巴兹尔·古尔德发了一个电报[I. O. R.；Pol. (External) Dept.：Collection 36/File 29；Telegram XX No. 2929，1936年12月8日新德里]，内容如下："达旺。噶厦的立场是完全站不住的。……你应指出印藏边界

是通过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换文单独达成协议的。况且，西藏政府迟至1935年11月还在华金栋事件中表示要遵守麦克马洪线。……在此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说明西藏政府遵守麦克马洪线要以取得明确的中藏边界为条件。”

巴兹尔·古尔德的答复[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3/File 29; Telegram XX No. 205, 1936年12月12日，拉萨]是：“……仔细研究一下，便感到噶厦在就华金栋事件会见巴蒂时，不大可能作出任何有用的承认。

“我担心，如果在现阶段我提出再次肯定的书面材料，我的行动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自己觉得1914年的约定需要再次肯定；那就简直可以断定西藏政府将拒绝再次肯定，特别是以书面方式，除非在事先同1914年7月3日宣言的签字者——摄政、首席噶伦、国民议会和各寺院——询商过。中国很可能会设法从这样的要求中捞取资本，而西藏政府将得到机会在为重新肯定而进行的谈判中想法加上向中国提出的各种要求。”

巴兹尔·古尔德赞成在拉萨口头重申的支持下在达旺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不赞成提出重新肯定的问题。他进一步建议收集更多有关鲜为人知、但将在此逐步建立权力的东北边界地区的情报资料，增加驻锡金政治官员和阿萨姆政府之间的个人联系。

奥拉夫·卡罗试图促使印度事务部行动

奥拉夫·卡罗于1937年2月休假探亲时到了英国。有证据表明，他力图劝说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到此时为止，它们仅对西北边境沿线的俄国妖魔担忧）注意中国当时或将来在东北边境的行动可能引起的危险。卡罗的推动促使印度事务议会副大臣R·A·布特勒去向印度事务部政治司秘书J·C·沃尔顿索取情报。1937年3月13日，沃尔顿给巴特勒写信说："规定印度和西藏——包括中国现在提出要求的那部分西藏——之间的界线的1914年西姆拉条约之所以未曾公布，（在当时）是由于1907年英俄条约产生的复杂情况，后来则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对西藏的关注。这些现在不再是正当的理由，所以去年秋天决定，将它们在特别为此目的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修改本中予以公布。真正的边境还将在印度测绘局出版的地图中标明。因为卡罗先生对我谈过此事，所以我们已经要求印度政府直接或者通过印度事务部将印度测绘局的新地图寄给我国的各主要制图公司，以引起他们注意这点。还要通知皇家地理学会和陆军部。《印度事务部书目》中的地图早已在今年的版本上作了纠正。"[I. O. R.; Pol. (Ex-

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2)/File 23.]

印度事务大臣于 1937 年 4 月 1 日打电报给印度政府询问古尔德出使西藏的结果。外交和政治部于 1937 年 4 月 19 日回复说[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No. P.Z. 2644/1937]:"……古尔德并不认为西藏政府在考虑立即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建议,应当指示理查逊(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官员)不要采取行动,除非西藏政府再次提到建议(主要是就班禅喇嘛在中国武装护卫下返回西藏问题与中国举行两方会谈),并为使者路过印度征求意见或请求提供方便。虽然陛下政府并不反对派遣西藏使团进行初步的非正式讨论,但是他们希望派代表参加任何可能影响他们按照条约对西藏享有的权利或影响西藏本身作为一个处于中国拥有宗主权[1] 条件之下的自治国的地位的全面会谈。……"

阿萨姆政府对达旺问题的看法

阿萨姆省督(按照职权他在东北边境部落地区问题上是总督代表)的看法,在 1937 年 5 月 27 日的阿萨姆信中呈报给了印度政

① 参见 47 页注。

府。这封信回忆说：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1914年曾敦促调配一位老练谨慎的官员，带着征收轻微赋税、同时让当地人民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指示，在夏季前往达旺。“阁下认为，在1914年提出而被搁置了如此之久的政策，现在已经到了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罗伯特·里德爵士：《与阿萨姆接界的边境地区史》，西隆，阿萨姆政府出版社，1942年，英文版第294至297页。）

在进一步考虑后提出了一个建议：作为初步措施，先派出一支小探险队前往达旺，在最后作出决定前“对该地进行考察，与当地居民接触，并对征税的可能性作出某种估计”。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

国际联盟的奴隶公约：它对英国的与阿萨姆接界的部落地区的政策的影响

奴隶委员会敦促国际联盟成员国禁止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一切地区实行奴隶制，并就此事向他们作出报告。但是印度政府考虑到萨地亚和巴利帕拉边境地带未设行政管理，对接受奴隶公约作了保留。它在1936年8月20日致大臣的信(No. F. 66—X/35)中说：“……要完全废除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就需要实际上占领该地带并建立正常的行政管辖，但是由于该地带在全年大部分时间

不能进入，居住的又是些难以驾驭的人，这个方针很不现实。"这个报告由印度事务大臣于1936年9月送交国联奴隶委员会。国联奴隶咨询委员会在其1937年4月10日报告的第17段中，将因在萨地亚和巴利帕拉地带没有行政管辖而作出保留，与欧洲各国在它们的殖民地问题上无保留地接受公约进行了对比，这些殖民地中的某些地区甚至可能更为偏僻。

印度事务大臣在1937年7月26日致印度政府外交部的一封电报[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E & O 4284/37]中提到了上述报告，并且说道："在作出保留时承认有些地区没有行政管辖，这可能被用来支持中国的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日内瓦提出保留并为此辩护时，最好不要对必然会涉及的缺乏控制再加宣扬。"他进一步提出劝告："在9月13日开幕的下届国联大会上宣布撤消会有好处。"

1938年2月16日，印度事务大臣向国际联盟秘书长递交了下面的信件："……印度政府再次研究了印度在1936年奴隶公约上签字时就萨地亚和巴利帕拉边境地带没有行政管辖的部分所附加的保留。考虑到委员会的意见，决定撤消这一保留。正在采取旨在将必要的控制扩展到这些地区的初步措施。"[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E & O 944/38。]

1938 年 4 月的英国达旺远征队

莱特福特上尉带着他的阿萨姆步枪部队随从和几百名挑夫于 1938 年 4 月 30 日抵达达旺。他们到达的消息很快传到西藏政府的耳朵里，西藏政府向驻锡金政治官员 B·J·古尔德提出抗议，并要求撤出远征队。与此同时，莱特福特上尉于 4 月 26 日报告：西藏官员当着远征队的面征收赋税并且要求他们撤退。阿萨姆省督也提出要求西藏政府将他们的官员撤退到国际边界的他们那侧。然而，印度政府不喜欢任何会使自己承担起长期占领和更大开支的责任的行动。他们明白表示，"莱特福特应当通知所有有关方面，达旺根据条约属于印度而不是西藏的领土，他在会见西藏官员时，应当使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应要求他们撤退，也不要向当地居民作出保证，而只应告诉他们他是被派去了解当地情况的，至于是否会对他们感到更大兴趣，则将在他回去后由政府作出决定"。[I. O. R.; Pol. (External) Dept.; Register No. P. Z. 3507/38; Telegram R. No. 899，1938 年 5 月 4 日。引自古尔德：《从亚东到外国（西姆拉）》。并见罗伯特·里德：《边境地区史》，英文版第 297 页。]

莱特福特上尉就他在达旺看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全面而精确的报告。他发现色拉山口以北的达旺地区在 1914 年以前很久便一

直完全处在西藏的行政管辖之下，西藏的税务官员已将他们的活动延伸到德让宗和卡拉克唐地区。这三个地区的居民——达旺人属于不丹人血统，而其他两个地区的人则是部落人血统——遭受着深重的压迫。

莱特福特上尉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应当要求西藏政府撤走他们的官员，即错那的宗本和他们的几个助手。随着他们的离去，他们的横征暴敛和徭役将自动消失。在做到这点以前，我们势必不会有什么威望。"他建议由英国官员在该地区实行宽松的行政管辖，将西藏人排除在外。他的建议得到当时的阿萨姆省督罗伯特·里德爵士的支持。但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印度政府停止了向达旺派遣远征队。

西藏的外交反攻

莱特福特的远征在拉萨引起了敌对的反应。西藏政府拜访了驻锡金政治官员的助理拉依·巴哈杜尔·诺尔布·东杜普，说他们收到了错那宗本和达旺寺的联合报告，得知莱特福特上尉带着大约200名士兵和600多苦力到了达旺附近的塔克宗(Takzong)，远征队希望来到达旺。西藏政府询问为什么远征队没有事先通知他们即便前来，并说他们将下令阻止远征队前来达旺。可是，拉依·巴哈杜尔·诺尔布·东杜普设法使西藏政府相信了采取这种行

动无济于事。莱特福特自达旺送给阿萨姆省督的报告透露：西藏政府借口达旺地区从未割让给印度，打算与不丹政府确定他们在该地区的自己的边界，目的是取得不丹对达旺属于西藏的承认。[I. O. R. ;Pol. (External)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9. Register No. P. Z. 5109/1938.]印度政府建议驻锡金政治官员通知不丹政府达旺地区属于英国，要求他们不要与西藏政府就该地区与不丹之间的边界进行谈判，从而制止了西藏采取的行动。由于按照1910年条约不丹保证在其对外关系方面接受印度政府的指导，所以防止了西藏向不丹提出的建议引起任何进一步的纠纷。

徒劳无益的拉萨谈判：西藏的拖延

拉依·巴哈杜尔·诺尔布·东杜普一直在拉萨与西藏内阁的阁员们进行谈判，目的是想诱使他们同意从达旺地区自愿撤出他们的行政机构。在1938年8月26日致驻锡金政治官员的信中[I. O. R. ; Pol. (External)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9, Confidential letter No. 3(5)-L/37, Lhasa, 1938年8月26日]，他谈到自己在此事上的失败的尝试："……噶厦坦率地告诉我，他们自己因没有实现他们一再重复的让我得到他们对此事的决定的诺言而感到羞耻。接着他们解释说，大部分去过印度参加1913年至1914年的英藏西姆拉会议的官员都已过世，还有一些人则已退休，不再担任政府职

位，而现在的内阁部长们和藏王（摄政）均不知达旺曾被割让给英属印度。他们还说，要查找有关任何问题的文件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西藏政府档案馆的档案不象其他国家的档案馆那样管理得井井有条。此外，他们还说，有一些有关1913年至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文件在摄政那里，有一些文件则在其他机关，不容易找到。因此，他们不能处理这一问题。他们又说，西藏政府各部门办事非常缓慢，所以我不应对这种延误感到反感。……

"2.同时，噶厦请我给他们提供一份据以将达旺划归英国政府的条约条款的抄件。他们说在收到抄件后他们将进行商量。可是，他们使我清楚地明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因为他们无权不经国民议会而径自决定如此重要的问题。

"3.按照上述讨论，我送去了1914年条约第9条的抄件和一封说明信。……

"4.迄今我已就达旺一事见过噶厦不下九次，见过摄政三次。他们全都怕就此事作出决定，他们对处理问题中可能出现拖延的解释仅仅是个借口。他们明确地说过他们作出决定需要时间，所以我担心这意味着此事将会拖延很多月或很多年，正象他们在特里一西藏(Tehri-Tibet)边界争端上所作的那样，这么多年来这个争端仍未得到解决。……"

《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修改本的出版

《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的修改本是印度政府在 1938 年 8 月出版的。有 68 册修改本送给了伦敦印度事务部副大臣，以替换他所有的那些旧版本，同时请求将旧版本销毁。（至少有两册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第 14 卷旧版本没有被销毁并且仍可找到，一册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是英国外交官约翰·艾迪斯发现的，另一本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是本书作者看到的。）这个新版本是在 1938 年偷偷地出版的，但却标明是 1929 年版。它一直是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在西姆拉会议协定的法律地位上产生无限混乱的根源。1929 年的原版《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公布西姆拉条约的原文和 3 月 24 日和 25 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伦钦夏扎关于印藏边界的换文。也没有提到新的英藏通商协定。原版谈到了要"达成有关中藏边境问题解决办法"的三方会议（英文版第 21 页）。根本没有提到印藏边境。关于英藏通商协定，它仅仅谈到 1908 年英藏通商章程的修改之处"由于 1914 年流产的三方条约"而无法生效（英文版第 20 页），并承认 1908 年的通商章程"仍然是印藏协议的基础"（英文版第 20 页）。（1908 年英藏通商章程第 3 条说："各商埠治理权，仍由中国官员督饬下的西藏官员行使。"）

在偷偷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新版本中(虽然实际上是在1938年印刷的,却标着1929年的字样),我们看到了对1914年条约作了修改的说法:"1913年在西姆拉召开了英国、中国和西藏全权代表会议,试图就西藏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关于三国政府的关系和西藏与中国以及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主持下起草了一个英国、中国和西藏三方条约,此条约于1914年由三方代表在西姆拉草签。可是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协定,他们的拒绝剥夺了他们根据该条约应得的好处,其中包括西藏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的明确承认,和一项允许在拉萨保持一名中国官员和一支适当的、不超过300人的卫队的协议。但是英国和西藏通过发表一项接受条约的条款对他们具有约束力的声明批准了这个条约。

"条约包含了中藏和印藏边境的定界。对中藏边境划定了一条双重边界线,在两条边界线之间的部分称作内藏,位于西方边界线以西的那部分西藏称作外藏。

"可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些边界线依然是不固定的。另一条边界线,即为陛下政府和西藏政府所接受的位于阿萨姆和缅甸边境的印藏边界线,划在不丹东部边界与依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分水岭的伊索拉吉山口之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河套以西,这条边界的大部分都沿着喜马拉雅山主山脊走,在此点以东则包括处于阿萨姆和缅甸政府政治控制下的所有部落地区。这条

边界线整个儿都位于离印度和缅甸平原大约100英里的地方。

“英国和西藏根据该条约制订了一套新通商章程，以代替原先于1893年和1908年制订的章程。”

1937年印度测绘局地图对麦克马洪线的画法

被要求在西姆拉条约附图中的红线的基础上绘制印藏之间和不丹与巴利帕拉边境地带之间的边界线的印度总测绘师，于1937年3月23日向印度政府外交秘书送交了两份标有麦克马洪线的题为《西藏高原及周围国家》的地图校样。他在说明信 [I. O. R.：Pol. (External) Dept.：Collection 36/File 23，Confidential letter No. 865/S，1937年3月23日] 中说：“……请您注意以下各点：

“（1）表示边界的红线在21431高地（方格C/5）、21488与23054高地（方格D/5）之间和靠近15721高地（方格E/4）处没有沿着分水岭走。估计这些都是印刷错误，边界应当沿着分水岭走，已相应地在图8 3A和8 2H中画出。

“(2)那段离开波特兰（方格E/4）以南的分水岭到米吉顿（方格E/3）东北与分水岭再次会合的边界是根据周围的情况画出的。因为在错卡尔波和扎里萨尔帕的位置确定后，这一段边界很可能要改动，我觉得应在出版发行的地图上标上大致的字样。(朗久村

即在这一地区——作者注。)

“(3)您的记录的附图有两个部分对同一条边的画法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两条红线不一致。能否请您定下这部分边界的正确划法?

“(4)最近的勘测表明，迪丘（方格M/4，图二）北面的山脊与底富山的主分水岭并不连接，而是在它稍北的地方（参看图91H)。估计边界应当沿着山脊走。

“4. 不丹和巴利帕拉边境地带之间的边界，已按照附在您的档案摘要中的铅印半官方信件[No. Pol. 1157/4148-A. P.，1936年5月29日]的描述画入。北段用虚线画成，以表示根据包含在现今归还的摘要中的O·K·卡罗先生1936年10月1日备忘录中的意见，它是临时性的。这一段在出版发行的地图上将标上‘大致’的字样。”(塔格拉山脊正好位于这一“大致”边界线的北面——作者注。)

1939年对达旺政策的进一步辩论

阿萨姆省督R·N·里德爵士在1939年1月3日给总督林立兹哥勋爵写了一封私信[I. O. R.：Pol. (External) Dept.：Collection 36/File 29. 里德致林里兹哥的密信，1939年1月3日]，重新请求于当年4月向达旺派出第二个远征队，这个远征队规模较小，花

费仅需25,000卢比。他在信中说："……这里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办法。第一个是对整个事情不再过问，尽管我们曾对当地人说过他们是我们的臣民而不是西藏的臣民。这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和开销，而且可能不会对我们产生烦人的后果，除非北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采取这种抛弃那些曾被告知应把自己看作是隶属于我们的人、使他们听凭命运的摆布的政策，是自己也不会满意的。第二个选择是永久占领达旺，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开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显然是最可取的政策。第三个选择就是我上面说的于今春再作一次规模较小的访问，但是不能漠视的是，为使此类访问产生价值，必须定期重复进行。"

亨利·特怀南爵士致总督的信

在R·N·里德爵士于1939年回国休假期间担任代理阿萨姆省督的亨利·特怀南爵士不赞成卡罗、里德派鼓吹的"前进"政策。这两人的观点得到探险家华金栋队长的支持（正是此人1935年非法进入西藏的活动引起了奥拉夫·卡罗对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兴趣，而这个条约在那时以前一直被认作是一次流产事件）。亨利·特怀南爵士在1939年3月17日给林立兹哥勋爵的私信[I. O. R. ; Pol. (External) Dept. ; Collection 36/File 23, Register No. 2029/39，特怀南致林立兹哥的信，1939年3月17日]中详细阐

述了他对达旺问题的看法。

达旺

亲爱的林立兹哥勋爵：

1. 我想到的问题有：

(1) 考虑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事态的可能发展情况，把占领达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来处理，就如1938年10月号皇家中亚学会杂志华金林的文章所建议的那样，这样做是否必要和可取？我从已故的布拉伯恩勋爵1938年7月23日给霍格的信中理解到，中国在这个地区进行侵略的危险已大大减少。

(2) 关于我们按照1914年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在法律上我们可有绝对可靠的根据？从外交秘书1936年8月18日(No. F 433 X/35)致陛下政府印度事务副大臣的信来看，中国没有批准1914年条约。如果缔结三方条约的三方中的一方不予批准，缔约的另一方能说此条约对它自己和第三方有约束力吗？

我从阁下1938年5月18日给里德的信中理解到，我们在达旺地区的条约权利对西藏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我还认识到坚持我们在1914年所取得的方位是可取的。可是，如果此事提交仲裁，以下各点也许会使西藏人有空子可钻或者引起困难。我提出这些，以防出现外交部认为就此问题举行进一

步谈判是很可取的这种情况。

(3) 条约附图的尺寸如此之小，以致"红线"压在"达旺"的字上。现在要求的实际边界是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扎 1914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的换文及其两张无疑将达旺画在"红线"英国一侧的地图为依据的。西藏全权代表 1914 年 3 月 25 日的照会说他已接到拉萨的指令，所以同意这条边界。我们是将我们的要求建立在缺乏条约应有的正式手续的换文的基础之上的呢，还是建立在条约的第 9 条——该条没有提及换文附图而仅只提到后来未被中国批准的条约的小尺寸附图——的基础之上的？

(4) 我们从 1 9 1 4 年至 1 9 3 8 年没有采取步骤实施条约的第 9 条，这种情况，（甲）从国际法观点看，以及（乙）鉴于时间的消逝和变化了的环境，在衡平法上说，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地位？

(5) 与西藏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我们政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要是这样，那末在我们的目标可能通过将边界确定在更南面的也许是迪吉恩河而达到的时候，却硬要把达旺突出地带划入英属印度，这样做是否可取？德让宗地区人口稀少，居民饱受阿卡人的压迫，而在更南面的卡拉克唐地区，从蒙依格塔人（他们是真正的门巴人，或者称作低地菩蒂亚人，估计是西藏人种）到舍尔丘普坎人（他们更象他们东面的未开

化部居），居民的特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将目标定在仅只控制错那的宗本们不在那里征收贡赋的卡拉克唐地区。正是这两个地区遭受着未开化的阿卡人的勒索。这就必须将我们最后占领或“控制”的建议局限于莱特富特报告中所说的三个“独特”地区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卡拉克唐地区和人烟稀少的德让宗地区，而不是达旺地区本身。对我们的要求的这种限制可以被用作外交筹码，以取得西藏人正式承认除达旺地区可能还有德让宗地区以外的边界线，以及在那些地区进行我们可能认为可取的那种行政改革。

2.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1914 年 7 月 8 日的备忘录说明，包括达旺的目的在于确保（甲）一个天然分水岭边界和（乙）进入西藏的最短商路以及控制达旺寺的机会，达旺寺过去通过过度的勒索和压迫堵住了经由这一路线的通商。

对这一带的进一步勘测表明，目标（甲）可以通过把边界划到达旺以南由色拉山脉和迪吉恩河构成的天然边界处而达到，目标（乙）则可以通过谈判实现。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1914 年 3 月 28 日备忘录的最后一段说道：“他们（西藏政府）在有关我们共同边界的整个讨论过程中，极力想要表现出一种合理而正当的态度。如果西藏政府和我们自己在将来根据可能得到的更加详尽的情况感到修改任何地方的边界线走向是可取的，我们无疑应该对西藏

的利益努力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尽管协定并没有提及有这样做的义务。”

那是在25年前写的，但是考虑到我们在采取步骤对此方位进行调查上所表现的拖沓，它对我在上面（2）（乙）中提出的看法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以前的通信看，西藏政府似乎不完全了解达旺的方位，没有与该地区的土著土地拥有者和地方当局商量即决定割让。考虑到当时政府的神权政治和中世纪色彩更甚于现在，这种情况根本不足为怪。去年的勘查远征表明，西藏错那的宗本们对达旺行使着管辖，对德让宗地区也程度不同地进行着管辖。在1914年时大家便知道“门人”向错那宗缴税，但是考虑到西藏的地方寺院获准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拉萨当局也许难以理解这一事实的含义。

单是人道主义的理由不足以说明“前进”政策的正确，因为相似的理由可以被用来敦促对西藏其他地区的占领。不错，去年的远征激起了希望和引起了要求，但是也出现了做许多事情来满足期望的可能，而毋需搞到竟然要去占领一块在种族、政治和宗教上从来都和西藏一样，而且甚至在现在用莱特富特的话说还是“由西藏政府的代表统治着”的地区。

可能的选择办法是，（1）建立一个管辖区，把德让宗和卡拉克唐地区，或者可能只有后者，包括在内，（2）任命一

个土著达旺商务代表，以代表我们在那里的利益，(3) 建立一个边境哨所，以保护管辖区居民不受阿卡人和达弗拉人……

除财政问题外，整个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拉萨对“前进”政策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可被允许的程度。……

总督和大臣对特怀南的意见的答复

1939年4月17日，总督林立兹哥勋爵给亨利.特怀南爵士写了一封信[I. O. R. ;Pol. (External)Dept. ;Collection 36/File 29，林立兹哥勋爵致特怀南的私人亲启信，1939年4月17日]，他在信中说道：“……虽然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我们在有关我们的条约权利方面处于不安全地位，但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从实际观点看，就此事进一步逼迫西藏政府没有好处而且还有相当危险。”但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慕尼黑危机和战争危险笼罩着欧洲），总督感到他甚至对这等温和的建议——建立一个直到达旺-迪吉恩河的管辖区以保护门巴人不受生活在其边界上的阿卡人的劫掠，或者让莱特富特上尉带领阿萨姆步枪部队的一小支卫队去德让宗地区旅行——都不能接受。

印度事务大臣在他1939年7月13日致印度政府外交部秘书的信 [I. O. R. ;Pol. (External)Dept. ;Collection 36/File 29，Register

No. P. Z. 2976/39]中暂时默认了印度政府禁止那年再次远征达旺而造成的形势，并且提议在一年之内根据当时的财政和其他条件就将来在达旺地区应采取的政策的整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虑。他还同意印度政府关于驻锡金政治官员不再就此事与西藏政府接触的看法。

大臣在1939年7月25日致总督的信[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9. 1939年7月25日大臣致总督的信的一段]中说："我注意到没有提及特怀南在信中非正式地提出的建议……即应当考虑最终在色拉山脉及迪吉恩河附近建立边境的可能性，而不是维护我们根据麦克马洪协定对整个达旺地区拥有的全面的权利……想听听您对特怀南的建议的一些看法。"

总督在1939年8月24日致大臣泽特兰勋爵的亲启信[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9，林立兹哥勋爵1939年8月24日致泽特兰勋爵的亲启信摘要]中是这样解释他对H·特怀南爵士的建议的立场的："……17. 您在您7月25日来信的第15段中提到没有谈及特怀南所提出的最终在色拉山脉和迪吉恩河附近建立边境的建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未正式提出这个建议。我认为无论从总的方面或从财政的角度看，对他的建议都有许多话要说，特别是因为他认为色拉线边界只消花费预计所需开支的四分之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一直达到麦克马洪线并将达旺包括进来。目前的形势跟您在7月13日的快信中所说的一

样，我们已要求特怀南在一年内谨慎从事；在那以后将对整个事态进行审查。同时，从随后收到的特怀南的几个报告看，可能向下锡昂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线更东处推进具有更大的急迫性，因为那里的西藏势力露出了向纯部落地区扩展的迹象，而这些地区处在很容易到达阿萨姆边界的交通线上。

在东北边境举行的官员会议

1940年8月1日在西隆（阿萨姆）的政府大厦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有阿萨姆省督、省督秘书、驻锡金政治官员、驻萨地亚边境地带和驻巴利帕拉边境地带政治官员等所有与东北边境有关的重要官员。他们同意印度政府不应坚持其对达旺的要求，并且建议可以在比麦克马洪线更南的地方，在色拉山脉或者在更南面的德让宗附近划一条比麦克马洪线更合适的线。驻锡金政治官员和阿萨姆省督认为，为争取在丝毫不干扰英藏关系的情况下维护麦克马洪线，在打破达旺、德让宗和卡拉克唐的现状前，最好先在锡昂河和洛希特河地区取得进展［I. O. R.：Pol. (External) Dept.：Collection 36/File 23，Register No. P. Z. 5515/1940］。

远东战争的影响

1941年底，日本参战。这在印度的东北边境引起了危险的新局势。同时，西藏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1942年冬天访问了达旺，竭力使附近的居民相信该地区属于西藏。他还在该地区留下了"某种西藏卫戍部队"[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 No. Pol. 3797/43. 阿萨姆省督1943年3月20日致总督的信的摘要]。还出现了一种间接的尝试，想通过举行关于遣送西藏和不丹移民返回他们原来的家乡的谈判，使不丹政府承认西藏对达旺地区的管辖权。印度政府通过他们的驻拉萨代表勒德洛先生向西藏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从达旺撤走他们的武装力量[I. O. R.; Pol. (External) Dept.; Collection 36/File 23; No. Ext. 1695/1943. 印度政府外交部1943年4月1日致印度事务大臣的密码电报]。

英美对西藏地位的分歧

英国驻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大使馆试图通过他们1943年4月19日的备忘录[《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国务院，华盛顿)，英文版第626页至628页]使美国国务院相信，"印度政

府从来认为西藏是充分享有地方自治的独立国家，有权独自与其他国家互派外交代表。……”可是，美国国务院对西藏的地位持有不同看法，他们在 1943 年 5 月 15 日的备忘录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府记得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便声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于构成中华民国领土的地区之中。本政府对这两个要求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未提出疑问。美国政府认为在这个时刻开始详细讨论西藏的地位不会有什么用处。”（同上，英文版第 630 页。）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西藏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以使麦克马洪线成为有效边界已不再可能。于是，印度政府决定推迟其向达旺的推进，因为那会使西藏人激怒到可能提请中国人注意此事的程度，而中国人那时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英国 40 年代派往部落地区的考察队

1943 年，J·P·米尔斯率领一队人到东北边境没有行政管辖的地区建立前进哨所。但是他却把他在达旺地段建立的前进哨所设到了德让宗。他于 1950 年初在皇家中亚学会讲学时透露，“我们（英国）对这个地区的要求受到西藏边境僧俗官员的拚命反对。寺院的官员们在德让宗设了一座非常令人厌恶的监狱，那的确是个很糟糕的地方，经常施加最残忍的惩罚。事实上他们将居民压

迫到这种地步，以致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出走到不丹境内。”在苏班西里地区，他发现各部落总是为掠夺奴隶而互相袭击，纠纷世代相续，永无休止。在阿波人密集聚居的锡昂河谷地带，J·P·米尔斯了解到了西藏“收税人”或掠夺者的活动。洛希特河谷为密西密人和西藏人提供了一条商路。在公认为西藏领土的察隅，J·P·米尔斯遇到一个西藏官员，“此人硬把距离正确界线下游几英里处一条虚构的界线说成边界。”这条界线显然是在梅尼尔克赖，中国军队曾于1910年在那里树立了界桩。[①]

1944年，冯·海门多夫博士和他的夫人率领一个考察队进入到那时为止几乎未经探测的苏班西里地区。巴利帕拉边境地带的这片东部地区被划了出来，并人名为苏班西里地区的单独管理单位。1945年冬，冯·海门多夫领导了惩罚一批达夫拉人居住的村庄的征伐行动，因为这些人袭击了阿巴塔尼人，另一个爱好和平的小部落。[②] 1946年，U·贝兹博士和夫人在这个地区供职。她于1949年初在皇家中亚学会讲学时透露，直到那时该地区依然无法进入，很难为开发那些地区做什么事情。

---

① 见J·P·米尔斯《阿萨姆—西藏边界问题》一文，载于《皇家中亚学会杂志》(1950年4月)。

② 见冯·海门多夫《喜马拉雅蛮夷》一书（伦敦，约翰·穆瑞，1955年）的《前言》，英文版第Ⅺ页。

官方报告中可以得到的证据（1961 年）

中国官员的报告[8]特别提到："英国军队侵入后，西藏地方政府常常与英国交涉，要求撤走入侵的英国军队。例如，西藏地方政府在 1944 年 5 月 17 日会见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时指出，英国曾派遣军队侵入德让宗等地干扰西藏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并布置其部队监视当地居民，阻止他们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服务和缴纳赋税。"报告还声称："这些前所未有的新行动怎么可能来自印度政府的指示。……希望门隅地区原来的边界维持以前的原状，并将辛赫帕（英国）官兵撤走。"此后，西藏地方政府继续不断地进行交涉。例如 1944 年冬和 1945 年 4 月它就向英国驻西藏代表进行过两次交涉，一次是口头的，另一次是书面的，要求英国部队立即从门隅南部塔克龙宗管辖的卡拉克唐和下察隅和瓦弄撤走。（见第 CR—105 页。）"……英国驻锡金政治官员古尔德在他 1944 年 10 月 11 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谈话中承认，关于门隅地区的卡拉克唐，英属印度政府以前'还没有对该地区行使特别行政管辖'，但是为了给英国占领门隅地区寻找借口，他制造了一个没有根据的谎言，大意是'鉴于最近中国人怀有占领缅甸某些地

---

⑧ 即《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

方的意图'。[①]同年12月4日，古尔德在他与西藏地方官员谈话中进一步声明，'他奉命宣布印度政府派遣的官员（即占领卡拉克唐和瓦弄的官兵）不能撤退。因此，希望西藏政府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舍弃较次要的考虑，将眼光放远些，并指示错那宗等地不要在当地征收政府赋税和摊派徭役。'古尔德于同一天向西藏地方当局递交的备忘录，声明英属印度政府坚持非法画定而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但备忘录也表示，'我的政府愿意改变边界线，即从色拉起，它应该向达旺的南面，而不是北面走'，并要求'指示西藏政府官员不要在色拉以南行使权力'。这个建议清楚表明直到1944年末西藏地方政府还在整个门隅地区充分行使着它的行政管理权；它同时表明英属印度政府对于入侵色拉以北的门隅北部仍然有些犹豫。但是因为它依然坚持占领门隅的南部，所以这个侵略性的建议从未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批准。'"（第CR—106页。）

中国官员的报告还说："在其侵入门隅地区的同时，英国还在1944年前后派遣其他部队深入到雅鲁藏布江，侵犯珞瑜的卡尔科和西蒙。"（第CR—107页。）"……在接到色拉寺的报告后，西藏地方政府一再命令佩马科的地方官员一如既往在珞瑜地区行使其行政管理权和征收赋税。……在1946年至1947年，英国派兵进

---

① 引文似有遗漏。——译注。

一步占领卡潘拉以南及卡尔科以北之间的地区，进一步破坏了西藏的行政管理权。”（第CR—108页。）关于下察隅地区，中国的报告说：“从1944年起，英国派遣部队侵入下察隅的瓦弄地区……在英军侵入瓦弄以后，西藏地方当局一再与英国人谈判，要求撤退英军。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得悉英国的这些侵略行动后分别于1946年7月、9月和11月及1947年1月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四份抗议照会。由于英国将责任推给印度，中国政府又于1947年2月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了抗议照会。（同上，第CR—110页。）

英国统治时代印度东北边境变化多端的历史表明，独立的印度在1947年继承了一项难办的遗产，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在国际法上缺乏牢靠的根据。

七、萨达尔·K·M·潘尼迦和印度外交政策的形成时期

说来真是个奇怪的巧合，对美国将第七舰队开往印度洋以“感受”一下它的水域的计划的第一次公开试探，竟然发生在印度失去她最杰出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之一的时候，这位理论家自 1943 年起便不断鼓吹印度非常需要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以便能与英国和英联邦一起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安全。

萨达尔·潘尼迦是现今这一代印度国际法专家中第一个向他们的同胞们指出印度洋对我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的人，而在这个时期仍然埋头于民族斗争的国大党领导人还无暇顾及在地理现实的基础上全面、正确地研究自由印度的防御问题。萨达尔·潘尼迦在他的《印度和印度洋》（1945 年）一书中写道：“这个国家有着一条漫长的不设防海岸线，海岸地区土壤极其肥沃，资源富足。印度的这种半岛特性，使她在整个历史上完全依赖着印度洋，她那巨大的贸易就大半是经由印度洋到达世界各地的市场的。”[1]

① 该书英文版第 82 页。

印度洋对其他国家来说只不过是许多重要的洋区之一，但对印度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海域。她的生命线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她的未来取决于在这片辽阔的水面上自由航行。要是不能在印度洋自由通航，印度的海洋不能得到充分保护，便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增长，也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政治机构。基于上述理由，萨达尔·潘尼迦得出结论："所以，印度洋必须真正是印度的"，因为对印度洋的安全的威胁可能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也可能来自波斯湾。

他说："一个恢复了活力和胜利的中国——她的人口不可抗拒地向南方（从东京湾到新加坡）移动——可能成为印度洋的甚至比日本还要大的威胁，因为日本的交通线延伸到了距离她力量的提供地过远的地方。"[1] 他提醒他的同胞：中国人有着悠久的海军传统。在 15 世纪，中国船队访问过印度港口。室利佛逝人[2] 的海军力量以及后来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葡萄牙人的海军力量，阻止了中国在大洋上的向南扩张。他在 1945 年说："这种值得注意的由该地区人口统计所显示的南向运动，十之八九可能在复兴了的中国的海军政策中得到反映"。他还就这一点谈到了印度支那的战略地位："如果——这是有可能的——印度支那在战后落入中国的

---

① 《印度洋的战略问题》（1944 年），英文版第 9 页。

② 室利佛逝是 7 世纪到 13 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的古国，我国宋代以后的史籍称之为三佛齐。——译注。

势力范围，她在南方水域的权威无疑将处于支配地位。”[1]

潘尼迦在1945年还提醒他的同胞，“……美国有些强大势力正向政府强调有必要建立更多岛屿基地以确保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优势。”[2] 他还估计说：“美国海军力量早已具有这等势力，使它成了‘不可分割的海洋’的任何区域都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潘尼迦还讨论了可能将美国吸引到印度洋的其他因素。“美国已在中东形成相当大的势力。她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且不说巴林群岛——获得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就说明在印度洋排水区出现了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将从目前的战争中形成全球的而不是半球的战略思想，所以必须想到美国作为一个主要海军强国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3]

潘尼迦还考虑过俄国经由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他说：“苏联人统治下的中亚的政治、工业和军事组织为不受限制地进入公海这一古老的俄国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在当前的战争中为向俄国提供根据租借法给予的援助而发展的交通线，说明了波斯湾对苏联人的极端重要性。……在波斯湾出现具有俄国这样的重要性、资源及固执程度的海军强国存在的可能性本身，便会引

① 《印度和印度洋》，英文版第8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87页。

起印度洋战略的彻底变化。"[1]

潘尼迦预见到，自由印度的海军在将来很长时间内（至少半个世纪）单靠自己还不能维护印度洋的秩序。他建议说："因此，对印度洋的控制必须是印度和在印度洋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及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努力，而由印度海军承担保卫由新加坡、锡兰、毛里求斯和索科特拉所建立的坚强环形圈的主要责任"。[2]

潘尼迦估量了印度在陆地上的防御力量。他在1943年写道："苏联人在西北边境的军事力量增长提出了新的问题。……随着轰炸机航程的不断增大，印度西北部城市将易于受到有效的打击"。[3]（这一由于邻近苏联而出现的问题已因1947年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建立了巴基斯坦而得到部分解决。）

潘尼迦还警告说："中国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以及她的经济和军事组织基地最近移向东南，给印度造成种种同样困难的问题。"[4]

潘尼迦建议创建一个由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和缅甸组成的"三位一体联邦"，作为保卫印度次大陆采取的一大步骤。在谈到缅甸的防御时，他强调"保证缅甸边境不受侵犯，是印度和缅甸

---

① 同上，第88-9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东南亚的未来》，英文版第30页。
④ 同上。

一样所关心的头等问题。事实上，说到保卫缅甸的问题，任何责任对印度来说都不会过于沉重。”[1]

旧印度帝国，在潘尼迦看来，作为一个共同防御区有着许多对它有利的地方。它包括了起前哨基地作用的亚丁，把波斯湾及其沿岸纳入了印度政策的轨道，它中立了西藏，并牢牢地控制着缅甸东部边境。他对亚丁交给殖民部后开始的这个防御体系的逐渐解体深感悲痛。他在1943年写道：“波斯湾移交外交部、缅甸分立、印度对西藏政策软弱化，以及英属印度在喀什的影响臻于顶点——这些是在十年期间削弱了印度防御能力的其他步骤。”[2]他根据仍然在进行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在德里建立一个大莫卧儿帝国的寇松式思想已不再能变成现实。“……可能的是巴基斯坦、印度斯坦和缅甸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单一的防御区，团结起来与英国合作而增强其力量，以形成在亚洲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结构。”[3]

潘尼迦于1946年在他的《印英条约的基础》一书中再次写到了这个问题。他运用了麦金德的地理政治论概念，以进一步证实他自己的自由印度防御的想法。印度在地理上占据着半岛和大陆的双重地位。但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亚洲陆地国家印度并没有前途，

① 《东南亚的未来》，英文版第87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同上，第46页。

因为以陆地而论，她对控制着心脏地带的苏联来说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印度不可避免地必然要与海洋世界结盟。用萨达尔·潘尼迦的话说，"基本的事实是，印度是个主要兴趣在于海洋的海洋国家。她的确属于边缘地带国家，与大陆的联系相对来说无足轻重。从欧亚大陆观点看，她只是个毗连的地区，为不可逾越的高山所隔开。另一方面，从海空观点看，她则是具有主要战略意义的中心之一。从海洋角度看，她控制着印度洋。从航空角度看，她被称作"航空岛屿"。她是海洋各地区的天然航空转运中心。印度对于海洋国家体系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对大陆国家体系来说，她却并不重要。"（该书英文版第 5 页。）

1947 年萨达尔·潘尼迦在《印度季刊》（第 1 和第 2 卷）发表了两篇论文，论述《喜马拉雅山与印度防御》问题。他在论文中指出，在出现了空中力量的时代，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屏障作用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有效。他说："如果按照纯地理学的定义把喜马拉雅山看作仅有 150 英里宽度的山脉，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将山脉孤立起来，忘掉北面的（西藏）高原，那么，喜马拉雅山脉尽管高不可言，也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屏障。"但是他又进一步说："喜马拉雅山的重要之点不在于它有 150 英里的宽度，而在于它后面的高原，这高原本身就有约 15,000 英尺高，四周有高山护卫。事实上，喜马拉雅山脉后面巨大的高原屏障提供了极其宏伟、其宽无比的防御体。在靠近山脉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建立高效能的

力量中心。高原上空的气候条件对空中作战极不适宜，而敌人可以集中起来并给喜马拉雅山一侧以连续打击的任何适当地点都离得如此之远，所以可以对此不加考虑。”

关于陆上防御，他断定“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建立更大的无人地带便可为印度半岛提供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发展其防御潜力的足够地区。”

他在这些论文中还谈到了海上防御问题。他说：“如果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她非但有可能被封锁，在经济上被扼住脖子而慢慢窒息，连她的工业中心也可能被航空母舰炸为乌有。……单是控制印度洋便能使印度免遭封锁、海上入侵和利用空袭摧毁其经济生活的灾难。”

1947 年 8 月印度被分割，巴基斯坦的两个侧翼起到了新型“封锁线”的作用。这大大削弱了印度的防御潜力。1949 年 10 月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它几乎是和俄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同时发生的——和中苏条约（1950 年 2 月）一起，在地理政治上引起了世界力量均势的变化。结果，萨达尔·潘尼迦借以建立其印度防御和外交政策理论的许多设想在印度的政权移交后不久就过时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发现印度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它的形成时期——带有他的思想印记。

自由印度为确保印度洋安全所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从东南亚国家召回为了欧洲殖民国家的利益被英国当局派去镇压民族

解放运动的印度武装力量。尼赫鲁还率先组织了于 1947 年 3 月至 4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其目的是同声抗议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洋区域各国，卷土重来。

另一方面，当共产党势力于 1948 年在马来亚、缅甸和印度支那呈上升之势时，印度政府不愿再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殖民主义性质倾倒。也许是考虑了潘尼迦所详细阐述的马来亚在印度洋防御中所处的战略地位的意见，印度政府才降低了批评在马来亚的英帝国主义势力的调子，而且不单如此，还为镇压马来亚的共产党（华人）叛乱而向廓尔喀士兵提供了过境便利。

当吴努领导的政府由于克伦邦的共产主义暴动而失去了对其大部分领土的控制、只在几个主要城市中保持着权力时，印度政府于 1949 年迫不及待地向缅甸政府提供了帮助。它在德里召集了一次英联邦会议，安排对处在危难之中的缅甸政府的财政援助，它还给吴努政府供应了小型武器。

印度政府没有承认胡志明博士领导的以建立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印度支那政府，尽管它承认他是印度支那抗击法帝国主义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领袖，而把保大政府看作法国的傀儡。

另一方面，在荷兰人侵略印度尼西亚事件（1947 年至 1949 年）上，印度政府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包括于 1949 年 1 月召集其中有两个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亚洲印尼会议。一个友好的非共产主义的印尼的出现在印度的印度洋防

御战略中是十分重要的。

在西亚和东非的印度洋海岸地带，印度政府对英国政府在伊朗、伊拉克、阿曼、亚丁、苏伊士运河、肯尼亚、还有塞浦路斯的存在，抱着一种相当宽容的看法。甚至在1956年秋天的苏伊士入侵以后，印度政府（在法英错误的冒险行动失败之后）还尽力调停埃及与英国的不和，以恢复正常关系。印度政府对东非和北非的法国和葡萄牙帝国主义一般都持更为批判的态度。印度政府还强烈反对美国通过拟议中的中东防御组织、艾森豪威尔主义、巴格达条约或中央条约组织进入西亚（也反对美国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进入东南亚）。1946年，国大党对俄国在伊朗北部的存在表示了不满，尽管用的是经过修饰的语言。尼赫鲁不赞成美国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紧接着又于1950年6月干涉印度支那，他还强烈反对美国在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处于危急关头时准备进行的军事干涉。

继续作为成员国留在英联邦之内这一最重要的外交决策，是印度政府在1949年4月作出的。考虑到印度普遍存在的反对英联邦情绪的力量——尼赫鲁本人对这种情绪也非常赞成（参见《印度的发现》，1945年）——，印度政府作出这个通过英联邦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决定，至少是因为它部分地受到了萨达尔·潘尼迦在1943年至1947年期间鼓吹的防御战略思想的影响。按照古尔穆克·尼哈尔·辛格教授1949年5月3日在印度世界事务理

事会演说时发表的意见，“防御问题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必定是影响印度政府留在英联邦之内的诸多原因中的两个。”

可是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国际法专家对形成自由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基本上是由尼赫鲁自己制订的。但是研究萨达尔·潘尼迦在我们外交政策形成时期的思想是件饶有兴味的事，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发现印度外交政策在其实际执行中的某些异常现象和明显矛盾的线索，而官方宣布的印度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诸如（1）不与大国集团结盟，（2）支持给殖民地人民自由的原则和（3）反对种族歧视这些抽象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一个代表印度出使两个中国的外交家，萨达尔·潘尼迦获得了毁誉参半的名声。他对印度外交作出的贡献，只有在印度政府公开外交部有关 1948 年至 1952 年他在中国担任大使时期的秘密档案时才能作出适当的评价。这是朝鲜战争几次要升级为世界大战的重要时期。也是在经过 40 年无成效的努力之后中国对西藏建立主权的时期，这种事态发展把沿喜马拉雅山脉约 2,000 英里“有争议的边界”这个巨大问题提到了自由印度的面前。现在应该是对潘尼迦这样一位如此多彩多姿但有争议的人物的生涯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了，特别是因为我们对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前提的反思已经开始。印度政府可以用向研究工作者开放有关潘尼迦担任大使期间我国对华政策档案的措施为此提供帮助。

第　二　部　分



一、朝鲜危机和联合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生了破坏和平的事件，分别为美国和苏联附庸的南方的大韩民国和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三八线开始了大规模战斗。同一天，美国驻安理会代表提请联合国秘书长注意朝鲜的局势，秘书长立即作出安排，召开安理会会议。

可是，我们不妨指出，自从1947年9月17日美国和苏联在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朝鲜的程序问题上出现裂隙以后，朝鲜独立问题就列入了联合国大会的议程。1945年8月，当节节取胜的苏联军队席卷朝鲜半岛、日本军队行将垮台的时候，苏联同意了美国的一项建议，即苏军接受三八线以北日军投降，而美军则接受南部日军投降。这种在1945年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分为两个占领区的状况，从那时以来一直继续到现在。

苏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反对将朝鲜问题，一个有关和平条约的事项，提交1947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国发言人则引用第11条第2段和第14条赢得了他们的一分。后来，苏联代表要求将朝鲜人民选出的代表召集到联合国大会。接着，遭

到失败的苏联集团采取了不合作政策，理由为大会是在没有邀请朝鲜代表参加审议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1947 年 11 月 14 日，大会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任务是监督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以便组成一个独立的朝鲜国民政府。

由于苏联的反对，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未能进入北朝鲜。在过渡委员会（一个被苏联集团宣布为非法的机构）的建议下，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监督了南朝鲜 1948 年 5 月举行的选举。[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原先对于在法律上是否允许他们仅仅在朝鲜的一部分执行大会 1947 年 11 月的决议曾有过真正的疑虑。] 由李承晚任总统的大韩民国于 1948 年 8 月成立。9 月，在北朝鲜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了在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军队于 1948 年 12 月离开北朝鲜，留下一支组织完善的军队和装备。美国军队则于 1949 年 6 月离开南朝鲜，留下 500 名军事顾问并提供了足够的基金，以弥补政府当时的预算赤字。

这两个朝鲜附庸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有增无减，双方都作出了许多要越过三八线的军事姿态。1950 年 6 月初，取代了临时委员会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就三八线的局势作出报告。这就是朝鲜冲突的背景。

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从美国代表那里收到关于北朝鲜军队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武装侵入南朝鲜的消息后，要求联

合国朝鲜委员会立即就局势作出报告。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在其第一份海底电报中转述了李承晚关于沿着整个三八线发生了大举进攻的声明，同时也谈到平壤电台在下午1时35分播出的关于南朝鲜在夜间越过三八线入侵的消息——李承晚和其外务部长官称这条消息为纯系捏造。（“到现在仍然找不到为驳斥共产党的指责——北朝鲜人是在反对侵略保卫自己——所需的材料。”——切塞姆大厦[1]研究组《冷战中的防御问题》，英文版第110页）。

联合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

在1950年6月25日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安理会主席B•N•劳爵士邀请大韩民国政府的代表坐到理事会桌旁，应美国代表的要求提出一份声明。可是安全理事会没有向北朝鲜政府提供这种机会。

安全理事会于1950年6月25日通过一项由美国提出并为英国的修正案修正了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安理会“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宣布“这一行动构成对和平的破坏”，并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将军队

① 即英国非官方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办公地点在切塞姆大厦（Chatham House）。——译注。

撤回三八线。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受命对局势提出经过充分考虑的建议。

6月26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根据军事观察员的报告（两个澳大利亚军事观察员于6月23日，即第一次报道发生了敌对行动的前两天，便离开了三八线。但是他们的报告是在6月26日，即武装冲突开始的第二天递交的。他们的报告没有对6月25日在三八线上发生的战争的起因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而只是强调在南朝鲜的前沿地区没有军事集结，以表明他们不能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因此，他们的报告与麦克阿瑟将军于1951年5月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所作的证词是矛盾的）作出了北朝鲜正在全面入侵的裁决，并且建议邀请双方就确定一个中立的调停者取得一致意见，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或者要求会员国政府立即进行调停。

6月29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并使福摩萨中立以对付共产党的入侵），这事发生在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并劝告"联合国会员国对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和在这一地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显然，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议是与宪章（第39和40条）相一致的。[但是就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来说，有必要将当时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抗议的苏联的"缺席"解释为等于一个大国的"弃权"。但是对这一解释存在着争论。（参见利奥·格罗斯教授在1951年2月号《耶鲁法学杂志》上的文章）。]

在经历了最初的军事挫折以后，根据安理会7月7日的决议，置于美国联合司令部指挥之下的联合国军终于得以反败为胜，阻止了北朝鲜的推进，并在1950年9月底前把北朝鲜军队打回三八线。

1950年10月，联合国军按照大会1950年10月7日决议开进北朝鲜，以建立“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招致了中国“志愿军”的大规模干预，“志愿军”将联合国部队赶到三八线以南很远的地方。1950年11月，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联合起来争取和平》的决议，规定在安全理事会由于没有五大国的一致意见而不能起作用的情况下，万一发生或者势将发生侵略时，大会可召开紧急会议。大会还在1951年2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

这些措施对军事局势没有产生明显效果。自1951年4月起，战争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所以1951年7月在板门店开始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在与三八线大体相符的停火线的基础上签订了停战协定，为召开政治会议解决有关问题作好了准备。可能须要注意的是，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25日到1953年7月28日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它是作为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的战争开始的。然后便立即发生了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美国的干涉。当联合国军正打算向鸭绿江挺进时，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将会导致冲突地区的扩大。这一警告曾通过印度

政府转达给联合国，但是没有被理睬。联合国军队向北挺进。1950年11月，中国的“志愿军”参战，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不论是在战场或者是在停战谈判中，主要的对抗者不是北朝鲜人和南朝鲜人，而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了。

对联合国在朝鲜采取行动的效果的估计

对联合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公众事务方面的研究人员在看法上有很大不同。特里格夫·赖伊、杜勒斯、迪安·艾奇逊和艾德莱·史蒂文森认为在朝鲜的行动是为集体安全所作的一次颇为成功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参议员塔夫特则持相反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同意杜鲁门总统的下述观点："对朝鲜的进攻清楚明了和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共产主义已超出用颠覆手段征服独立国家的范围，现在要使用武装入侵和战争了”（1950年6月27日），那么，我们或许也会同意他1951年5月7日的这一声明："共产帝国主义在亚洲各地的进展已被联合国在朝鲜采取的坚定立场所制止，这场反侵略战争对克里姆林宫的亚洲以外的阴谋也作出了沉重的打击。”

尼赫鲁不同意这种意见，尽管他那时也说过朝鲜战争明明是北朝鲜进行侵略的事件。[在发表于1956年1月27日的《新苏黎世报》上的尼赫鲁访问记中，据报道尼赫鲁曾说过这样的话："对

文件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后，今天他反而相信这一冲突的真正起因在于李承晚博士的政策。”（《印度斯坦时报》，1956 年 1 月 28 日。)] 他一直强调必须将朝鲜战争局限在一定地区，在对三八线的侵犯得到制止后，立即结束战争。

当联合国军得到 1950 年 10 月大会决议的批准而向鸭绿江挺进时，尼赫鲁对于这场联合国战争的性质开始冷嘲热讽起来。他在 1950 年 12 月 6 日说，“每个人都在谈论朝鲜的自由、统一和独立。正在与联合国作战的部队说的也是大致相同的话，但是大家所一致采取的态度带来的结果，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使朝鲜成为一个濒临死亡和荒无人烟的国度。离奇的是，我们竟然用杀害和毁灭我们朋友的手段在设法帮助他们。”

可以说，联合国 1950 年 6 月 27 日的行动获得 59 个会员国中 52 国的赞同，使这一行动的声誉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朝鲜战争可以说仅仅在名义上是联合国的战争，十分之九的非韩国部队都是由美国提供的。美国不容许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有效地参加制订军事计划和政治决策，也不许他们参加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

其它敌对行动和冲突的主要原由

尼赫鲁 1954 年 9 月 29 日在议会中说，“我确信，如果中国人民政府参加了联合国，便不会发生朝鲜战争，因为人们本可以通

过讨论和中国打交道。"这话清楚地说明了朝鲜战争与当前大国在远东的紧张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 年陷落以来中国大陆唯一有效的政府——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主要由于美国的反对而不许共产党中国政府占有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的结果。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继续提供援助，扶植在福摩萨定居的国民党。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是美国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政府认为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美国政府蓄意促成的，以便为实现其据说是要将福摩萨变成一个永久保护国的秘密计划提供借口。

杜鲁门于 1950 年 6 月 27 日作出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向福摩萨提供军事保护，这项决定无助于消除中立观察家头脑中的这种印象。

联合国在这个地区采取行动是否有效的原因

联合国 1950 年 6 月 27 日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本来是为了制止北朝鲜的入侵，这是有可能发生效果的，因为当时存在着一些偶然情况，如配有军事观察员的联合国委员会早已在朝鲜活动，在附近的日本有美国军队可供调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即苏联代表的缺席（他因中国代表权问题而从 1950 年 1 月 13 日至 1950 年

7 月 31 日抵制安全理事会会议）提供了摆脱苏联否决权的机会。

当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力图超出其阻止越过三八线入侵的这一原来的有限目标，不顾其两大邻国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根本利益而贸然以武力实现朝鲜的统一时，它便立即变得无效起来。

二、朝鲜战争由来新探

A·J·P·泰勒曾悲叹说："在冷战中显然连学术界也不能处于超然状态。"（《曼彻斯特卫报》，1961 年 1 月 19 日。）这话特别适用于朝鲜。自 1945 年起它便成为东西方冷战的焦点，在 1950 年至 1953 年期间又成了被看作是坚如磐石的共产党世界和西方联盟间的激烈战场。

朝鲜战争是如何开始的？这在 1950 年是个关键性问题。杜鲁门总统于 6 月 27 日，即当北朝鲜人和南朝鲜人在三八线开始交火的 48 小时内，是用下面的话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共产主义已超出用颠覆手段征服独立国家的范围，现在要使用武装入侵和战争了。"从那时起，这已成为一种政治鉴别的术语：如果一个人的回答是北朝鲜进攻了南朝鲜，这便包含了一整套政治态度，而相反的回答则意味着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无疑是查验证据，看看这些证据对战争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能提供什么回答的时候了。

西方世界一直坚信北朝鲜进行了侵略的指责，因为存在着北朝鲜军队迅速向汉城推进的间接证据。几乎没有人愿意注意，就

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靠近三八线的两个最重要的朝鲜战略重镇，南边的开城和北边的海州，都分别被敌对的部队所攻占。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在1950年6月25日听到北朝鲜宣称南朝鲜进攻海州的广播时，未经任何调查便完全置这一控诉于不顾，对南朝鲜提出的无端侵略的申诉信以为真。1967年一位名叫孙成兆的朝鲜学者在他的《世界政治中的朝鲜》（1940年至1950年）中写道："谁应对朝鲜战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是苏联、美国、北朝鲜或南朝鲜的领导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主要是由于没有可信的文件证据。迄今为止的回答，大致都是建立在间接证据之上的"（第270页）。直到现在，还没有学者试图研究直接的证据以确定在朝鲜战争中的侵略问题。以官方公报、电台广播、通讯社和报刊的报道以及联合国的文件为根据，仔细研究一下1950年6月25日三八线沿线的军事局势，任何客观的学者都会相信足以构成南方入侵北方的论据至少和足以构成北方入侵南方的论据一样有力。但是由于两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澳大利亚人）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亲美偏见，以及安全理事会（当时由于苏联因中国代表权问题抵制会议而为美国所控制）草率通过的议事程序，敌对方面的声明从未得到适当考虑。加之，非常不幸的是，印度在朝鲜战争的由来问题上未能发挥她那适当的中立作用。（安理会的印度主席B·N·劳爵士拒绝听取北朝鲜政府的申诉，但却允许南朝鲜发言人提出他的控告。）印度可以也应该采纳南斯拉夫的观点：安理会

考虑到新闻报道所提供的消息相互矛盾，而且在作出任何结论以前它也应听取北朝鲜政府代表的陈述，所以不能对有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立即作出判决。

除了这一过失，安全理事会拒大陆中国政府于联合国大门之外，意味着1950年6月25日和27日安理会对北朝鲜采取集体行动的决议是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而它们作为朝鲜的紧邻，对朝鲜的命运极为关注。所以，在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看来，美国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反对北朝鲜的战争的动机，从一开始便很可疑，特别是因为按照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福摩萨在实质上变成了美国的保护国。故而共产党世界将朝鲜战争看作是由美国授意发动的侵略的例子，西方世界则将它看作是共产党侵略的实例。而任何一方都还没有作出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根据直接证据或者一看便能明了的事实证据提出自己的朝鲜战争由来的说法。

背　景

朝鲜这个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属国，在1895年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接着又从1910年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在远东结束时，苏联参战，加入了她的盟国一边。在1945年8月日本军队垮台前夕，当节节胜利的苏联军队横行于朝鲜半岛之

时，苏联接受了美国临时提出的一项建议：为了接受军事投降，应当按三八线将朝鲜分为两个地区。这条线是作为一种纯军事机制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在该线以北的日军向苏联投降，该线以南的向美国投降。“三八线在政治上、地形上、地理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没有意义。它将整个城市切成两部分，甚至在一处把一个工厂也分成了两半。”（约翰·冈瑟：《麦克阿瑟之谜》，英文版第 163 页。）可是，在愈演愈烈的冷战背景下，三八线变成了处于美国和苏联影响之下的两个朝鲜附庸国间的严格边界。

苏美会谈陷入僵局后，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于 1947 年 9 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1947 年 11 月 14 日，大会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监督“整个朝鲜”的自由选举，以期成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国民政府”。由于苏联的反对，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未能进入北朝鲜。在大会过渡委员会——一个被苏联集团宣布为非法的机构——的建议下，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监督了南朝鲜于 1948 年 5 月举行的选举，由李承晚任总统的大韩民国于 1948 年 8 月在三八线以南成立。1948 年 9 月，在北朝鲜根据苏联模式建立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军队于 1948 年 12 月撤出北朝鲜。美国军队于 1949 年 6 月离南朝鲜回国，留下 500 名军事顾问。

两个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减，双方都作出了要越过三八线的军事姿态（据《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沃尔特·沙利文的

报导，“奇怪的是好战的谈论几乎总是出自南朝鲜的领导人。”《纽约时报》1950年6月26日)。尽管李承晚总统不太愿意，但在美国的坚持下还是于1950年5月在南朝鲜按时举行了新的一轮大选。“李承晚博士的党只保住了210个席位中的22席，对议会的控制转到了一些中间和独立集团的乱七八糟的混合势力手中。”(约翰·冈瑟：《麦克阿瑟之谜》，英文版第172页)。1950年6月7日，北朝鲜领导人向南北朝鲜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在8月5日至8日在全朝鲜举行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并且号召为此目的于6月15日至17日在海州（北朝鲜的边界城市）或开城（南朝鲜边界城市）召开协商会议。然而他们不许李承晚和他的亲密同事出席拟议中的会议，并且不准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进行任何干预。北朝鲜的这些倡议反而在南朝鲜内部造成了紧张气氛，而边界地区则被认为更加敏感，以致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请求派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以报告沿三八线的局势。6月11日北朝鲜三名代表越过三八线，打算向南朝鲜各政党领导人递交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吁书。三人的被捕加剧了当时的紧张气氛。6月17日，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抵达汉城并视察了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南朝鲜军队。他还于6月19日向国民会议发表讲话，保证在大韩民国面临共产党挑战时美国将给予支持。这是大大加剧三八线两边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战争的爆发和联合国委员会

据1949年10月21日的大会决议，在大韩民国（南朝鲜）工作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所担负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可能在朝鲜导致或将朝鲜卷入军事冲突的任何事态发展进行观察并提出报告"。但是联合国秘书处收到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一份报告是美国驻韩国（南朝鲜）大使穆西奥先生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似乎对6月25日凌晨在三八线上爆发的战争漫不经心。朝鲜时间下午2时，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打电报给在汉城的联合国委员会要求提出报告。若干小时后，委员会发出一份复电（《联合国文件》，S/1496），电文没有说明交火是如何发生的，而只是说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委员会请秘书长考虑将此事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可能性，并说委员会随后将提交经过更加充分考虑的建议。

在美国政府的紧急要求下，安全理事会于6月25日下午2时（东部夏令时间）在成功湖开会（在东部夏令时间与朝鲜时间之间的时差为14小时，朝鲜时间与伦敦时间之间的时差为4小时），并在听取了南朝鲜代表的陈述后，通过了一项由美国发起的决议，宣布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将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还要求联合国委员会于最短期间

就局势提出它经过充分考虑的建议。安理会拒绝了南斯拉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敌对行动和撤退军队，邀请北朝鲜政府到安理会说明自己的情况和理由。南斯拉夫代表徒劳地争辩说，既然有关侵略的文件和报告不足以将罪责明确地归于任何一方，安全理事会暂时就只应要求停止敌对行动。

6 月 26 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提出的南朝鲜军队完全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组织、他们受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的报告，并根据军事行动的实际进展状况，作出了北朝鲜正在全面入侵的裁决。它建议安全理事会邀请双方就确定一个中立的调停者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进行和谈，或者要求会员国政府立即进行调停。

6 月 27 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向大韩民国（南朝鲜）提供援助，抗击北朝鲜入侵并派遣第七舰队在福摩萨沿海布置警戒线，作为对付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之下的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入侵的预防措施。几小时后，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联合国会员国对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和在这一地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北朝鲜入侵和南朝鲜占领海州

了解了朝鲜危机的这种背景和 1950 年 6 月联合国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情况，我们审查有关侵略罪行问题的现有证据就比较容易了。从对发表在 1950 年 6 月 26 日的《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电讯报》等英国主要日报上的报道所进行的研究来看，似乎北朝鲜军队于 6 月 25 日某个没有特别说明的时间侵入南朝鲜，并占领了边界城市瓮津和开城，以及临津江以西或西北的全部南朝鲜领土。此外，从对发表在 6 月 26 日英国和美国日报上的下述（汉城日期）报道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可以证明北朝鲜关于南朝鲜于 6 月 25 日进攻了北朝鲜的断言的内容：

（1）《曼彻斯特卫报》：

“美国官员证实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位于北朝鲜境内 5 英里处靠近西海岸的海州。”

（2）《每日先驱报》：

美国军事观察员说，南朝鲜军队在西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救援反攻，进入北朝鲜领土 5 英里，夺取了海州城。

“夜幕降临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参谋长马奥尼中校总结局势

说：除了海州反攻地区以外，临津江以西的全部南朝鲜领土丢失了界内纵深至少3英里的地方。”

(3)《新闻记事报》：

“南朝鲜政府声称在边界的某个地点进行了反攻并占领了位于北朝鲜境内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海州。”

(4)《每日快报》(汉城，6月26日星期一上午)：

“由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于昨夜反攻，夺取了北朝鲜内5英里的一座城市。”

(5)《纽约先驱论坛报》(合众社汉城6月26日)：

“两连精选的南朝鲜部队越过作为边界的三八线，占领了正好位于该线以北的工业城市海州。韩国军队缴获了大批装备，包括10辆卡车和大约100挺轻机枪。”

(6)《纽约时报》(汉城，6月26日电)：

“据南朝鲜国家新闻局称，南朝鲜军队今晨向北推进，占领了位于边界以北1英里处的黄海道(?)首府亥州(?)，缴获10门高射炮和10辆卡车。”

(7)《芝加哥论坛报》(美联社汉城6月26日电)：

此报于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大意是在三八线以北5英里处的一座城市被占领了。[见格伦·D·佩奇：《朝鲜决议》(1950年6月24日至30日)，英文版第130页上的脚注。]

根据联合国朝鲜委员会1950年6月26日向秘书长提交的报

告，1950年6月25日1时35分平壤广播的一则消息声称，南朝鲜拒绝了北方和平统一的每一项建议，派遣一支入侵部队越过海州地段的三八线，使它的罪恶达到了顶点，从而引起了北朝鲜的反击。可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不愿核实北朝鲜关于南朝鲜军队进攻海州的断言，只是若无其事地说："委员会没有证据从任何方面证明北方的断言是正确的。"（《联合国文件》，S/1505/Rev. I.）

只有了解了海州在分割的朝鲜地理上的重要性和它作为一个人口中心的意义，我们才能十分清楚地懂得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这一失职行为的严重性。不幸的是，在1950年西方很少有学者熟悉朝鲜这个沦为日本殖民地约半个世纪之久的国家的地理。据《哥伦比亚利宾柯特世界地名词典》（1952年，英文版第972页）上的记载，海州是北朝鲜七大入口中心之一。仔细看一下朝鲜地图，即可发现海州是北朝鲜唯一接近三八线的大中心，其他大中心平壤、元山、咸兴、清津、新义州和镇南浦都在三八线以北很远的地方。该词典说，根据1944年的人口普查材料，海州的人口在82,000以上（同上，英文版第743页）。海州在公元1392年前是朝鲜的首都，现在是黄海道的首府。海州城呈长方形，四周围着供防御用的城墙。（参看劳滕扎赫的德文书《朝鲜》，1945年，第272页。）海州是采金业、商业中心和农业区，也是人参（一种广泛应用的中药）的重要生产中心。海州又是生产水泥和工农业用药品以及有着炼金业、钢铁业和发电厂的工业城市。海州还是一个重要港

口。

更加意义深长的是，这个在战争开始的当天被南朝鲜人占领的城市，是三八线以北很近处唯一的铁路交叉点，可以从现有的最短路线直通离此地 65 英里的北朝鲜首都平壤。海州与平壤还有公路相连。尽管《美国陆军朝鲜地图》和其他标准地图集均标明海州是个与平壤相连的铁路交叉点，但驻在英国的美国新闻处于 1950 年制作的地图却只标明海州和平壤之间有公路线，漏掉了铁路线，朝鲜地图表明，来自南朝鲜边界城市瓮津和开城的两条铁路线穿过三八线在海州会合，而海州乃是南朝鲜向平壤发动任何有计划的进攻的必经之路。从北朝鲜人的观点看，海州这个有着南朝鲜通向离它 65 英里的首都平壤的铁路和公路线的城市，必定在他们保卫首都安全的防御战略中占有关键的中心地位。所以 1950 年 6 月 25 日对海州的袭击理所当然地会被北朝鲜人看作是李承晚要实现他常常吹嘘的于三日之内占领平壤的一次尝试，特别是还有着 J·F·杜勒斯刚刚访问过南朝鲜并作出美国将给予支持的坚定保证这样的背景。6 月 19 日杜勒斯在南朝鲜议会里说："只要南朝鲜在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中继续起良好的作用，她将永远不会孤立。面对着边界那边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民国，证明了这一任务并非没有希望完成。"(《泰晤士报》，1950 年 6 月 20 日。)

奇怪的是，两本关于朝鲜战争的美国官方出版物——第一本

是罗伊·E·阿普尔曼的《南至洛东江，北到鸭绿江》(1961 年)，第二本是罗伯特·K·索耶少校的《军事顾问在韩国：和平与战争时期的驻韩国军事顾问团》(1962 年)——都没有提及南朝鲜军队 1950 年 6 月 25 日占领海州的事情。

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出版的 7 月 4 日《世界广播摘要》第 5 部分《远东新闻》披露了下述重要新闻：

"6 月 26 日上午 8 时（汉城上午 9 时——外国广播新闻处）的局势公报说，瓮津地区的南朝鲜军队进入了海州。"

这则广播新闻是美国的外国广播新闻处监听的，因此可以被看作是美国的官方新闻。格伦·D·佩奇教授在他那部有充分的文件为根据的著作《朝鲜决议（1950 年 6 月 24 日至 30 日）》中写道：

"……美国军事顾问证实白寅烨准将手下的大韩民国第一师的部队占领了黄海道首府海州……"（英文版第 130 页）。

从第一条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南朝鲜军队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从瓮津地区向海州发动了进攻。据罗伊·阿普尔曼说，白寅烨上校指挥官指挥的大韩民国首都步兵师第 17 团部署在瓮津半岛（见英文版第 15 页和第 22 页）。关于瓮津地区的战斗，阿普尔曼写道：

"北朝鲜于凌晨 4 时开始用重炮和迫击炮以及小型武器的火力……向西海岸瓮津半岛发动攻击。……半小时后，从

三八线那面发起了没有炮火支持的地面进攻。白寅烨上校指挥的大韩民国第 17 团的一个营的阵地受到了袭击。

“瓮津这个被海水与南朝鲜的其他地区隔开的半岛，从来没有被认为在遭到北朝鲜进攻时能够进行防守。白天还没有过去，早先制定的撤退大韩民国第 17 团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两艘从仁川驶出的运输登陆舰开到了一艘早就停泊在近海的登陆舰那里，一起在 6 月 26 日，星期一，将白寅烨上校和该营的大部分（总共约 1,750 人）全部撤走。另一个营则在早先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英文版第 22 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北朝鲜人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 4 时进攻了瓮津半岛。我们也看到由于瓮津半岛从来没有被认为在遭到进攻时能够进行防守，所以白天还没有过去，早先制定的撤退大韩民国第 17 团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因此，我们无法解释 6 月 25 日上午 9 时从汉城广播的美国官方公报中关于瓮津地区的南朝鲜军队进入海州的消息，除非我们假定南朝鲜人从瓮津地区向海州发动的猛攻发生在 6 月 25 日凌晨 4 时以前，而且这次进攻必定还带有偷袭的味道。

在格伦·D·佩奇教授的著作中，我们发现白寅烨准将的大韩民国第一师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占领了海州。据罗伊·阿普尔曼说，大韩民国第一步兵师的几支队伍 1950 年 6 月分别部署在以下地区：(1) 开城以北，(2) 开城以西大约 20 英里处的延

安，（3）开城以东15航空英里，位于临津江以北的高浪浦，和（4）汉城以北数英里处的水色（后备军和司令部）。稍为看一下朝鲜地图即可明白，开城靠近边界，与南朝鲜首都汉城有铁路相连，是保卫首都的重镇。从各种官方和非官方报道看，这座南朝鲜战略重镇是在北朝鲜入侵南朝鲜大约5小时之内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时间9时至9时半之间落入北朝鲜军队手中的。所以，把部署在开城以北的韩国第一师分遣队占领北方战略城市海州说成是韩国军队组织的反攻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它只能是在北朝鲜人入侵之先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这样设想显得更有道理，即驻守延安的韩国第一师第12团的两个营，如平壤电台所声称的那样，于6月24日深夜一起向海州发动了突然袭击（与南朝鲜从瓮津地区向海州发动进攻的时间一致），接着，便发生了北朝鲜沿着整个三八线的全面进攻。据阿尔普尔曼说，"在开城和延安的韩国第12团（第一步兵师）的大部军队都被打死或俘虏了。该团只有两个连得以逃脱，于第二天向师部报到。"（见前引书，英文版第22页。）

不带点突然袭击，装备很差的南朝鲜军队是不可能占领北朝鲜的城市海州的，而这就必定意味着入侵者要遭到重大伤亡。所有这些都似乎为现有情报所证实。我们对包括一位在职的英国将军（H·G·马丁中将）在内的切塞姆大厦研究组于1950年8月得出的下述结论并不感到奇怪："到现在仍然找不到为驳斥共产党的指责——北朝鲜人是在反对侵略，保卫自己——所必需的材料。"

（《冷战中的防御问题》，英文版第 110 页。）

朝鲜战争与安全理事会

（1950 年 6 月）

在安全理事会根据对大韩民国（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的指控于 6 月 25 日开会时，秘书长说："从委员会发来的报告和朝鲜其他来源得到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北朝鲜部队已采取军事行动。……现在局势严重，对国际和平是个威胁。……"我们知道，联合国委员会在它发给秘书长的第一份海底电报中，仅转述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所说的北朝鲜入侵和他对北朝鲜平壤电台广播的关于南朝鲜穿越三八线进行攻击的断言的否认。关于北朝鲜进攻的最初指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美国政府传给秘书长的，美国政府在早些时候收到了驻汉城美国大使穆西奥的一份海底电报。秘书长没有提及可能向他提供了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比较客观的报道的任何其他朝鲜消息来源。英国代表 6 月 25 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它说明他不能十分肯定朝鲜战争是如何开始的。他说，"安全理事会目下不应采取可能超出由它自己在朝鲜的委员会提出供它处理的证据所允许的范围以外的行动。在进一步讨论前，在我看来，似乎头等重要的是尽早得到我们所能取得的尽可能充分的事实说明。"英国代表提出了为美国代表所接受的以下修正建议："要求联合国委员会（1）于最短

期间提出它经过充分考虑的对局势的建议。"可是他没有反对美国提出的主要决议，而该决议"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只命令北朝鲜当局"立即将其军队撤退到三八线"。英国的立场在发表于1950年6月26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下述报道中显得更清楚了："在伦敦，外交部在星期天不愿发表评论，'因为伦敦没有收到官方的情报'。它仍在等待英国驻汉城使节维维安·霍尔特上尉的情报。'在目前'，外交部说，'我们照美国的立场行事。'"

英国首相艾德礼在6月27日说，"进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使人无可置疑地认为这是一次全面入侵。"（《泰晤士报》，1950年6月28日。）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中有三个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说而不致冒犯任何人：我的看法很可能影响了印度代表团，还有埃及代表马平茂德·福齐·拜，使他们对那个星期天（1950年6月25日）下午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特里格夫·赖伊：《为和平而工作》，英文版第329页。）但是，埃及后退了，在6月27日就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进行表决时采取了弃权的方针。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却于1950年6月29日发表了一项公报，他们在公报中说，"……他们反对任何凭借侵略解决国际争端的企图。出于这个原因，B·N·劳爵士代表印度政府对安全理

事会的第一个决议投了赞成票。停止侵略和迅速恢复和平状态是取得一项满意的解决办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印度政府也接受安全理事会的第二个决议。”

印度政府没有对 1950 年 6 月 25 日战争的起源进行足够的调查便决定宣布北朝鲜为侵略者，这与印度公开声称遵循的不结盟政策不相协调。

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冈瑟

许多非常明智的观察家都对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朝鲜军队势如破竹的推进感到迷惑不解，以为必定是北朝鲜当局或者他们的恩主苏联发动了这场战争。沃尔特·李普曼评论道：“……即使一支比较原始的军队也需要集结，所以准备这次入侵必定会牵涉到许多人。那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南朝鲜朋友竟然在北朝鲜没有一个在入侵之前向他们，因而也是向我们，发出警报的人。”（《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 年 6 月 27 日。）1950 年 6 月在东京作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客人呆在将军的司令部的约翰·冈瑟，曾于 6 月 25 日听到麦克阿瑟参谋部的一位重要成员说，“好戏刚刚开始。南朝鲜人进攻了北朝鲜。”（《麦克阿瑟之谜》，英文版第 150 页。）但是冈瑟没有相信这条消息，说司令部的人很可能“是轻信了北朝鲜电台散布的那些虚张声势和具有腐蚀作用的谎

言。"（同上，英文版第151页。）他也仅仅由于北朝鲜人入侵的规模很大而相信他们犯了侵略罪。"……6月25日晨，北朝鲜人在三个保安旅的支持下，以不少于四个师的兵力发动了进攻；7万人投入了战斗，70辆坦克在4个地点同时开始作战，还有一项野心勃勃的两栖登陆行动也取得了成功。问问任何一个军人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要集中这样一支兵力，武装和装备他们，使他们准备就绪并在预定的日期在时间上分秒不差地在广阔战线上投入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这至少须用一个月的时间。"（同上，英文版第151页。）

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北朝鲜入侵的两种说法

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司令部司令，这个指挥部是根据安全理事会7月7日的决议成立的。7月14日，他通过美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递交了一份关于1950年6月25日以来朝鲜军事形势的报告，报告说："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朝鲜时间凌晨4时，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发动了纯粹的无端入侵。……进攻的规模，进攻遍及三八线沿线主要地区的事实，动用的物资数量和特征以及采用的两栖登陆行动，凡此

种种均清楚地表明这次入侵蓄谋已久，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大韩民国军队的特性和部署说明它没有估计到会发生这次突然进攻。这一事实得到联合国委员会朝鲜观察员小组于1950年5月24日在三八线提出的报告的支持。该报告说，观察员小组在两周的观察过程中得到了下述印象，即韩国军队完全按防御要求编组，无法向北朝鲜军队进行大规模进攻。观察员发现，韩国军队在整个三八线都部署在纵深地带，在任何地点均无兵力集结；大量的韩国军队在积极围剿游击队，而且无论如何全然没有向北朝鲜入侵所必需的装甲部队、重炮和空中支持。这些事实完全驳斥了北朝鲜6月25日早晨晚些时候从平壤播出的消息：韩国越过边界发动了进攻，北朝鲜军队奉命进行反击。……”

麦克阿瑟将军在这个报告中也证实了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25日越过三八线向南进击，发动了四次猛攻，其中的两次针对瓮津和开城。报告还透露，北朝鲜军队于6月26日控制了瓮津地区，北朝鲜军队的一个师在6月25日下午占领了开城。

他还说，“……北朝鲜政权计划周密的进攻，他们的部队的规模，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他们连续强行进攻的能力，说明了侵略者享有主动的程度。大韩民国的保卫者被迫在侵略者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作战。……”（《联合国文件》，S/1626。）

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报告根本不提战斗开始的当天即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战略重镇海州被占领的事实，尽管韩国（南朝

鲜）在6月26日正式宣布过这一事实。他宁肯不加分析地接受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报告的说法："韩国军队在整个三八线都部署在纵深地带，在任何地点均无兵力集结……而且无论如何全然没有向北朝鲜入侵所必需的装甲部队、重炮和空中支持。"

麦克阿瑟将军1951年5月5日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南朝鲜人遭受的军事崩溃提出了经过周密考虑的分析，在分析中他特别强调"南朝鲜人在后勤方面的错误"。他说，"南朝鲜人根本不是他们（北朝鲜人）的对手；南朝鲜人的后勤力量部署差得出奇。他们将供应和装备堆存在靠近三八线的地方。他们在纵深地带没有建立任何阵地。三八线和汉城之间的一切地方都被他们用作仓库。他们丢掉了前面的防线，也就丢掉了供应。显然，他们未能将这些供应统统毁掉；所以，北朝鲜军队在进行了最初的一次打击后便在三八线与汉城之间的地区得到了新的供应基地，从而使他们得以凭借着背后便是基地所赋予的全部好处向南推进。他们毋须再依赖鸭绿江远程运输取得他们的供应。"（《远东的军事形势》，第一部分，英文版第231页。）

事情很清楚，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二个声明实际上否定了他1950年7月14日就朝鲜战争开始以来的军事形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第一个声明。我们还可以说，麦克阿瑟将军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发言时，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他去隐瞒任何事实，因为他早已被杜鲁门总统免去了统帅职务。不管怎样，他不会由于南

朝鲜人的最初崩溃而名誉扫地，因为大韩民国（南朝鲜）在战争开始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尽管由于这个国家与他的司令部靠得很近，他出于自身利益而在那里保持着一个通讯小组。他可以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进行搪塞而不受惩罚，但是如果他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面前说了明显的假话，他就会受到犯伪证罪的指控。

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个报告还给人们制造了一种1950年6月的北朝鲜入侵具有突然袭击性的错误印象。只消研究一下1950年6月的战争背景情况，任何有关人士都会预先看到存在着全面冲突的危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1950年6月26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秘密意见听取会上成功地使参议员布里奇斯和诺兰相信了他们一直在"干着一项有益的工作"。（《纽约时报》，1950年6月27日。）威洛比将军（麦克阿瑟的情报部主任）和约翰·钱伯林在他们的《麦克阿瑟》（1941年至1951年）一书中引用东京情报档案证明，美国政府和他们的仆从南朝鲜政府曾经得到过"北朝鲜人民军将于6月入侵南朝鲜"的警告（英文版第332页）。他们还说，"（李）承晚军队的相当大一部分已进入三八线沿线阵地。"（英文版第334页。）

《每日电讯报》于1950年6月27日发表了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下列电讯："朝鲜驻华盛顿大使张先生今天说，'长期以来便料想到会有'北朝鲜的入侵。他说他在两周前从朝鲜回来后曾向美

国国务院官员谈过此事。

“我对他们说迫切需要（武器）。我们知道北朝鲜人正在准备，进攻迫在眉睫。”

联合国现场观察员的报告

我们早已看到，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判决，即“北朝鲜政权在对南朝鲜进行计划周密、行动一致的大规模入侵”，是凭依三条根据作出的：(1)“军事行动的实际进展”和联合国现场观察员的报告（从1950年6月9日至23日这段时间），这个报告所说的(2)“南朝鲜军队完全是按防御要求部署在三八线所有各地段的”，以及（3）他们遭到了完全是出其不意的袭击。（《联合国文件》，S/1507。）但是这个关于朝鲜战争原由的裁决完全无法解释未作准备的南朝鲜军队——“完全是按防御要求部署的”——在北朝鲜入侵的首次打击下撤退到防御阵地，而其沿临津江主要防线又于1950年6月25日傍晚前被突破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集中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一支为他们在当天占领北朝鲜靠近三八线的战略上最重要的人口中心海州所必不可少的部队。（据《每日先驱报》驻汉城记者6月25日报道，“夜幕降临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参谋长马奥尼中校总结局势说：除了海州反攻地区以外，临津江以西的全部南朝鲜领土丢失了界内纵深至少3英里的地方。”）

1950年6月29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将联合国观察员兰金中队长和皮奇少校（均是澳大利亚人）的下述报告转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B·N·劳爵士，劳于1950年6月30日将这份文件提交安全理事会：

"三八线上的总形势——观察员在现场巡视后得出的主要印象是，南朝鲜军队完全按防御要求编组，无法向北朝鲜军队进行大规模进攻。这印象是根据以下几点主要观察得出的：

"1. 所有各地的南朝鲜军队都是部署在纵深地带。三八线南边由分散的岗哨中的小股部队和游动哨守卫。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集中军队和调集部队准备进攻。

"2. 北朝鲜军队在好几处有效地控制着三八线南边的突出部位。……没有证据说明南朝鲜军队采取了任何措施，或正在作出任何准备要将北朝鲜军队从任何一个突出部位赶走。

"3. 部分南朝鲜军队在积极围剿渗入东部山区的游击小组。……

"4. 就南朝鲜军队的装备而言，没有装甲部队、空中支援和重炮，采取任何旨在入侵的行动按无论什么军事标准来看都是不可能的。

"5. 南朝鲜军队不象具有标志着在准备大规模进攻的军事和其它供应。特别在前沿地区，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任何

供应品或军火、汽油、石油和润滑油的堆集处。……

“6. 总的来说，南朝鲜的指挥官们采取的态度是警觉的防御。一旦在早有准备的阵地遭到攻击时，他们得到的指示也不外乎是退却而已。

“7. 没有迹象表明南朝鲜军队在对北方进行任何大范围的侦察；或在师、团部一级有什么说明在准备进犯活动的过于兴奋和过分的活动。……

“8. 观察员们特别询问了收到些什么有关三八线以北局势的情报。从有些地段得到的报告说，最近百姓被迁出靠近三八线的地区，搬到北面纵深4至8公里不等的地方……但是没有收到表明三八线上的总形势即将发生变化的北朝鲜军民活动反常的报告。”

联合国现场观察员的这份报告（《联合国文件》，S/1518）被许多评论家看作是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基本文件。当时的安全理事会主席B·N·劳爵士于1950年6月30日发表评论说：“我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因为它正与我可以称之为安全理事会就此事所采取的行动的基础有关。”英国《朝鲜问题白皮书》的两位作者，R·G·凯西和已故的盖伊·温特在他们分别撰写的《朋友和邻居》（1954年）和《朝鲜发生了什么？》中都是主要根据这个文件作出了他们对朝鲜战争起源的判断。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1949年至1950年）在他们于1950年9

月 4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年度报告（《联合国文件》，A/1350）中说："观察员们的报告是在 1950 年 6 月 24 日即北方入侵前夕完成的，而第二天的事变赋予了南朝鲜军队处于防御态势的评述以观察员们在起草此报告时不可能觉察到的意义。"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还说："正是这种未曾觉察使得他们的评述具有了特殊价值，委员会考虑到了这一点。"委员会主要根据联合国现场观察员的报告和它对总的军事形势的了解作出结论说："大韩民国不可能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英文版第 4 页，第 14 和 16 段。）

对于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提一提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它被说成是"在 1950 年 6 月 24 日即北方入侵的前夕完成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本身在 1950 年 6 月 26 日以前却没有看到过《现场观察员报告》，而且在 1950 年 6 月 26 日，即在安全理事会 1950 年 6 月 25 日通过谴责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的第一项决议的数小时之后，也只能将该报告（其本身只是个简短的文件）向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作一"简要说明"。这个报告于 1950 年 6 月 29 日提交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这个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所谓基本文件在没有充分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被不适当地延误了，直到 1950 年 6 月 29 日才送到联合国秘书处。不仅起草这个文件的时间是可疑的，而且其内容在重大问题上与上面提到的麦克阿瑟将军于 1951 年 5 月 5 日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

会上发表的证词也是矛盾的。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记录

（1949年至1950年）

我们早已提到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不作任何调查便将北朝鲜1950年6月25日通过平壤电台作出的关于南朝鲜进攻海州的断言斥为捏造而不予理睬的重大失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成员国［澳大利亚、中国（福摩萨）、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和土耳其］中充满了早已在冷战问题上无可奈何地与美国拴到了一起的国家，只有印度是唯一的例外。即使如此，作为进行实地调查的国际组织，他们的行为也是不得体的。尽管联合国朝鲜委员会（1949年至1950年）承认，两个朝鲜之间以边界事件和游击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已，委任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对三八线上的军事局势作出正确估计，也注意到了李承晚对和平统一朝鲜的种种努力的不妥协态度和他要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不断叫嚷，它还是得出了北朝鲜人对南朝鲜发动了无端入侵的奇怪结论。而且他们是在并不掌握任何有关1950年6月25日三八线上的形势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作出这一结论的，因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6月23日，即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便离开了边界。

正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自己揭示了李承晚政权极不负责、极

爱侵略的特性（且不说它的贪污腐化和行政管理的不民主），只是在美国把军火供应限制在仅够三天需要的情况下，这个政权才不得不听从规劝，不去实现李承晚经常重复的“在三天内拿下平壤”的大话。事情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撤销对李承晚的限制就足以鼓励这个唐吉诃德式的南朝鲜独裁者去向北朝鲜发动一次招致北朝鲜政府大规模报复的进攻。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不会不注意到，自从1950年1月5日和6日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了大意为朝鲜和福摩萨不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的声明后，美国的远东政策可能有了改变。然而在院外援华集团的压力下任命J·F·杜勒斯为国务院的特别顾问一事本身和在同样的影响下于1950年4月恢复对福摩萨的财政援助，便意味着杜鲁门政府原先于1950年1月正式宣布的福摩萨和朝鲜政策已被否定。杜勒斯于1950年6月与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奥马尔·布雷德利一起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将军磋商，杜勒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不到一周访问三八线，还有杜勒斯1950年6月19日在南朝鲜议会以颇为好战的语调发表的讲话，根据即将发生的有关朝鲜和福摩萨的事件来看，都不会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小事。但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前的某个时候美国远东政策有丝毫改变的可能性。

但是必须承认，在头两封海底电报（《联合国文件》，S/1496

和 S/1503）中，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仅仅转递了大韩民国（南朝鲜）提供的关于入侵的情报而没有发表自己对战争起源的看法。这是值得赞扬的。在第一封电报中，他们只是建议秘书长考虑将此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可能性，并说委员会随后将提交经过更加充分考虑的建议。在第二封电报中，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只是说“建议安理会考虑邀请双方就一个中立调停者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进行和谈，或者要求（?）会员国政府立即进行调停。”（这封电报表明，那时他们已完全意识到他们自己不能行使中间调停人的职责。）但是安全理事会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完全忽略了他们经过周密考虑的建议，正式批准了杜鲁门总统早已于同日下令采取的单方面军事行动。自那时起，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更象是个党羽面不象是个中立组织，并且多少起着美国朝鲜政策发言人的作用。

南斯拉夫的弃权及其意义

南斯拉夫，1950 年时是安全理事会的第三个不结盟理事国，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发挥着比较谨慎的作用。6 月 25 日，南斯拉夫的（副代表）德尤罗·宁齐茨声明说：安理会的消息和陈述将引起极大的关注和极为严重的不安。面他的代表团觉得到那时为止，从各种电讯——其中有些是互相矛盾的——和陈述中得到的情况

还不够全面和公允，不能使安理会作出判决或确定有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负有最终和明确的责任和罪责。

他的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当尽一切力量收集可能得到的全部真实消息，因而应当听取有关另一方也就是现在被指控进行侵略的北朝鲜政府的代表的陈述。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正式提出这样一个动议的理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在此期间安理会应当无所作为或者不采取正当行动。可安理会不应通过一项确定哪一方有罪的决议而应当在目前下令或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并撤退部队，同时继续进行调查。宁齐茨接着提出了一个大意如此的决议草案。……只有南斯拉夫投票赞成自己的决议草案，它以6票反对，埃及、印度和挪威弃权的投票结果被否决了。

“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艾勒斯·贝布勒博士解释说，这一决议草案是根据朝鲜战争是战后世界总的紧张局势……亦即通常所说的‘冷战’产生的直接结果这一认识提出的。他认为，这种持续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把某些地理区域分割为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的做法。

“巴尔干半岛各国就是这样分割的，而且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后果仍在毒化总的国际关系。

“朝鲜和朝鲜人民是另一个受害者，但是这个政策在这里分割的是由一个单一国家和单一民族占据的地方。在每一方都处于敌

对影响下的双方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公开冲突反过来又加剧了总的冲突的严重程度。美国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了它在引向何处。

“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而走上加强和平的宽广大道。”贝布勒博士说，“实际上它很可能将我们径直引向一次新的世界战争。”

“南斯拉夫认为，安理会应当朝着国际关系中迄今遵循的趋势的相反方向采取行动。

“战斗仅仅进行了两天，安理会不应该也不能够放弃有关双方至少会认识到他们自已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和平的利益的一切希望。因此，南斯拉夫决议草案建议安理会重申停止敌对行动的呼吁，提请人们注意军事行动延长的严重后果。草案规定拟订一个调停程序，请双方在原则上接受这个程序，并请北朝鲜派遣一位有权参加调停的代表到成功湖来。”（《朝鲜和联合国》，《联合国公报》单篇翻印材料，1950年10月，英文版第8页和第11页。）南斯拉夫要求调停的提案以7票对1票被否决了。

《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6月27日）刊登的阿拉斯太尔·库克的一条电讯表明：“无论是频繁地给贝布勒博士打电话或者是美国人和法国人的热烈劝说都没有能使宁齐茨博士跟着多数走。”南斯拉夫代表团所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现有的情报自相矛盾，不够明确，所以不容许在没有听取北朝鲜政府陈述的情况下单方面作

出决定，在 1950 年本应具有特别的分量，因为苏联阵营已声明同南斯拉夫断绝关系，它对北朝鲜人的事业不可能会有任何特别的喜爱。

不结盟的印度在战争由来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谴责缺席的北朝鲜人，这虽然在印度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却是西方还有亚洲大部分认真负责的舆论界相信北朝鲜犯了侵略罪行的主要原因。切斯特·鲍尔斯在《大使的报告》（1954 年，英文版第 238 页至 239 页）中写道："美国起初要求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北朝鲜的侵略时，印度内阁投票支持这一提案。……美国人——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理所应作的事——很难懂得印度政府当时采取坚定立场的非凡意义。在整个印度和亚洲，共产党人竭尽全力证明是南朝鲜部队首先发动了进攻。尽管他们成功地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但并没有达到主要目的。我的看法是，这主要归因于印度代表的目击报告和印度政府在谁是 1950 年 6 月的侵略者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明确立场。如果没有这些在大多数亚洲人看来是具有权威性的和不偏不倚的陈述，在亚洲不受欢迎的李承晚政权和白人士兵再次在亚洲土地上打亚洲人的令人反感的前景，本来会引起数以百万

计的亚洲人相信共产党的那个南朝鲜发动了战争的荒谬断言。

B・N・劳爵士、阿努普・辛格博士和C・孔达皮这三位外交官在说服印度政府在朝鲜侵略的问题上采取偏袒的立场中起了部分作用。B・N・劳爵士在安全理事会于1950年6月25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时站到了西方国家一边，而这个决议只指责北朝鲜武装部队侵入大韩民国（南朝鲜），即使据报道南朝鲜人在同一天兼并了北朝鲜的战略重镇海州。作为当时的安全理事会主席，B・N・劳爵士还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态度，允许韩国（南朝鲜）的代表到安理会说明情况而不给北朝鲜政府以同样的便利。他在没有我们总理的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干了这一切。当时总理正在出访东南亚后返回新德里的途中。以充分的文件为依据的研究著作《印度的外交》的作者们［R・S・伯克斯和M・S・贝迪（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将这一事件说成是"……唯一的重大例外，在其他问题上，印度总是致力于将听取双方意见作为联合国采取行动前的必不可少的步骤。"（英文版第94页。）

在印度报刊和美国报刊上出现了关于美国大使洛依・亨德森在1950年6月29日印度内阁开会的某个时候前往外交部拜会总理和秘书长G・S・巴杰帕伊爵士一事的挑衅性宣传。阿瑟・克罗克在1950年7月4日《纽约时报》上写道："国务院巧妙的外交手腕……在说服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赞同联合国的第二项决议——它敦促其会员国用武力击退在南朝鲜的侵略——中起了重要

作用，而这一说服工作的部分进程，是由美国驻新德里大使洛依·W·亨德森完成的。"克罗克又说："还有，总理收到的贝内加尔·劳爵士的报告支持了亨德森先生所说的一切。"

除了这些可能影响了尼赫鲁在朝鲜战争起源及安全理事会1950年6月27日决议的合法性问题上作出决断的消息提供者以外，尼赫鲁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可能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北朝鲜军队迅速推进而受到影响。1950年7月7日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当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入侵时，即使不作很多调查也可清楚看出这是一次周密策划的大规模入侵。曾经发生过多次边界冲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和反指责，但是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和周密策划的入侵这个事实压倒了以前发生的一切。"有一个记者问他："您有什么情报来源说这是对南朝鲜的周密策划的侵略？"尼赫鲁回答道："事实是够清楚的。不在事先作出计划和安排，你不可能使这样的事情突然发生。"（《尼赫鲁的记者招待会，1950年》，印度新闻局。）

我们不知道C·孔达皮（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印度副代表）呈送的有关朝鲜战争由来的报告的确切内容。（据伯德伍德勋爵说，印度内阁对此事的决定是在收到C·孔达皮的一个报告后作出的。见《一个大陆的决定》英文版第203页。）即使没有机会阅读这个官方报告，我们也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这个报告整个来说与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大致相似，因为联合国朝鲜委员会（1949年

至1950年）于1950年9月4日提交大会的由阿努普·辛格博士签署的年度报告代表了委员会成员国的共同裁决，没有任何保留或异议。在我的著作《印度外交政策——捍卫国家利益》（1956年）英文版第11页上，我对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印度代表们的行为作了如下评论："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中的印度代表C·孔达皮和阿努普·辛格博士的行为应受到公众的审查，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提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由来的看法时，更多地是受个人偏见的左右而不是根据事实。"我在1959年4月会见过的已故的阿努普·辛格博士承认，由于在军事方面没有经验，由于在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北朝鲜军队迅速向汉城推进，也由于当时在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其他成员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中普遍持有的看法，他受到了很大影响，和大家一起作出了北朝鲜犯有侵略罪行的判决。

据我们所知，尼赫鲁也被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迅速推进到三八线以南的报导刺激得十分激动，他将这一推进描述为"经过周密策划的大规模入侵"。但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尼赫鲁的意见在1955年底发生了根本变化。《新苏黎世报》的F·F·阿斯钦格尔博士在访问尼赫鲁总理后在《瑞士国际事务评论》(1956年3月）上写道："尼赫鲁没有将1950年北朝鲜的侵略说成是莫斯科的帝国主义世界革命政策的表现。他说，对文件进行了彻底研究之后，他相信朝鲜冲突的真正起因必须到李承晚的政策中去寻

找。”

共产党中国和朝鲜战争的由来

因为地理上的接近和朝鲜在历史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也由于朝鲜是1931年以来日本征服中国的桥头堡，共产党中国对朝鲜的命运非常关心。杜鲁门总统没有寻求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途径而下令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他在这样做时完全忽略了此种情况。和平解决牵涉到要与朝鲜的紧邻中国和苏联进行磋商，但这就意味着立即变更美国阻挠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1950年6月27日的讲话暗示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柱都卷入了北方对南朝鲜的武装入侵。美国在1950年不承认大陆中国的合法政府与它拒绝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有着重大利害关系有关。这便把朝鲜变成了1950年至1953年间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和赤色中国激烈争斗的战场。

克莱门特·R·艾德礼（1950年时任英国首相）在1952年写道：“非常可能的是，当初要是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给了中国，朝鲜战争也许就根本不会发生。……”（《英国和美国：目标一致，看法不同》，载于1952年《外交季刊》。）尼赫鲁1954年9月29日在人民院说：“我确信，如果中国人民政府参加了联合国，便不会发生朝鲜战争，因为人们本可通过讨论和中国打交道。”（J·尼赫

鲁：《印度的外交政策》，英文版第91页。）可以回顾一下，尼赫鲁在1950年7月13日向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电报，鼓吹“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中国和苏联回到安理会……以和平解决朝鲜冲突。”沃尔特·李普曼在评论这一和平倡议时说：“尼赫鲁——他有一位卓越的驻北平大使（潘尼迦），消息肯定比我们灵通——坚持认为承认赤色中国对解决朝鲜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他把中国与朝鲜连结在一起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深一层的及持久不变的实际情况——中国在朝鲜的利益大于任何其他外国——有了了解。”（《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年8月28日。）姑且不谈中国这个影响着朝鲜命运的客观现实的大于一切的重要性，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在朝鲜战争的爆发上负有罪责。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在他《行将发生的俄中战争》（1969年）一书中写道：“北朝鲜实际上是莫斯科的附属国。建立时是这样，现在仍一如既往。共产党中国直到1949年10月才正式成立。在1950年8月——战争爆发后两个月——以前它甚至没有向北朝鲜派出大使。”（英文版第96页。）他还写道：“可能的情况是，朝鲜使北京和华盛顿一样冷不防地吃了一惊。中国正在清理自己的革命事务，还没有到需要同朝鲜交手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时期。中国人并不十分了解朝鲜的局势。他们在朝鲜没有政治机构；一切都在俄国人的掌握之中。他们自己还有着巨大的问

题——在中国扩展和巩固他们的政权，征服和兼并西藏（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除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压在他们心头的对他们来说远为重大的问题：对付尚未受到美国的任何军事力量保护的福摩萨和蒋。朝鲜在1950年春天不大可能作为一个合乎逻辑或具有吸引力的值得为之奋斗的对象而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英文版第96页。）

C·P·菲茨杰拉德在《中国的革命》（1952年）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与北朝鲜没有多大关系。那个卫星国是在日本投降时由俄国人创建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前很久已经在事实上存在了。……”（英文版第219页。）他进一步写道：“当北朝鲜侵入南方，声称南朝鲜先侵犯三八线时，北京支持了这种西方斥之为虚构的说法，并给北朝鲜以口头上的鼓励。中国没有给予军事支持，北京的宣传部门对这次入侵没有思想准备，将近24小时没有得到指示。……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在朝鲜战争开头24小时中陷于混乱是个耐人寻味和富有启发性的事实。”（英文版第220页。）

S·R·施拉姆教授在他的《毛泽东》传记中也不接受那些在北朝鲜入侵南朝鲜问题上指责中国好战的人的看法。“内战尚未结束，在各个边远省份还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地区存在着有待消灭的抵抗势力，对西藏的控制还没有建立，最重要的是，毛决心要打败蒋在台湾的残余势力。在邻近地区的军队中，为此目的而调集的部队已准备就绪，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计划在夏季发动入侵。”

(英文版第 262 页。)

关于中国在朝鲜战争开始时的反应，印度驻中国大使 K·M·潘尼迦写道："联合国干涉朝鲜在中国没有引起特别反应。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的头三个月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军事活动。但是，(美国) 干涉台湾被认为是直接的威胁，尽管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也表现了值得模仿的耐心和节制。"(《在两个中国》，英文版第 103 页。)

A·S·惠廷在他以大量文件为依据的研究著作《中国跨过鸭绿江》中写道："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人在北朝鲜承担的义务能在任何意义上与苏联相比。特别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工作。"(英文版第 45 页。)

在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常在那里聚会的华盛顿布莱尔大厦 1950 年 6 月 25 日会议上，普遍的感觉是中国那时做好了进攻福摩萨而不是朝鲜的准备。格伦·D·佩奇教授写道："与会者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入侵福摩萨的计划仍然有效，情报报告说明他们已于 6 月 15 日前作好入侵准备。(《纽约时报》，1950 年 6 月 28 日，汉森·鲍德温。) 国防部长约翰逊得到的情报说，有 4 万多到 15 万 6 千共产党部队集结在台湾岛对面的大陆上，这和他为时两周的远东之行是同时发生的。(《听证会》，第四部分，2621)。"(见《朝鲜决议》，英文版第 133 页。)

艾伯特·L·沃纳在他的《朝鲜决议是如何作出的》一文中谈

到 1950 年 6 月 26 日在布莱尔大厦进行的讨论时写了如下的话：“……考虑过在我们开始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时俄国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总的看法是俄国不会用它自己的兵力进行干预。中国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很少考虑。”（《哈波斯》月刊，1951 年 6 月，第 103 页。）

从现有材料可以清楚看出，共产党中国与朝鲜战争起源的牵连是微乎其微的。

对朝鲜战争由来的相互冲突的理论

正象我们在开头指出的那样，还未曾试图对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的由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每方都主要是利用引证证据指责对方。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得意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通过代理人”发动武装“侵略”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这里还有一种推测，认为北朝鲜人侵的时间表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于 1950 年 2 月签订中苏条约——此条约之所以签订主要是由于双方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支持下复活——前在莫斯科会谈时决定的。但是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那种认为毛在事先得到了将爆发战争的警告的看法”（A·S·惠廷、埃德加·斯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哈罗德·C·欣顿等）。《赫鲁晓夫回忆录》（一本作者是谁存在着疑问的书）中声称金日成跑到莫斯科，得到斯大

林的允许去进攻南方。(英文版第 367 页至 368 页。) 这本书还说斯大林决定征求毛泽东对金日成建议的意见，毛泽东也作了肯定的回答（英文版第 368 页）。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大河彼岸》一书中说："人们常常认为，朝鲜在亚洲提供了一个俄国在对抗西方于欧洲施加的压力中转移其困难的所在。一些玩世不恭的人还进一步暗示，整个朝鲜冒险行动是斯大林使美国陷入与中国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阴谋。这或许说明斯大林有着比任何人都多的马基雅维里式诡诈。(英文版第 654 页。) 曾是 1945 年至 1948 年美国军事政府成员的威尔伯·希契科克在他于 1951 年 3 月发表的论证严密的《现代史上北朝鲜的抢跑》那篇文章中，详细研究了各种各样赞成苏联应对引发朝鲜战争负责的看法的论据。但是他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在朝鲜采取冒险行动，所以得出结论说：入侵南朝鲜是北朝鲜的金日成下令进行的，不仅没有从莫斯科得到过指示，而且莫斯科并不知道。I·P·斯通在他的《朝鲜战争秘史》一书（英文版第 62 页至 63 页）中引用了 1949 年夏季逃离德国苏占区的俄国上校的证词，它说明俄国政治局拒绝向北朝鲜共产党提供空军，免得他们在远东制造灾难。马克斯·贝洛夫教授在他以充分的文件为依据的研究著作《苏联的远东政策》(英文版第 255 页）中写道："人们已经看到，有许多重大事件无法证明应由苏联承担这样的（即直接的）责任——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其中的一件。"

埃德加·斯诺在1962年写道："直到今天，北京政府仍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也相信——南朝鲜是在美国唆使下发动了进攻。我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明，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不相信。(如果它一旦得到证实，十多年的历史将不得不全部重写。)但是不应忽视的是，愚蠢的李承晚和他的将军们确曾一再威胁并吁请美国支持对北方进行武力征服。"(见前引书，英文版第714页。)

朝鲜政治的动力和李承晚的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对他们在1950年6月25日下午1时35分听到的南朝鲜入侵北朝鲜海州地区的指控从未试图核实。他们把北朝鲜入侵称作"无缘无故和未提出过警告的侵略战争。"[《联合国朝鲜委员会(1949年至1950年)的报告》，载于《联合国文件》，A/1350英文版第4页。]他们未经适当调查便得出结论说，北朝鲜在李承晚的党于5月30日的选举中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于1950年6月初发出的和平统一呼吁，不过是为了掩盖其侵略阴谋的假呼吁。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调查南朝鲜一方发动挑衅的可能性，实用主义地忘记了朝鲜被人为地分割，以前发生过边界冲突，最近在边界附近逮捕了北朝鲜三名和平使者后边界沿线又出现了紧张局势。他们忘记了自1948年以来通过总统

制宪法机制独自掌握着政权和任命权的李承晚，如何面临着南朝鲜议会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内阁向立法机构负责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忘记了李的党在最近选举中的溃败预示着李的政治前途不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J·F·杜勒斯在收到李承晚通过其1950年6月第二周从汉城返任的约翰·张勉大使传递的呼救信号后对朝鲜进行了三天访问。（见霍默·比加特发表于1950年6月26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报道。）许多有才智的朝鲜问题观察家在1950年曾注意到李承晚统治下的南朝鲜如何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李承晚如何通过提出北方将入侵的借口试图把定于1950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拖延6个月之久，以及他未能采取措施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1950年1月，美国巡回大使杰塞普在访问汉城时发现，“许多反对党代表不是被关在狱中便是在保释中”（乔治·M·麦丘恩：《今日韩国》，1950年，英文版第244页），故而“对政府近来对公民权利强行作出的苛刻限制表示了美国的不满”（同上，英文版第244页）。在1950年4月的备忘录中，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威胁说，除非提出反通货膨胀措施，否则便要重新审查援韩计划，并对李承晚推迟选举的意图表示关切。“只是在进行了这样的威胁之后，才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项措施而提高了捐税并如期举行了选举。”（里查德C·艾伦：《韩国的李承晚》，1960年，英文版第117页。）

1950年6月李承晚在选举后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这从下述

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实际上根本不急于举行选举。去年他与韩国民主党在官员任命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该党指责他忘恩负义、不念他们曾支持他当选总统的前情后便同此集团断绝了关系。1949 年下半年，议长申翼熙和一度担任过内务部长官的赵炳玉，将韩国民主党与其他保守分子合并组成反对李承晚的民主国民党。这个新党在议会中要求修改宪法，使内阁向议会负责，并从总的方面设法限制总统权力。政治舞台上的独立人士被李承晚反对国内左派运动的暴行吓得毛骨悚然，都倾向于赞成对最高行政官作出某些限制。可以预料，一场重大的斗争即将发生。

"最初几次小规模战斗的胜利者都是李的对手。5 月 30 日举行了选举，结果是行政当局遭到惨败。李在议会的追随者从 56 人降至 12 人，即使包括倾向于行政当局的独立人士在内，他也只能指望有 65 张选票。民主国民党人几乎立即便着手提出使内阁向国民议会负责的措施。"（里查德·C·艾伦：《韩国的李承晚》，英文版第 117 页至 118 页。）①在南朝鲜的这种政治背景下，北朝鲜 6 月 19 日要求北朝鲜立法会议和南朝鲜国民会议联合组织一个单一

---

① 1950 年 8 月 3 日，《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一篇该报特约记者写的题为《两个朝鲜》的文章。该文对李政权有下述评论："李博士的政府建立在警察国家制度的基础之上。农民受到残酷对待；反对党遭迫害；主要反对党报刊被封闭，编辑遭逮捕；国内贪污腐化盛行，极似中美洲的一个'香蕉共和国'。

"5 月选举使李博士威信大降，毫无疑问，新议会下定决心要剥夺他的许多独裁权力。"

的全朝鲜议会、为整个朝鲜起草宪法的呼吁便不能被说成是不诚实的而被弃置一旁。可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却无根据地宣称，"号召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广播宣传攻势似乎完全是为了起掩盖作用。"（《联合国文件》，S/1505。）1950年6月20日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该报驻远东记者发自汉城的下述报道："在南朝鲜，认为向北方发动武装进攻可解决严重经济问题者不乏其人。10万配有美国装备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外加5万警察部队，大概比北朝鲜军队要强得多。"

除了李承晚的独裁倾向外，美国政府也知道李承晚自从1948年8月大韩民国（南朝鲜）成立以来便一直急切地想用武力统一朝鲜。李可以声称曾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应允，后者在汉城举行的韩国成立典礼上讲话时谈到了三八线："这个障碍必须拆除，也一定会拆除。什么也阻挡不了你们人民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人实现最终统一。"（约翰·冈瑟：《麦克阿瑟之谜》，英文版第154页至155页。）李总统关于入侵北朝鲜的谈话，例如1949年2月对陆军部长肯尼思·C·罗亚尔发表的评论，使一些美国官员非常吃惊。（见格伦·D·佩奇：《朝鲜决议》，英文版第69页。）1949年12月30日李承晚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新的一年，我们全都要作出一致努力收复失地。到现在为止，鉴于国际形势，我们遵循着与美国和联合国的和平政策相适应的和平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新的一年里，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我

们有责任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统一南北朝鲜。”1950 年 1 月，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茨将军对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说过，“美国政府曾通知韩国政府，南朝鲜发动进攻会立即导致美国终止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一切援助。他还说美军撤退时给韩国军队的军事装备仅限于防御性武器，包括小口径炮，但是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南朝鲜对发动统一国家的战争连想都不可能想。”（《联合国文件》S/1350，英文版第 10 页。）

1950 年 2 月，李承晚带着他的军队首脑拜访了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1950 年 3 月 1 日，李承晚再次发表挑衅性讲话。《纽约时报》在 1950 年 3 月 2 日发表了该报驻汉城记者的报道，所用的标题是：

李答应援助北朝鲜人

暗示以武力反对“外国傀儡”

《曼彻斯特卫报》（1950 年 3 月 2 日）以“总统的强硬讲话：希望统一朝鲜”为标题发表了路透社从汉城发出的电讯：“这里的观察家相信，李博士从他与麦克阿瑟将军最近的会谈中得到了信心。他的讲话是去年 6 月美军撤退以来他所发表的讲话中最强硬的一次。”

1950 年 3 月 14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它的驻汉城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写的一篇报道，大意是：“13 位南朝鲜国民议会议员……今天被认定犯了违反国家安全法的罪行，并被判处 1 年半至

10年徒刑。”他报道，在这些人受到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反对南朝鲜军队入侵北朝鲜”。另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里查德·J·A·约翰逊——他在南朝鲜生活了好几年——于1950年4月27日在纽约新闻俱乐部对听众说，“……南朝鲜方面真是非常希望进攻北朝鲜，只是因为美国当局有一个时期只允许他们拥有够打三天仗的军火，才没有这么做。”（见D·N·普里特：《朝鲜问题新线索》。）

威拉德·谢尔顿在《民族》周刊（1950年7月8日）上写道："国务院证实了这则报道：他（李承晚）在数周前建议入侵北方，这个计划遭到了美国的否决。”

布莱里·博尔斯在《外交政策公报》半月刊（1950年7月11日）上写道：“南朝鲜前内务部长官金考锡在战斗开始后转而效忠北朝鲜，并于7月5日指责李总统在6月25日下令入侵北朝鲜。”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推测也许不无道理：J·F·杜勒斯1950年6月19日在汉城发表的鼓舞士气的讲话对李承晚可能产生了灾难性的心理影响。杜勒斯大使对朝鲜国民议会说，正象美国在19世纪为全世界尽过力那样，大韩民国能够在20世纪起同样的作用。在谈到“韩国的伟大实验”时，他预言“福利稳定增长的健全社会”的“和平影响”，最终“将瓦解苏联共产主义对你们北方同胞的控制并不可抗拒地吸引他们与你们统一”。大使在最后一段中向朝鲜立法议员们保证说，“你们不是孤立的。只要你们在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计划中继续起良好的作用，你们将永远不会孤

立。"（格伦·D·佩奇：《朝鲜决议》，英文版第74页。）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1955年10月会见格伦·D·佩奇教授时对他说，杜勒斯独自到南朝鲜进行了访问，上述讲话稿没有给他看过。他回忆说："这是在你到现场工作的同事想干某件事情而你没法说'不行'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同上，英文版第74页。）

重新估价有关朝鲜战争原由的证据的必要性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根据实在证据对李承晚发动朝鲜战争的可能性进行过任何认真研究。约翰·普拉特爵士在这方面的论点不能使人信服（《朝鲜——导致战争的谎言》，1951年）。1950年7月7日，尼赫鲁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没有苏联的支待，不可能发动北朝鲜入侵。在冷战的那个微妙时期，正是印度关于北朝鲜犯有侵略罪行的判断使得世界舆论的天平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倾斜。但是到1955年底，在对文件作了进一步研究后，尼赫鲁对朝鲜战争起源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然而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他与阿斯钦格尔博士会见时没有提及是哪些文件。不幸的是，我们无论从联合国委员会或其军事观察员那里，还是从已出版的朝鲜战争的正式历史中，都没有获得1950年6月24日至25日在三八线沿线发生的战斗的最初几小时的军事形势的真实

情况。一般传播的看法是，北方在清晨 4 时在三八线全线发动了无端侵略，而由于南朝鲜人仅只有些轻型武器，他们便被迫在第一次猛攻下全线溃退。但是从对格伦·D·佩奇教授所收集的 1950 年 6 月 25 日的事实的研究看来，似乎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副参谋长小沃尔特·格林伍德少校是在早晨 5 点半第一次得知进攻消息的。他在三小时后才肯定北朝鲜人发动了企图侵入韩国的进攻，在北朝鲜人开始进攻大约八小时后，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作战和情报官员才同意正在发生大规模入侵。甚至中午的局面在南朝鲜也显然没有引起多大担心。正如驻汉城的美国新闻处副主任约翰·C·考德威尔后来所回忆的那样，“朝鲜人中存在着一片乐观情绪，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调子也是乐观的。”(格伦·D·佩奇：《朝鲜决议》，英文版第 84 页至 85 页。)

朝鲜战争的主要交战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急于忘掉他们自 1950 年以来为控制远东而争斗的惨痛往事。真理是战争——“热”战和“冷”战都一样——的第一个受害者，朝鲜战争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一个国际专家组织对朝鲜战争的起源进行穷根追底的研究，以剔除迄今为止公布的记述所提供的证据中那些反常情况和矛盾，弄清这次重大冲突的全部真相——现在应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三、朝鲜战争由来和印度的立场

西方公认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是共产党侵略促成的。印度政府没有充分弄清与局势有关的事实便对冷战中这场最严重的冲突给予了道义上的全面支持，从而使自己站到了西方国家一边。在1950年6月29日的官方声明中，印度政府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因为他们认为是北朝鲜进行了“侵略”。但是，说一个国家是侵略者而又不许受指责的一方就此进行辩解，这在程序上是极不公正的，不符合印度宣布的在冷战中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的政策。克里希纳·梅农1955年1月13日在马德拉斯发表的一次讲演（《印度教徒报》）中声称，“任何国家在其未出席的情况下不应在任何国际机构中受到谴责，因为人们得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印度和西方国家一起拒绝给北朝鲜申诉的机会，同时却允许南朝鲜在安全理事会陈述他们的情况和理由。

印度和西方国家一起谴责缺席的北朝鲜的做法，尽管在印度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愤懑，但却使西方特别是英联邦国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信赖的舆论界相信北朝鲜犯了侵略罪行。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们也多方利用这点为美国对朝鲜的轻率军事干涉辩护。切斯

特·鲍尔斯写道："美国开初要求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北朝鲜侵略时，印度内阁投票支持这一提案。……美国人——他们认为事实就是——很难懂得印度政府当时采取坚定立场的非凡意义。在整个印度和亚洲，共产党人竭尽全力证明是南朝鲜部队首先发动了进攻。尽管他们成功地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但并没有达到主要目的。我的看法是，这主要要归因于印度代表根据亲眼所见的材料写就的报告以及印度政府在谁是1950年6月的侵略者问题上所采取的明确立场。如果没有这些在大多数亚洲人看来是具有权威性的和不偏不倚的陈述，在亚洲不得人心的李承晚政权和西方白人士兵再次在亚洲土地上打亚洲人的令人反感的前景，本来会引起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相信共产党那个南朝鲜发动了战争的荒谬断言。"（《大使的报告》，英文版第238页至239页。）

鲍尔斯还说："据《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老资格记者罗伯特·特朗布尔的判断，这些行动体现了'在印度舆论态度微妙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个勇敢决定'。他报道说：尼赫鲁'冒了一次触犯在东西方问题上极端敏感的很大一部分印度公众的风险'。"

英国著名印度事务观察家伯德伍德勋爵在他《一个大陆的决定》一书（第202页）中就印度支持安全理事会1950年6月25日和6月27日的决议一事写道："1950年6月末，经过4天犹豫后，印度接受了联合国那两项据此在朝鲜采取了制止侵略行动的决议。这个决定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它是在收到联合国朝鲜委

员会印度代表C·孔达皮的报告后明智地作出的，而人们知道孔达皮对南朝鲜政府可并不同情。所以，印度的态度完全是由于她深信北朝鲜干出了侵略的事而决定的，尼赫鲁感到他的国家应当从道义上支持联合国的事业。"

在上述情况下，人们自然要问孔达皮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报告的确切内容究竟是什么。可是即使没有机会阅读这个官方报告，我们也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这个报告整个来说与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大致相似，因为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于1950年9月4日提交大会的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另一个印度代表阿努普·辛格博士签署的年度报告代表了委员会成员国的共同裁决，没有任何保留或异议。

尽管有相反的断言，但无可争论的事实依旧是，由于联合国现场观察员——都是澳大利亚人——于6月23日即战争开始的两天前便离开了三八线，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在北朝鲜和南朝鲜提出侵略指控和反指控时，没有1950年6月25日黎明三八线发生战争时目击者记述的可作凭证的材料。事实上，联合国朝鲜委员会（1949年至1950年）的行为整个来说是很不恰当的，委员会中的印度代表应和其他成员一道接受责备。尽管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承认两个朝鲜政权之间以边界事件和游击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已，委任了现场观察员对三八线上的军事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也注意到了李承晚对和平统一朝鲜的不妥协态度和他

要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不断叫嚷，它还是得出了北朝鲜人对南朝鲜发动了无端入侵的奇怪结论；而这是在并不掌握任何有关1950年6月25日三八线上的形势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干出的事。这里想叙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可能会对发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确切环境提供一个明确的线索。

对有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由来的事实的研究

《泰晤士报》，1950年6月25日（汉城，星期一，早晨4时电）：

“据美国专家报道，北方部队已占领了掩护汉城的唯一屏障——临津江以西的全部领土。”

《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6月26日（汉城，1950年6月25日电）：

“北朝鲜部队今晚渡过了临津江，这条江是在它东南35英里处的南朝鲜首都汉城前面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南方人今天早些时候在侵略者窜犯临津江以西的领土瓮津半岛时撤到了江边。除瓮津半岛本身外，北朝鲜部队占领的最大城市是开城，一个在三八线边界以南很近处的铁路枢纽。”

《每日电报》，1950年6月26日（南朝鲜汉城，星期一电）：

“北朝鲜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于昨日凌晨向构成该国南半部的韩国发起了进攻。

“入侵是在平壤的北朝鲜电台指责南朝鲜人进攻了三八线上的三个地方后进行的。

“共产党人很快占领了临津江——掩护南朝鲜首都汉城的唯一天然屏障——西北面的所有地区。”

上述报道似乎说明，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25日某个未具体确定的时间侵入南朝鲜，并占领了瓮津城和开城以及临津江西面或西北面的所有南朝鲜领土。这些报道似乎证实了南朝鲜外务部长官和美国驻韩国大使1950年6月25日向联合国委员会所作的陈述。

但这不过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1950年），1950年6月25日下午1时35分平壤广播的一则消息声称，拒绝了北方每一项和平统一建议的南朝鲜派遣一支入侵部队越过海州地段的三八线，使它的罪恶达到了顶点，从而引起了北朝鲜的反击。

北朝鲜于1950年6月25日下午1时35分广播的南朝鲜进攻海州的说法，似乎得到了英国报刊上发表的下列电讯的有力证实。

《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6月26日（汉城，6月25日电）：

“美国官员证实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位于北朝鲜境内5英里处靠近西海岸的海州。”

《每日先驱报》，1950年6月26日（汉城，6月25日电）：

“美国军事观察员说，南朝鲜军队在西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救援反击，进入北朝鲜领土5英里，夺取了海州城。”

《新闻记事报》，1950年6月26日（汉城，星期一，清晨4时电）：

“南朝鲜政府声称在边界的某个地点进行了反攻，并占领了位于北朝鲜境内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海州。”

从上述英国报纸的报道看，位于三八线以北5英里处的北朝鲜工业城市海州——按委员会注意到的北朝鲜下午1时35分广播的说法——好象是在1950年6月25日被南朝鲜部队占领的。联合国委员会不愿核实北朝鲜关于南朝鲜部队进攻海州的断言，只是凭着李承晚总统相反的断言将它斥为捏造而不予理睬。但是，如果我们对朝鲜战争起源的客观调查感到兴趣，便不能抹煞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的当天海州被李承晚军队占领的事实。

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另一个似乎能证实北朝鲜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说法的意见。南朝鲜军队占领海州城必然要以极大的规模集结其军队，特别是在他们没有北朝鲜人拥有的那种坦克、装甲车、重炮或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南朝鲜军队要在1950年6月

25 日（在人们所说的北朝鲜在三八线全线发动进攻之后）集结这么大的力量，特别是在瓮津和开城之间，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要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傍晚包围临津江西面或西北面的全部领土，而海州的位置就在瓮津和开城的中间。从军事观点看，只有承认北朝鲜的断言是正确的，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南朝鲜军队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占领了海州。北朝鲜说它在三八线全线开始反击前，南朝鲜部队先向海州发动了进攻。

很难从军事上解释用轻便武器装备起来的南朝鲜部队怎么能占领靠近多事的边界的北朝鲜最具战略意义的重镇，除非是他们也许趁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突然袭击。

大量集结用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向海州——通往平壤的重要城市——进行突然袭击的南朝鲜部队，必然削弱了南朝鲜人在三八线其他地段抵抗装备较好的北朝鲜人的反攻的防御力量。

对联合国现场观察员报告的批评

我们知道，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谴责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无端入侵的判决是在没有任何有关三八线局势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作出的，因为他们的军事观察员于 6 月 23 日即战争开始前两天便离开了边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决议——“北朝鲜政权正在对南朝鲜进行周密策划、协调一致的大规模入侵”——根据的只是“军事

行动的实际进展”和从联合国现场观察员那里得来的否定性证据：“南朝鲜部队完全是按防御要求部署在三八线所有各地段的。”（《联合国文件》，S/1507。）但是这个关于朝鲜战争原由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未作准备的南朝鲜军队——这支军队“完全是按防御要求部署的”，在北朝鲜入侵的首次打击下撤退到防御阵地，而其沿临津江主要防线又早于1950年6月25日傍晚前被突破——怎么可能当天集中一支巨大兵力，一支为他们占领北朝鲜靠近三八线的最重要的战略重镇海州所必需的部队。

联合国现场观察员的报告（《联合国文件》，S/1518）仍然被当作朝鲜战争起源的基本文件被人引用。这一文件是由当时的安全理事会主席B·N·劳爵士于1950年6月30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因为它正与我可以称之为安全理事会就此事采取的行动的基础有关。”英国《朝鲜问题白皮书》的两位作者R·G·凯西和盖伊·温特在他们分别撰写的《朋友和邻居》（1954年）和《朝鲜发生了什么？》（1954年）中主要根据这个文件作出了他们对朝鲜战争起源的判断。西方的多数评论家也是一样。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强调的一点是：“观察员们的报告是在1950年6月24日北方入侵前夕完成的”，“第二天的事变赋予了南朝鲜军队处于防御状态的评述以观察员们在起草此报告时所不可能觉察到的意义。”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说：“正是这种未曾觉察使得他们的评述具有了特殊价值，委员会考虑

到了这一点。"它主要根据这个报告和它对总的军事形势的了解作出结论说，"大韩民国不可能在1950年6月25日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

对于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提一提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尽管它被说成是"在1950年6月24日北方入侵前夕完成的"，联合国委员会本身在1950年6月26日以前却没有看到过这个报告，而且在1950年6月26日，即安全理事会1950年6月25日通过谴责北朝鲜的第一个决议数小时之后，也只能将该报告（其本身只是个简短文件）向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作一"简要说明"。这个报告于1950年6月29日提交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这个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所谓基本文件在没有充分和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被不适当地延误了，直到1950年6月29日才送到安全理事会。不仅这个文件的起草时间是可疑的，而且其内容在重大问题上与麦克阿瑟将军1951年5月在参院听证委员会上发表的证词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情报主任威洛比将军的说法也是相矛盾的。威洛比在1951年12月号《世界主义者》杂志上写道："整个南朝鲜军队处于待命状态已有几周，现在据守着三八线沿线的阵地。"

《联合国现场观察员报告》第一段说："所有各地的南朝鲜军队都部署在纵深地带。……"第5段说："南朝鲜军队不象具有标志着在准备大规模进攻的军事和其他供应。特别在前沿地区没有

迹象表明存在着任何给养或军火、汽油、石油、润滑油的堆集处。”

这个报告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要以此为根据得出的结论——“大韩民国不可能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肯定无疑是与 1950 年 6 月 25 日占领北朝鲜海州城这个事实相矛盾的。

麦克阿瑟将军尽管曾作为联合国司令部首脑在给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第一个报告中与联合国委员会沆瀣一气，将南朝鲜的失败说成是由于他们在一场全面进攻面前毫无准备，却于 1951 年 5 月 5 日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作证时用“南朝鲜人在后勤方面的错误”的说法为南朝鲜人的军事崩溃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不仅否定了联合国现场观察员报告的基本内容，而且为北朝鲜军队自内战开始那天便向三八线以南迅速推进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种迅速推进曾使包括尼赫鲁在内的许多人断定“即使不作很多调查也可清楚看出这是一次周密策划的大规模入侵”(1950 年 7 月 7 日尼赫鲁的谈话)。再者，这又是联合国委员会提出的发动这“一次蓄谋已久、准备充分、时机恰当的入侵”的证据。

《人民》杂志（伦敦奥德汉斯出版社出版的周刊）在 1950 年 7 月 2 日正确地对联合国现场观察员报告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联合国‘现场观察员’提交的关于它（指朝鲜战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正式报告，简直是迄今就一项重大国际问题所提出的最为

含糊不清的文件，因为报告根本不能证明北朝鲜发动了它。”

由一个中立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必要性

伯德伍德勋爵试图对印度外交在朝鲜问题上所作的各种姿态进行公允的分析，他作出了下面的很有启发性的评论："在我们估量了尼赫鲁的开明指责——西方国家不了解亚洲广大地区人民的思想和需要，便作出有关该地区的决定——是否有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矛盾需要说明，那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承认北朝鲜侵略的罪恶意图和性质的同时，贝内加尔·劳爵士似乎从未想到要对苏联否认北朝鲜的罪责提出疑问。有些人会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外交手腕，在严酷环境的压力下必然要使用的回避手法。别的人则可能粗率地认为这是不诚实。不管如何判断，那个本来可以将此问题推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公开讨论和国际揭发的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却从未提出过这样的挑战。即使直接的效果可能是产生更大的紧张，那样做不可以体现一种值得称作最高政治家风度的奉献吗？"（《一个大陆的决定》，英文版第204页至205页。）与其对一个事实可疑的问题提出挑战，我认为印度不如以合法的中立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去了解朝鲜危机的过程，暴露大国及其卫星国那些导致了朝鲜灾难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以此作出有益的奉献。现在已经很清楚，朝鲜战争的真正历史依然被

掩盖着，尽管有北朝鲜入侵这样明白的事实。我们早已看到，“到现在仍然找不到为驳斥共产党的指责——北朝鲜人是在反对侵略保卫自己——所必需的材料。”（《冷战中的防御问题》，英文版第110页。）我们不能肯定朝鲜战争是否仅仅是一场“内战”（G·D·H·科尔），还是苏联“通过代理人”进行武装“侵略”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还是象杜鲁门所揭露的那种情况：“共产主义已超出用颠覆手段征服独立国家的范围，现在要使用武装入侵和战争了。”相反，没有人能明确地说究竟朝鲜战争是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为控制福摩萨、使它成为将来反对大陆中国的军事行动基地而寻找借口所施加的压力的产物（约翰·普拉特爵士），还是美国军火业盼望得到一项空前的军备竞赛计划以逃避可怕的萧条的结果，还是不过是南朝鲜信誉扫地的政客李承晚的一个阴谋。因为随着1950年6月6日议会选举的惨败，他即使不丢掉总统职位，也将被剥去实权了。

“一位名叫斯坦利·厄尔的美国经济合作总署驻韩国办事处成员在1950年辞去劳工顾问职务时说：‘美国驻韩国办事处应当受到国会的调查，以揭露美国对韩国政策的弱点。’他还说要不是战争爆发，‘受压迫的南朝鲜人本来会起来反叛李承晚政府的。’”（J·冈瑟：《麦克阿瑟之谜》，英文版第172页。）

直到现在也未曾发现有什么俄国唆使发动朝鲜战争的证据［“人们已经看到有许多重大事件无法证明应由苏联承担‘直接

的'责任，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其中的一件。"（马克斯·贝洛夫：《苏联远东政策》，英文版第255页)]，尽管有一位研究联合国事务的客观的学者作出过这样的评论："苏联政府向北朝鲜人开了绿灯。"（马克劳林：《联合国与强权政治》，英文版第219页。）中国政府对北朝鲜的进攻事先似乎也没有得到任何警告(菲茨杰拉德：《中国的革命》，英文版第220页。）此外，美国入侵朝鲜究竟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摩根索）抑或纯粹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应该是需要进行彻底调查的事情。战争中的全部行为，包括滥炸人口中心、使用诸如凝固汽油弹等骇人听闻的武器、中国干涉、进行细菌战的断言和对待战俘问题，都应列入建议中的中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项目。与朝鲜的民主制度发展有关的其他问题，不外是被分割的朝鲜的首脑李承晚和金日成的前程，以及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活动问题，也应当受到严密的审查。在一位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对其人品都不可能发生怀疑的印度主席的妥善主持下，所有这些调查也许可以揭示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而不致被任何一方为了加剧冷战事业而用来耸人听闻地公布某些只有部分真实性的欺人报道。在《朝鲜战争秘史》（英文版第151页）这本迄今所能得到的对朝鲜战争的起源和进展作了最彻底的研究的著作中，I·F·斯通写道："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真相和所有战争的真相一样，不会从哪一边过分简单化的宣传中找到。我相信在朝鲜，大国是刚愎自用的卫星国的受害者，这些卫

星国亟望进行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期待已久但都极力避免的摊牌。现在的情况与萨拉热窝[①] 有着某种类似之处，虽然幸好这种类似还不完全。”对朝鲜危机进行一次彻底的病例分析，虽然是死后检查，也许对冷战病的诊断和通过传播真理消除紧张局势会有巨大的助益，因为真理是战争——热战和冷战都一样——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① 萨拉热窝是现在的南斯拉夫中部的一座城市。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国王储在此被刺死，这个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译注。



· 附录 ·

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①]

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是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全面的研究著作。同时，这部由一家很有事业心的印度出版商出版、印度读者容易买到的作品，又是有关此问题的争论最多的书。由阿拉斯太尔·兰姆教授撰写的论述英国在印度东北边境留下的遗产的权威性出版物在这个国家不易得到。印度政府迄今不让印度学者接触有关1914年至1954年间印度北部边界的官方档案。而且自1959年以来外交部历史司还力图宣传一种印度边境直达昆仑山脉的神话。这样，印度从英国时代继承下来的真正遗产对公众就成为秘密，而灌输给他们的只是印度有一个明确划定的边界、中国人在1962年蓄意侵略了印度的错误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马克斯韦尔的书会使印度舆论受到一次可说是电休克治疗，引

---

① 原载1971年1月号《今日印度》。

起了许多评论家的恚恨和忿忿不平的议论。书名取得就不很恰当，因为正如作者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中国”曾于1962年对印度“进行过……大规模的惩罚性征讨”。（该书英文版第414页。）

该书开头介绍了英帝国时期北部边境演变的历史。这为当前的中印边界争端提供了适当的背景。在这一部分，马克斯韦尔主要利用了阿拉斯太尔·兰姆教授和多萝西·伍德曼小姐根据对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的官方文件所作的研究写出的权威性著作。虽然没有涉及对资料来源的研究，马克斯韦尔在阐明英国在北部边境的真正遗产上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方面的知识对正确了解中印边界争端的性质非常重要。

研究过阿拉斯太尔·兰姆教授精心写就的研究著作《中印边界》（1964年）的所有学者现在都已熟知，马克斯韦尔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边界在1947年英国离开印度时尚未解决。在西北部，边界一直没有划定，因为1899年英国政府向北京建议的边界线从未被后者接受。在东北部，麦克马洪线曾得到西藏人的秘密同意，但从一开始它便遭到中国人的拒绝，在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西藏的理会。

马克斯韦尔认为，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于1950年和1954年作出的某些关于边界要求的决定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道路。他提到尼赫鲁1950年11月20日在议会的声明，这声明断然声称：“有地图也好，没地图也好”，反正麦克马

洪线是印度东北段边界。他提到G·S·巴杰帕依和K. M. 潘尼迦1952年就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是否可取一事进行的秘密通信。潘尼迦的看法是，既然印度已表明了她的立场，那么下面便该由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尼赫鲁接受了潘尼迦的劝告，没有理会在1952年要求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的巴杰帕依的论点。在1953年和1954年中印谈判时，印度政府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谈判只限于印藏贸易和进香问题。1954年7月尼赫鲁口授一个通报，他在通报中将西藏协议与北部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份发给有关部委的秘密文件说："根据我们的政策以及作为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结果，北部边界应被看作是确定和明确的边界，不容与任何人进行讨论。应当在整个这段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以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一个哨所网。"这时还发行了新的印度测绘局地图，以取代旧的官方地图。前者标明整个北部边界已清楚划定，而后者标明从克什米尔到尼泊尔的北方边界是"未划定界"，麦克马洪线是"未标定界"。

马克斯韦尔承认，在尼赫鲁公开宣称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后四年之内，北京没有表示反对，实际上，中国对1951年印度接管达旺的默认表明北京不准备将麦克马洪线当作一个问题。接着马克斯韦尔指出："但是……尼赫鲁在裁定北部边界的其余部分应被看作是'不容进行讨论'的、'确定和明确的界线'时，便走出了使边界问题演变成争端、争端最后又变成边界战争的一

步。”（英文版第81页。）

正是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发生的达赖喇嘛及其数千名追随者逃往印度，使得印藏边界骤然成为大家关心的边界。事实上在边界的印度一边几乎没有什么检查哨所，在中国一边情况也是一样。实际上在整个边界上只有北方邦一段的马拉霍蒂（乌热）存在着唯一的战斗爆发点。看来，尽管尼赫鲁在1954年7月的秘密通报中指示要在北部边境有争议的地区建立检查哨所，这却是在1954年至1958年间建立的唯一的前进哨所。西藏叛乱造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局势，中国军队紧紧追赶要到印度寻求避难的西藏叛乱分子，而印度军队则部署在沿边境地区，特别是东北边境特区新建立的哨所里。1959年8月25日的朗久冲突本身并不是重大事件，但是同时走漏的中国修筑穿越阿克赛钦高原的公路的消息在印度引起了恐惧症。

可另一方面，边界争端以及随后发生的边界战争本来也不会自动来临。1959年8月和9月尼赫鲁在议会讲话时用的是这样的调子：阿克赛钦的哪一部分属于印度，哪一部分属于中国，这是个可以争辩的问题。尼赫鲁在1959年9月13日发出的秘密指示中也说：“……阿克赛钦地区得多少让它保持目前的状况，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哨所，而且几乎无法到达那里。任何与它有关的问题只有在时机到来时在处理整个边界这个大问题中予以考虑。目前，我们不得不容忍中国人对（拉达克）东北段的占领和他们穿

过此处的公路。"（英文版第 129 页。）

从 1959 年 10 月 21 日在空喀山口附近与中国巡逻队发生冲突的印藏边界部队指挥官卡拉姆·辛格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内政部副司长夏尔马先生曾于 1959 年 9 月 22 日指示在前沿地区建立新检查哨所。（三号《白皮书》，英文版第 14 页。）这说明，内政部长戈温德·巴尔拉夫·潘特和他的官员们漫不经心地置尼赫鲁的指示于不顾，因而导致了空喀山口的不幸冲突，而这又引起了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强烈愤慨。马克斯韦尔强调了空喀山口事件对印度舆论和尼赫鲁的思想产生的剧烈影响，但是他没有说明在尼赫鲁发出了 1959 年 9 月 13 日指示的情况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边界冲突。马克斯韦尔正确地批评了尼赫鲁于 1959 年 9 月 7 日作出的公布当时与中国交换的一切照会的决定。这在实际上是将行政部门处理国家对外关系的权力和责任交给了立法机构。（英文版第 133 页。）

自 1959 年 11 月起，尼赫鲁在印度对克什米尔段的边界要求上采取了僵硬态度。1959 年 11 月 4 日的印度政府照会精确地描述了一条将整个阿克赛钦划入印度的边界。中国人被告知说："任何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了解，印度的这条传统历史边界线在近二千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与印度的文化和传统联系在一起。……"（英文版第 130 页至 131 页。）1959 年 11 月初，尼赫鲁向一些重要的驻外大使发出了一个秘密通报，内中特别说到"他……

现在相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获得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因此，他看不到有多大通过谈判合情合理地解决争端的机会。”（英文版第132至133页。）尼赫鲁在思想上对印度边界要求的这一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S·戈帕尔博士的影响，此人曾被尼赫鲁派往伦敦查阅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档案中有关印度北部边界的资料并对历史证据作出客观评价。“戈帕尔于1959年11月对尼赫鲁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比中国的明显有力。”戈帕尔在伦敦究竟挖掘出了什么样的可以支持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要求的历史证据，至今仍然是谜。在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的档案中并没有这样的文件。在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编纂的权威性出版物（C·U·艾奇逊：《印度同邻国签订的条约、契约和证书集》，第12卷）中是这样说的："克什米尔邦的北部边界和东部边界一样仍未经划定。”但是，马克斯韦尔并没有责备戈帕尔博士歪曲历史资料。

自1959年11月起，由于发生了西藏叛乱及随之而来的种种事件，加上就英国统治留下的边界遗产的历史证据所提出的错误意见，印度外交的活动能力便削弱了。受到误导的印度舆论被某个得到国会后排议员支持的不负责任的反对党煽动得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从尼赫鲁于1959年9月7日不幸地向议会作出保证以后便是公开交换的印度和中国指控对方的官方照会，成了持续紧张的一个主要根源。

结果是 1960 年 4 月新德里最高级会晤的彻底失败。当周恩来建议"彼此接受两段目前的现实并成立边界委员会"时，尼赫鲁被迫拒绝了那个合理的建议。印度政府也拒绝接受中国将边界冻结到将来能够比较冷静地讨论这一问题的某个时候的建议（英文版第 158 页至 159 页）。中国人显然十分重视的最高级会晤失败了，用尼赫鲁的话说，是在"一套完全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撞碎了。毫无疑问，尼赫鲁在边界遗产的事实上听到的是外交部历史司的错误意见。可是马克斯韦尔认为最高级会晤实际上是由于印度坚持不肯放弃、修改或者推迟她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而破裂的（英文版第 169 页）。

从 1960 年所形成的边界僵局看，印度在边界地带有争议地区建立立足点的"前进政策"不过是合乎逻辑的前进的一步，自始至终，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都一直坚信无论印度自己在边界沿线干些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这就是前进政策——向一个在军事上强得多的邻国进行军事挑战的政策——的基本假设。(英文版第 179 页。) 陆军参谋长蒂迈雅将军领导的陆军指出，在政府要求下向前推进巡逻，将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平民、政治家和行政人员都没有理解后勤供应决定着部队的能力，在没有充分考虑对方作出反应的可能的情况下制定了他们的政策（英文版第 202 页）。在蒂迈雅将军负责陆军工作期间，他拒绝执行没有后勤支援的前进政策。后来"一批军官于 1961 年中接管了陆军总部，他们

对文职人员的要求百依百顺，下定决心置用兵之道的基本概念和据此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于不顾。从此以后，印度政府就听不到下面军队中继续发出的警告和抗议，而迅速奔向灾难了。”（英文版第 204 页。）马克斯韦尔对 1962 年 10 月边界战争起源的分析，多少与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判断相一致，后者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印度正在有争议的地区渐渐向前移动，实际上开始了军事行动。（《纽约时报》，1963 年 4 月 19 日。）马克斯韦尔在研究有关战争进展的《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的基础上提供了有关对华边界战争的最有用的说明。《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将 1962 年军事灾难的根源追溯到“战争的上级指挥”和高级军官们在 1961 年以后没有抵制他们懂得或者应当懂得的在军事上不能实行的政策。考尔、森和塔帕对东北边境特区军事溃败的责任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尽管没有明确地归罪于他们。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的衰落是这场边界战争最明显的、也许也是最可悲的后果。

此书以丰富的资料——有些曾被认为是官方秘密——揭示了中印关系中具有希腊悲剧性质的一系列事件。该书在印度引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论，但是没有人对马克斯韦尔引用的官方文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毫无疑问，在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与中国未曾划定的边界的艰难遗产中潜藏着的争端上，有过处理不当

之处。现在该是印度政府开放有关1914年至1954年间中印关系的官方档案并公布《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以使印度学者可以深入研究自1947年以来我们的对华政策出了什么毛病以及谁应对它负责的时候了。

在印度，人们曾一度期望中印关系出现解冻。但是在马克斯韦尔的书中提到一个如果属实将成为中印和解的长期障碍的“事实”：“B·J·帕特奈克受权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让他们回国从事游击活动。”（英文版第440页。）

评多萝西·伍德曼的《喜马拉雅山边界》①

多萝西·伍德曼是亚洲事务著名评论家。她与她已故的伴侣金斯利·马丁长期以来一直是反殖民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她是尼赫鲁的朋友，而且一直与尼赫鲁的女儿十分接近。她几次在《新政治家》周刊的专栏中评论中印边界争端。在1962年3月9日发表的题为《正在冒烟的边界》的文章中，她从持续的僵持和武装对抗中预见到沿喜马拉雅山有发生一场熊熊大火的危险。她对圣雄甘地昔日的某些信徒的反华冷战歇斯底里持批评态度。同时，伍德曼小姐多少接受了印度对东北边境特区和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合法的看法，暗示中国本应接受尼赫鲁的建议：在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前，中国可以为民用交通目的而租用阿克赛钦的公路。

自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加剧印中恶感的事件。1962年10月边界战争的惨痛经历和那时以后形成的中巴谅解在印度产生了一种恐惧怀疑症，导致她疯狂地寻求军事安全，在1959年至1969年间将国防预算从30亿卢比增加到110亿卢比。在这种情况下，对喜马拉雅山边境僵持的局势进行认真的研究便是迫切需要的了。

① 原载1970年3月7日出版的《新地》周刊。

自从印度政府于 1961 年 2 月出版双方官员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对喜马雅山边界互相冲突的要求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阿拉斯太尔·兰姆博士在他的《印中边界》和《麦克马洪线》（第 1 卷和第 2 卷）这两部书中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但是他的著作在印度不大受欢迎，因为舆论界对发现了任何有利于中国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要求的材料的任何学术界人士的善意仍然拒不接受。另一方面，有几位作者，如菲希尔、罗斯和赫坦贝克（《喜马拉雅山战场》）、弗朗西斯·沃森（《中国的边境》）、G·F·赫德森教授和奥拉夫·卡罗爵士，在他们论及这个问题的作品中却在不同程度上为印度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多萝西·伍德曼这部对喜马拉雅山边界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演变进行彻底研究的著作便成了受到高度欢迎的出版物。在准备写作这部资料翔实的作品的过程中，她得以翻阅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的到 1938 年为止的官方档案和一些曾经参与制订英属印度的喜马拉雅边界政策的重要英国官员（如查理·贝尔爵士和 R·N·里德爵士）的私人文件，因而获益匪浅。（在印度，学者不能接触早在 1914 年的有关西姆拉条约的官方文件，可是印度政府却认为公布 1954 年以来与中国互通的所有当代官方信件是适当的。）故而长期以来灌输给印度知识界的是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现在的中印对抗——跟五十年代初期的东西方冷战一样尖锐——是中国政府的恶毒阴谋和尼赫鲁的轻信相结合的产物。现在是他们

睁开眼睛看看问题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了，这可能是走向找出一条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第一步。

他们在多萝西·伍德曼的书中可以看到，一位被中国称作“亲印”分子且在实际上从开始时是相信印度在1962年3月的事件上有着坚实论据的英国学者，怎么在对官方文件进行了五年研究之后现在改变了她早期的看法。伍德曼小姐说：“显然中印边界的任何解决办法都离不开妥协。”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地理学者，她仔细地研究了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出版的支持其各自要求的大量不同版本的地图。象多克·巴尼特这等老资格的亚洲问题学者都在《共产党中国与亚洲》(英文版第310页)中被引得误以为中印在喜马拉雅山边境上的冲突起源于共产党中国要弄的地图诡计，而伍德曼小姐则认为在这方面双方都有问题。她说道：“地图上的无数差异可能使得最天真的制图学者抱有这样的看法：连魔鬼也能引用地图为他的目的服务。”(英文版第320页至321页。)

她提出一条在妥协的基础上解决争端的可能界线：“中国在与缅甸的讨论中接受了1914年西姆拉三方地图上的红线这一事实暗示着在印度问题上这可作为一个出发点。”(英文版第321页。)另一方面，她认为印度应当将她在阿克赛钦地段的要求限制在1899年的马继业-窦纳乐线以内，该线当时为新疆官员所接受，但是没有得到南京的批准。事实上，伍德曼小姐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中印和解的起点可能就是据说由周恩来于1960年4月向尼赫鲁

提出的那个方案。现在已经退休的印度外交家K·P·S·梅农也在他的《飞奔中的三驾马车》一书中推荐过这个方案。

三 个 创 伤

伍德曼小姐是这样结束她的著作的："今日的印度似乎是三个创伤的受害者：克什米尔、阿克赛钦和贫困。试图以巨大的军事开支来解决前两个创伤只能转移她向贫困作斗争的资金和精力。印度玩不起俄国对华战争的游戏，也玩不起自己对巴基斯坦战争的游戏。……事实上，印度面临的选择是将喜马拉雅山脉作为一个巨大的雷达屏障呢，还是开始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重新与巴基斯坦和中国进行会谈。安于当前的僵持局面就是听任一条横贯亚洲的有频繁军事活动的边界的存在。"（英文版第321页。）

印度人现在大概对同两个紧邻的冷战对抗感到厌倦了。但愿他们对这些年来一直在联合王国支持印度事业的多萝西·伍德曼的劝告不会充耳不闻。她并没有就印度如何能有意义地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象尼赫鲁先生一样，大多数印度人仍然相信，即使由于宗教上的密切关系而用大盘子盛着克什米尔谷地送给巴基斯坦，也不会使她停止欺侮印度。另一方面，这可能将宗教感情激发到异常激烈的程度，破坏作为今日印度联邦的基础的现世主义的脆弱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尼赫鲁从来不肯在克

什米尔问题上听命于仲裁的原因。可是，他不止一次表示同意将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与中国达成解决办法应当得到紧迫、优先的考虑。但是伍德曼小姐没有考虑到经过十年的敌视对抗以后存在着相互猜疑的种种困难。在任何建议举行的中印对话中，边界谈判都应当是最后的项目，因为问题已被诸如威信等等考虑弄得复杂化了。作为一个开端，两国可停止对对方的诬蔑和诽谤运动。重新开放对双方有利的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贸易——这种贸易在 1954 至 1962 年的协定期满前夕由于印度政府于 1962 年初拒绝重新谈判西藏贸易问题而停止了——应该得到紧急考虑。无论如何，多萝西·伍德曼小姐写出了一本引人深思的研究著作，研究印度外交政策的学者都不应该放过它。

译者后记

在《中印边界秘史》译稿完成后不久，我荣幸地应印度第十三届社会科学大会秘书长N·P·乔拜博士的邀请，出席了于1988年11月14日至18日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召开的该届大会。会后，根据中印两国社会科学交流协定，顺访印度一月。除新德里、孟买、特里凡得琅和马德拉斯外，还访问了加尔各答等地。

在加尔各答期间，由于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阿隆·高希先生的协助，我们得以与《中印边界秘史》作者卡·古普塔先生的家属会见，并瞻仰了他的故居。

古普塔先生的故居位于加市Rash Behari大街213号。由于古普塔夫人在外地任教，出面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儿子高塔姆·古普塔和儿媳克里什纳·古普塔。我们参观了古普塔昔日的书房，向这位为中印友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印度学者表示深切的敬意和哀悼，并向高塔姆·古普塔及其夫人表示慰问。接着我们请他谈谈他父亲生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欣然同意，向我们发表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古普塔先生生于1916年3月30日，于1987年9月29日去世，享年71岁。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三年的工会运动，两次被捕入狱。还为工人编写过一本印地文杂志。1954年他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被授予国际关系（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获得这一学位的第一个印度人。

“古普塔先生生前长期在加尔各答穆拉利塔尔女子学院工作，任政治系主任，并在任副校长时退休。但是这个职业与他毕生从事的印度外交政策研究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他在三十年期间出版的五部著作涉及印度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但他在1962年后将全部精力用于研究错综复杂的中印关系问题。古普塔先生极望看到中印友好。1962年战争后，中印边界问题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问题，而他发现印度政府所说的不完全正确，于是，他进行深入研究。接着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的文章，但有许多段落均被删掉。为了工作方便，他想转到德里工作，因为那里各种条件方便，信息也多。他是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印度人，完全有资格在首都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工作，但是他的申请未得到任何一个单位的同意。

“古普塔先生在牛津大学C·A·W·曼宁教授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朝鲜危机和印度的团结》（Korean Crisis

and the Indian Union)。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也指责了支持它的美国。这可能是他从未得到美国邀请和提供奖学金的原因。他对中印冲突的研究，谴责了超级大国出于一己私利，希望看到亚洲两大邻国的互相敌对。他注意到了苏联对中印两国每一次为实现重新和好而作出的认真努力所表现的"关心"。所以，他也不会得到苏联的欢心。古普塔博士认为，他1974年出版的《中印边界秘史》在研究中印边界问题遗产方面有巨大的意义。他将英国官员在三十年代伪造的，后来导致印度官员对边界作出许多错误解释的《艾奇逊条约集》的真相公之于众。他对印度官方在边界争端上的立场所持的非正统观点和他多次揭露印度一方论据中的弱点的努力均未受到官僚政治的青睐。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他认为是真实的事情上作过妥协。尽管他对外交部的一些高级官员的个人帮助怀着感激之情，他没有得到过印度政府的任何合作。我相信：如果他能获准阅读在德里的官方档案，他的研究工作会更彻底和深入。

"对知识的追求促使他在三十年期间至少有五次前往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他不得不在经济上负担他前往英国的旅费和在那里生活费的大部分。他也得到过一些团体的资助，但远远不敷使用。他在生活上是十分简朴的。很少有人能象古普塔博士那样，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积蓄用来追求知识。他

没有为花费掉大量金钱而遗憾，因为知识使他感到满足。他在收集资料方面备尝艰辛。这些资料对其他学者有巨大的帮助。

古普塔博士感到高兴的是印度的气氛晴朗起来，人们对中印边界问题开始有了新的看法。有些学者十分赞赏古普塔博士的结论，即使这些结论与我国官方的立场相悖。有许多人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没有人怀疑他的献身精神和诚挚态度”。

高塔姆·古普塔说的好。在这次访印过程中，我们感到印度的气氛的确晴朗起来，人们对中印边界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我到新德里后不久，会见了自由报刊杂志出版集团（Free Press Journal Group of Newspapers）的特约记者D·南迪先生。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作：《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新认识》(Sino-India Border Dispute: A New Realization)。此书总共36页，但却反映了与印度政府昔日立场全然不同的观点。它今天可以自由出版，作者没有遇到象已故的卡·古普塔昔日遭受过的苦难。后来，我们陆续与许多学者进行了接触，感到印度政府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公众的看法也与过去不同。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边界问题可以很快解决。要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的确还需要时间。

我们到达印度时正值拉·甘地总理行将访华的前夕，许多报刊发表了有关中印关系的评论和报道，普遍主张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边界问题，并且主张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之间其它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如《国民先驱报》记者尤盖西·苏德所说的，中印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和加深，必会促进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

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拉·甘地总理刚刚结束对华访问。我们高兴地得知，这次访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预期，中印之间由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必将会逐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数千年的传统友谊必将得到大大加强和发展。卡·古普塔先生如果有知，在看到这种可喜的发展时，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王宏纬

1989年1月12日

专名对照表

一、人名

二、地名

三、其它